

中國論

羅夢冊

羅夢冊著

中

國

論

商務印書館印行

自序

這本書係補充著者於前年冬季和去年春天在論中國之國之主題下，對中央政治學校和中央大學中國通史班學生所作之歷史哲學和政治哲學等講述而成。當時抽着講，各篇彼此獨立。今日合起寫，遂或可構成一個理論體系，成一本較有體系的書。

書成後，無以名之，就名它爲『中國論』。

藉助於『中國論』這個書名以名本書，倒很利於我們來說明這本書的目的。這本書的目的是在發見中國國家，最好說『中國之國』的本質。就在這本書中，我們以檢討『中國之國』的歷史所啓示的特性來解釋『中國之國』的本質，並根據各種特性所昭示之『中國之國』的本質，來建設起一個接近歷史事實之『中國之國』之『自我認識』和『自我介紹』。

這是一個嘗試，也或者這是一個企圖，這是一個野心。這個嘗試，這個企圖，或這個野心，自希冀它之能夠成功，促成一個真理的發現。（然也許會遭遇嚴重的失敗，或全面的失敗。但失敗也或者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萬一失敗了，也或不會是全面的勞而無功。我們的失敗，或正可呼喚起後繼之人的出現，並爲他們的成功鋪開一條坦平的大道。）時至今日，在這個『送往開來』的大時代的啓示之中，我們擁擠着『中國之國』之古昔歷史的豪華與光榮，展望着她未來使命之偉大，並面對着她現時處境的非常，以及其被人誤解之嚴重，自不能不超而作此嘗試，作此企圖，或抱此野心。而時至今日，也惟有在中國學術思想承準之驚人的提高下，我們才有可能出而作此嘗試，作此企圖，或抱此野心。自然，著者之超而作此嘗試，作此企圖，或抱此野心，也是出之於突如其來，而是有其歷史之漸。

約在七年之前的一個春天，我開始孕育着這本書的主要概念。那是，正是七七抗戰爆發前的一年，也正是

著者居留英國的第二年。爲了嚴重的世界危機和民族大難的威迫，每每地使著者於無言的沉默中，或無名的鄉愁中，時將有關中國的一切問題向無盡頭的涯底窮索。加之，自居異國作異客，飽嘗異國情調，亦大嚼西方歷史。偶從異國情調的飽嘗裏和西方歷史之咀嚼中回首東顧，卻每每地覺得對於中國國家和中國歷史另獲不少別有會心的新認識。或可說，對於所謂「中國之謎」，時有頓悟似地識破。

這種會心，這種頓悟，或可說這種發現，在其初，只不過是一點一滴，或一線一面的發現，但積累既久，漸次成形。雖不應誇大的說「一旦豁然貫通」，但它確會漸次地構成了一種對於中國之所以爲中國，或「中國之國」之所以爲「中國之國」的認識。根據這種認識，也就漸次地產生了一種可以說明中國之所以爲中國，或「中國之國」之所以爲「中國之國」的理論和理論體系。此類理論，在當時，只不過是於倫敦大霧或大風雪之夜，旅寓寂寞之時，偶向一二好友一吐，作爲漫談消寒的資料，雖會屢屢地博得他們真誠的讚賞，然而這讚賞自不過是一夕的爐邊燦爛而已。但國難日深，吾人對於國家和民族之自我認識或自我再認識的要求，卻日益急迫。待到大前年東歸故國之後，目親「抗戰建國」大業之艱鉅，以及其被國人和世人觀解的嚴重，已不容不把前此英京寒夜的漫談，加以深澈的提鍊，鎔鑄爲較爲具體的論文，藉和國人交換意見。

這期間，除爲東方雜誌撰寫國際政治論文，並從事於反「戰國派學者們」之「戰國時代重演論」的思想戰爭外，亦曾或先或後的爲東方雜誌和三民主義週刊寫了幾篇題爲「中國勝利就是東方歷史和文化的勝利」，「中國歷史走到了西洋歷史的前頭」，和「論中國之國」等論文。滬淪等地雖曾爲之波動一時，但此等論文的寫作，實不過爲臨時呼應各該當時之個別的世局而發，各篇分立，彼此之間談不到有什麼聯繫。以執教於中央政校並兼課中大之便，才於教授與此有關的學科之時，較有系統的將本書所論之主要的論旨摘要對學生一講。聽者所表現之熱烈，歡欣和向往的情緒，加強著著者着手撰寫本書的勇氣和興趣不少。

當著者於去暑的溽暑中開始撰寫本書的時候，正是日本在東方侵佔了全部的南洋，拆斷了滇緬路，而希特勒在南俄開始了夏季攻勢，直奔斯大林格勒之時。當時，全世界的景色殘覺黯淡，而我們的處境亦更見困難。

正如長夜之未盡，又來了一陣更黑的黑暗。因而，不少的人又頗爲中國的前途悲觀。本書之匆匆地於彼時著筆，期能早日出現，除課堂的要求外，亦自不無有意藉本書的出現，權作爲一面破曉時分的鼓角，藉助我中華民族之能更勇毅地衝破那一刻黎明之前的黑暗。然而最有意義的，待本書行將脫稿之時，世界形勢已另以截然不同的新容色呈現於吾人的眼前。惟其如此，在同盟國的自己世界內。也就很迅速地開始了一個新國際政治的新時代。隨着去年中國國慶日的來臨，英美兩國曾採取了重大的步驟，正式宣告放棄各該國在中國之治外法權及其他有關權益。經了兩個月的接洽和商酌，中英和中美間的新約，即於本年元月十一號在重慶和華府同時簽訂。這樣一來，本書的出現，亦正可作爲一份慶賀中國脫百年桎梏，重復自由的賀儀了。

英美之宣告放棄在華特權，而願同中國另訂平等互惠的新約，表面看，固只在承認並尊重中國之國際新地位的既成事實，以滿足必須滿足之中國民族願望，然實亦藉以表示她們已在對整個亞洲作巨大的政治讓步。企望藉助於這種讓步，能達到對日本來一個政治反攻，至少是遏阻着日本之政治攻勢。世界戰爭到了現階段，英美已開始認識，要想同盟國，最好說要想英美之能在世界，尤其是在東方獲得勝利，是非先獲得亞洲人民之同情的支持和積極的參加不可。而此同情的支持和積極的參加的獲得，卻以通過中國的號召和保證爲最有力。基於這種機敏的認識，威爾基才肯前於訪華之便，把重慶當作爲唯一無二之適宜講壇，對亞洲廣播慰問之聲，而英美政府也就採取了重大步驟，對中國先作巨大的政治讓步，承認並尊重中國之國際新地位。然亦惟其如此，緊隨着中國國際新地位的確立，以及橫陳在自由平等的新中國而前之偉大的亞洲前途和世界前途的光芒之已在遠遙的天際閃現，卻已使得英美人士中之神經過敏者，或可說英美人士中之深懷民族偏見者，爲之惶惑而恐懼。在他們看，他人之自由，復興，與繁榮，似即是世界和平之威脅或危機。所以他們於束縛中國百年之不平等等約剛剛廢除之後，即隨之發出告警的呼聲。不是說，「戰後的中國要稱霸亞洲」；便是說若讓中國民族主義之自由發展，或會構成未來世界之新危機。甚至還有人更荒妙地從中國之獲得自由平等幻想到中世紀之蒙古式的世界帝國之重演。

爲了要遏止此等濃含毒氣的流言的發展，中國的朝野人士們，尤其是報紙界，似已盡了相當的努力。但除中國最高當局所發表之嚴正的聲明外，一般的論旨，大都是側重於申述中國已開始踏上了『民主』之道，正在努力於『民主化』。他們的意思是告訴英美友人說，目下的中國正在建設一個『民主主義』的新國家，不會走上反『民主主義』之道，請英美的朋友們放心吧！

這樣的申述，或可說這樣的自白，或會獲得英美人士之同情，亦或會爲英美人士所接受。（如拉鐵莫爾和賽珍珠兩先生所報導於我們者。）然這樣的申述和自白，只是一個極籠統的申述和自白，而所能獲致盟邦的同情和接受，亦自只是一個極籠統的同情或接受。盡其量，這只是盡了消極的社疑。如欲使盟邦，使世界之能明確的了解中國，了解中國之將永不會走向帝國主義——任何形式的帝國主義，以及戰後新中國之應有之自然的與合理的亞洲前途和世界前途，則我們卻認爲亦應從『中國之國』的國家本質上來說明來保證。此類的說明和保證，不但莊嚴有力，而且更真切可靠。

榮幸的很，也可以說是巧遇的很，當本書出生之初，就適逢其會地參加了『中國之國』之重獲自由的慶祝，也適值其時地對『中國之國』稍盡『自我認識』與『自我介紹』之責。我們自然是很希望國人和世人之能有機會一閱本書，賜予指教。如果他們或她們有機會閱讀之後，想他們或她們或不會再關懷『中國之國』之『民主』或『不民主』，更不會再擔心『中國之國』會不會參造爲一個好戰嗜殺之龐大可怕的全能國家，或中世紀之蒙古式的世界帝國。而同時，也或者不會再爲『中國之國』之在未來之亞洲的政治、經濟、文化諸生活中和未來之世界的政治、經濟、文化諸生活中，所應居之自然而合理的地位，而惶惑，而恐懼。

三十二年，元月，二十六日，羅夢册序於重慶，南溫泉，中央政治學校。

「在沒有體系及科學機構的地方，仍然是有真理的。而且在這種場合，真理大概只有棋波熟悉的判斷和長久的經驗才能看得出來。歷史雖然在這裏沒有那樣給與一個公武，但和其他一切場合一樣，在這裏也對於判斷給了一個練習的機會。」

——克勞塞維慈 (Clausewitz) 戰學論。

第一講	中國之國之自我再認識	一
第一節	知已知彼才能夠善處國際	一
第二節	「中國之國」之自我再認識	三
第三節	「中國之國」與中國之世界主義	一四
第二講	中國天下國與其他之帝國族國	二〇
第一節	從「中國天下國」說到國家的分類	二〇
第二節	國家的起源與古帝國之首先出現	二五
第三節	「帝國」「族國」與「天下國」之分道揚鑄	三〇
第三講	中國之國之所以為中國之國	三五
第一節	東方情調與西方情調	三五
第二節	中國何以是中國與西洋何以是西洋	三九
第三節	中西歷史與大陸海洋	四二
第四講	中國歷史走到了西洋歷史的前頭	五〇
第一節	一部中國史是一部農夫活動史	五〇
第二節	一部西洋史是一部水手活動史	五六
第三節	中國歷史走到了西洋歷史的前頭	六一
第五講	中國之國之急進性與迂緩性	六七

第一節	「中國之國」之急進性與迂緩性	六七
第二節	「中國天下國」之治理與儒法黃老	七二
第三節	「中國之國」之歷史發展與所謂「一治一亂」的循環	七七
第六講	中國天下國與西洋民族國之相遇	八四
第一節	「中國天下」與「西洋世界」的相遇	八四
第二節	中西戰爭與「中國之國」之戰敗	八七
第三節	「中國之國」之何以戰敗	九九
第七講	中國之國之現代化與三民主義新中國	九九
第一節	「中國之國」之改革運動	〇五
第二節	三民主義的出現與「中國之國」之現代化	〇五
第三節	三民主義新中國正在向世界宣告誕生	一一

中國論

第一講 中國之國之自我再認識

第一節 知己知彼才能夠善處國際

在中國之古兵書上，有兩句極有權威的話，就是：「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當天才的軍事家孫子在彼時說這話的時候，自是專就戰陣之事來講的。兩千年來，這兩句名語雖慣爲國人所樂道，所喜引，也都是專就兩軍戰陣或私人交往之事作對象。時至今日，我們卻不妨將這兩句名言所指示的真理擴大應用，並莊嚴應用，應用到今日欲立國於世界之上的國家民族的身上，進而認爲：只有「知己知彼」才能夠善處國際，在國際自立自見；遇到危難，才能夠自衛自救；遭了困頓，才能夠不失信心，不迷方向，邁向偉大的復興或更生之途；而一旦「否去泰來」，國運好轉之時，也才能夠深切理解並從容說明其所以由然的道理，不致被他人，甚至被自己，視爲是一個神秘的奇蹟，或意外的意外，招致國際的驚訝與惶惑。

但「知彼」不易，「知己」或者益更難。想「知彼」自須始從「知己」起；而「知己」之始，又自須首先明白「彼」「己」「同」「異」之分。

站在人類的立場上看世界，看世界之上的民族或國家之羣，我們或會只見其「同」，而不大見其「異」。同時，我們也只應重視其「同」，而忽視其「異」。但如果站在民族或國家的立場上看世界，看世界之上之各個的民族或國家，我們固仍可見其「同」，卻亦見其「異」。雖不應過分的注視其「異」，而忽視其「同」，但卻不應亦不能祇注視其「同」，而忽視其「異」。當此人類社會所利賴的交通互其已日新月異，世界距離已達



到驚人的收縮的今日，自甘於『遺世而獨立』之『悠閒自得』或『我行我素』的時代，或可說自閉於『孤陋寡聞』或『抱殘守缺』之所謂『閉關時代』，已是早成過去了。如果一個民族或國家不願成爲一個時代的落伍者，不願爲時代所淘汰，已不容不把自己的視野儘可能向世界擴大，注視着世界之『同』，或人類之『同』。但反之，祇敢於人類之『同』，而忽視各個民族或國家之『異』，或誤以他人之『異』爲人類之『同』。則極身揀殺一時居於劣勢的民族或國家之自我存在，和其自我存在之所憑依之優良的歷史傳統。久而久之，會要喪失一個民族或國家的自信和自尊，陷於『不自知』和『不知人』的困境；一遇危難，就要徬徨徘徊；遭了困難，每易自暴自棄。甚至於一旦危難解除，地位改變，亦將會仍是茫然不知所之，不知所云。

例如鋼鐵煤電油之經濟生活，和獨立自由與國際共處之政治生活，乃是現代任何民族或任何國家之所必須取得或達到的現代生活，也是現代任何民族或任何國家之所能取得或達到的現代生活。或可說這正是現代任何民族或任何國家之所必須賴以生存和進步的生活基礎。這乃是世界人類之所『同』，之所應『同』，亦所能『同』。如果某一民族或國家未能及時完成或達到這種生活，自會造成該民族或國家在生存和進步的途程上之嚴重的危機和災難。若是某一民族或國家至今尚不知道，或尚未注意，去爭取這種生活，仍是自甘於『馬車』，『帆船』之古舊的經濟生活，或『殖民地』，『次殖民地』之奴役的政治地位，則這個民族或國家不但是不能與人家一同前進，或協助他人前進，勢必成爲一個時代的落伍者；甚至爲時代所淘汰，而喪失其存在。但在此大的『同』下，各民族或國家卻各有其各自的歷史傳統或民族生活。英國有英國的歷史傳統或民族生活，法國有法國的歷史傳統或民族生活，德國有德國的歷史傳統或民族生活，俄國有俄國的歷史傳統或民族生活，美國有美國的歷史傳統或民族生活，而中國有中國的歷史傳統或民族生活；其他國家亦各有其各自的歷史傳統或民族生活。雖然她們今日同樣地生活於鋼、鐵、煤、電、油之經濟的和獨立自由與國際共處之政治的現代生活之中，她們卻仍然各自分別地享受着，珍惜着，尊重着，甚至捍衛着她們各自的歷史傳統或民族生活。這乃是各民族或國家之所『異』。某民族或國家之所以爲某民族或國家者正在此。

中國所習過所喜愛的民族生活或國家生活，不會適合，或可說不會完全適合於乙國或丙國的國情，故自不會亦自不能定爲乙國或丙國所喜愛，所接受，或全面地所喜愛，所接受。因爲甲國的歷史和傳統既非乙國或丙國的歷史和傳統，自不可能出租於乙國或丙國，爲乙國或丙國所借。乙國之與丙國或甲國，或丙國之與甲國或乙國，也是如此。如果生吞活剝地硬要假借，不但是會要犯『張冠李戴』，全不合適的病症，而且極易中『文不對題』或『藥不對症』的毒害。

固然，任何的一個社會或國家都會或都要隨着時代的不同或環境的改變而變革，可能發生巨大的變革或猛烈的革命。但是這一切的改革或革命，都是以某一國家的歷史和傳統作背景作對象，不是某一個國家的歷史傳統的推進或發展，便是它的改革或修正，絕不會憑空而來，與各該國家的歷史和傳統毫無關係，而來一個照抄他人的改革或革命。一個國家的改革或革命固每會影響他國，也每會受他國的影響，但這種影響之對於另一國家的改革或革命的本身，都只是一個次要的因素，不過是一種刺激，鼓勵或參考而已。

我們知道，一個民族的歷史和傳統，不但支持着，作用着，範型着一個民族的過去和現在，亦將支持着，作用着，範型着一個民族的未來，甚至是遙遠的未來。或可說，在人類還未走進於『大同世界』，所有的國家機構和功能尚未全部消滅之前，某一民族或國家的歷史和傳統之對於某一民族或國家的生活，是仍要起着重大的而且決定的作用。

惟其如此，一個民族或國家如欲安全的生存和自由的進步，不但是要隨時隨地的注視着世界之『同』，和他人之長，並應首先澈頭澈尾地理解了自己。理解自己之歷史和傳統，並尊重自己的歷史和傳統，尤其是優良的歷史傳統。也正是所謂既須『知彼』，尤貴『知己』；唯有『知己』，才能『知彼』；亦唯有『知己知彼』，才能夠在國際間自立自見，才能夠善處國際。

第二節 「中國之國」之自我再認識

自然我們所說的這三個「知」，不是「妄自尊大」之「知」，也不是「妄自菲薄」之「知」，而是從「自我反省」，「自我批判」，「自我認識」和「自我再認識」之深處所得到的一個「真知」。

說到這裏，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也就因之發生下。這個問題就是：我們中華民族，或可說我們的列祖列宗們，對於我們中國國家，最好說對於我們的「中國之國」，是不是一向是有着正確的自我認識？近百年來，身處於這一個千古未有的歷史變局之中之我們前兩代前一代和我們這一代的國人，對於我們中國國家或「中國之國」，又是不是有着正確的自我認識？或者愈正犯着認識不清，認識不足，甚至嚴重墮曲我誤認的病症的呢？

要回答這個巨大而切要的問題，自只有從歷史溯起。

中國的古代史，中古史，和近古史，尤其是中國的政治思想史，曾經告訴我們說，我們的古先民，我們的列祖列宗們，對於我們中國的國家和民族，差遠能一向地保持着正確的認識；至少是相當正確的認識。因而，他們也一向是懷着強烈的自信和自尊的心境去看待我們中國的國家和民族。

即就嚴格的歷史年代講，中國人把「中」字和「國」字連用在一起，漸次形成爲一個具有具體內容的專名辭——「中國」，用以明確地代表並說明一個特殊的，高級的，前進的政治區域，政治生活，政治形式，或文化區域，文化生活，文化形式，或民族區域，民族生活，民族形式，已遠始於兩周之世。然我們仍可得而言者，先「中國」一辭之出現和存在，似已早有一些與「中國」一辭有着同意義或前行者的名詞存在着。例如意爲從野蠻世界逐漸興起之文明世界的「禹跡」，「禹績」和「九有」，以及意識着中居「四方」之「中」或「天下」之「中」的「商方」或「中商」。

我們知道，遠在殷、商之前，或可說遠在夏、商之世，以迄兩周之際，當我們的古先民們在當日爲鳳夷、黃夷、吠夷、淮夷、于夷、方夷、或鬼方、人方、土方、井方、馬方、羊方、囑方、或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諸蠻族所包圍之東亞大陸的核心——黃河中下流——烈山澤、驅猛獸、開阡陌、治河渠、布五穀、樹桑

廡、建宮室、築城廓、造文字、作書契、創造出了『中國作風』，中國氣派，『之東方型的文化或文明』之後，就漸次地開始了『維禹之績』，『九有有載』，和『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以及『華夏蠻貊，罔不率俾』，『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和『追於中國，則中國之；進於夷狄，則夷狄之』，『之文明』與『野蠻』的區分的覺識。他們也就自稱我們自己爲『禹績』，爲『九有』，爲『中商』，爲『華夏』，爲『諸夏』，爲『中國』。

這自是說，我們之各該當時的古先民們不但已自覺地覺識到，我們自己之在各該當時已有一個『禹績』，『九有』，『中商』，『華夏』，『諸夏』，『中國』之『國』的創造和保持，而且還自覺地覺識到，我們這一個『禹績』，『九有』，『中商』，『華夏』，『諸夏』，『中國』之『國』是比各該當時之野蠻的風夷、賈夷、吠夷、淮夷、于夷、方夷、或鬼方、人方、土方、井方、馬方、羊方、閩方、或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來得文明的多。或可說，他們不但已自覺地覺識到我們這一個『禹績』，『九有』，『中商』，『華夏』，『諸夏』，『中國』之『國』是比各該當時之風夷、黃夷、吠夷、淮夷、于夷、方夷、或鬼方、人方、土方、井方、馬方、羊方、閩方、或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來得文明，而且自覺地覺識到這一個『禹績』，『九有』，『中商』，『華夏』，『諸夏』，『中國』之『國』應當並可能化各該當時之風夷、黃夷、吠夷、淮夷、于夷、方夷、或鬼方、人方、土方、井方、馬方、羊方、閩方、或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的野蠻，而化入於這一個『禹績』，『九有』，『中商』，『華夏』，『諸夏』，『中國』之『國』之文明中。結果，各該當時之野蠻的風夷、黃夷、吠夷、淮夷、于夷、方夷、或鬼方、人方、土方、井方、馬方、羊方、閩方、或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也就先後地融於這一個『禹績』，『九有』，『中商』，『華夏』，『諸夏』，『中國』之『國』的文明中。

我們閱讀歷史，讀到了這些歷史時代，讀到了這類史績，不但是不覺得我們的古先民們有什麼『優越』，而且不能不驚嘆他們之自我認識的正確。自然，這一個充溢着自覺性和創造性的自我認識，不是他們於

之政治和文化的名號了。當漢人、唐人、宋人、明人、或漢、唐、宋、明、之後的後人，對外提說『大漢』，『大唐』，『大宋』，『大明』，如何如何，或『漢』，『唐』，『宋』，『明』，如何如何的時候，他們所說的漢、唐、宋、明、已不再是一個王朝或朝代，而是各該時代的『中國之國』，或各該時代之『中國之國』的政治或文化。而並且當他們說的時候，他們意識着他們所說的這一個『大漢』，『大唐』，『大宋』，『大明』之『中國之國』之於各該當時之已知的世界，就是一個『天朝』或『上國』的自稱或代詞。久而久之，這一些『漢』，『唐』，『宋』，『明』，等字的使用，尤其是『漢』，『唐』二字的使用，也就於無言中含有中國政治或中國文化之在各該當時之爲如何的『文明』，『進步』和『偉大』的自覺和自尊。

秦漢之間，中國人之自稱『中國之國』爲『漢』，『唐』，『宋』，『明』，或『大漢』，『大唐』，『大宋』，『大明』，而於謙沖敬讓之中接受『天朝』或『上國』之地位和職責，正同先秦時代，中國人之自稱『中國之國』爲『禹績』，『九有』，『中商』，『華夏』，『諸夏』，或『中國』，而於『文明』和『野蠻』的識辨之中接受了『文明』者的位地和職責一樣。這不是由於我們古先民們的狂妄或自大，而是由於他們的自覺和自責。惟其自覺，才能自責；亦惟其自責，才加強着他們的自覺。

但世變推演，今已非昔，歷史環境，或歷史發展之於中華民族，自不會求世如一。由於近百年來東西兩大世界之猝然地相遇和相交，曾給予中國歷史一個千古未有的變局。而我們的前輩人，甚至我們自己這輩人，也就全無準備地置身於這一個非常的歷史變局之中，而爲她所困惑。清末人不認識與他們猝然爲隣的新隣人（西洋世界的民族和國家），誤解着與他們猝然爲隣的新隣人，雖尙知守護自己，重視自己，然實已不再認識自己，並開始誤解自己了。他們於中國幾次地被西洋戰敗之後，自己的生存已太受威脅之時，仍是堅持着中國是『天朝』，是『上國』，葡、荷、英、法、德、俄、美、意等國是『蠻貊』，是『四夷』，不但是不足以說明中國人之仍然具有自我認識，正是反面說明着我們的前輩人之不肯正視新的事實，已開始誤解着自己。他們不知道『中西相遇之後的新世界』已非我們古先民們所處的舊天地。

居於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或五十年代的今日，居於「歐風美雨」已經使襲到地球上每個角落的今日，如果有人仍然是閉着眼睛，像清季同光時代的士大夫一樣，極頑固地堅持道：「中國是天朝，是上國，英、美、法、德、意、西、葡等國是蠻貊，是四夷，」自是一篇極過時之論。民初以來，講這話的人已經不多了。然民初以來，一般國人雖稍知我們的隣人，卻忽視了我們自己，甚至否定了我們自己。因而，他們正像清末的人一樣，甚至有甚於清末的人，對於我們自己的國家和民族，不是認識不清，便是犯着嚴重的誤認。

民初以來，甚至是一直到最近之最近，一般國人對於我們中國國家或「中國之國」的自我認識是如何的呢？他們曾經如何地介紹我們「中國之國」呢？

講起來，（若是認真的講起來）則至爲遺憾。除了極少數之先知先覺者，和一二好學深思之士外，就一般的論，一般國民對於我們自己的國家總是一種極模糊的概念。我們常常聽到有人外強中乾的說：「中國是一個地大，物博，人衆的大國」，或「中國是一個有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也有人無所謂的說：「中國是一個老大帝國」，或「中國是一個落後的國家」。還有人更斷章取義的說：「中國是一個弱小民族」。這是一些何等粗俗又何等膚淺的解釋，尤其是後者，更是一個何等幼稚而有害的自我介紹啊！

此外，另有一種人，固不像一般人對於我們國家的自我認識之模糊和不負責任，但不幸，他們卻又爲西洋近代政治產物之西洋國家——狹隘的民族國家——的觀念所蔽。這些人，大多是受過西洋近代文化的洗禮，而且懷有極強烈的民族意識和國家觀念的人。他們不提到「國家」二字則已，一提到「國家」二字，總是認爲西洋近代政治產物之民族國家，如英、法、意、德、俄、美等國家，才是「國家」。因而，當他們一談到中國，或有關中國之諸問題的時候，就馬上意識着一個西洋國家，從西洋國家的「國」字的各角度來觀看中國，或來審判中國，來觀看或審判有關中國的諸問題。或者，是他們先胸有成竹地拿着西洋國家的模範，鏡或尺度，沒無從此地向「中國之國」的臉上比，顯上坎，身上量。比來比去，坎來坎去，或量來量去的结果，很容易地會使得他們惡惡觀地覺得，我們中國既不像英國、美國、法國，也不像德國、意國，也不像俄國，乃是一個國不像

的國家。中國人一向是沒有民族意識，也沒有國家觀念，真是像「一盤散沙」一般。因而，就有人會同意那少數外人之皮相的說法，認為「中國的文化乃是一種非政治的文化」。因而，也就有人認為我們「中國還不是一個國家，還沒有一個國家」。因而，也就有不少的人覺得我們中國事事都不如人，自慙形穉地廁身於英、美、法、德、意、蘇等國家之林。直到現在，不少的國人還在嚴重地誤解着「抗戰建國」四字所涵之正確的意思。他們似乎是把戰爭當作是一個奇蹟，我們中華民族將會從這一個奇蹟中無中生有，白手起家，憑空地創造出一個國家來。這自是等於說：我們中華民族已窮在無國家，無組織之非政治或無政治之生活中鬼混了幾千年，從明天起，我們中華民族要一躍而登於「國家」之域，才開始過有國家有組織之政治生活。而且這種即將開始來的國家生活，不是德意式的國家生活，就只有是英美式的國家生活了。

誤解所及，影響最大。因為「中國之國」之不像西洋近代政治產物之民族國家，一方面是一直至最近之最近，還在苦惱着不少的學者專家，不少的有心人，不少的愛國救國的志士們；而另一方面，也就有不少的人由動搖到幻滅，懷疑了我們自己的國家和民族的未來與前途。抗戰軍興，一部分意志薄弱之徒走向漢奸投降的死路去，大部是由於這種動搖和幻滅的意識在作祟。

隨着中國抗日戰爭之能繼續邁進，以及當此世界強國頻頻銷亡之頃，中國國家獨能於此驚濤駭浪之中年復年地平安渡過，一般國人的自信和自尊，固已千真萬確的較之前大為增強。而同時，由於中國之能於此短短的數年之內，從所謂四分五裂，一盤散沙，以及無民族意識和國家觀念的絕地，迅速地完成了全國的統一，堅固的團結，並能另以具備有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濃厚的國家觀念的新姿態和世界相見，同大敵週旋，前此痛惡中國「不是一個國家」的過激論者或悲觀論者，因已格於這一個新的情勢，不能不改換論調。然此等自信自尊的增強，以及悲觀論調的改換，只不過建築在一般的人們和世人對於「中國之國」之在此六時代中所有表現之極表面的反應，並非早已達到自發的理解了「中國之國」的本身的特質。

這期間，在中國諸盟國中，不少的名流學者，甚至第一流的政治家們，曾一再地為「中國之國」在最近

五年前所作之偉大驚人的表現和成就表示欣喜，彼亦曾一再地爲「中國之國」在最近五年中所作之偉大驚人的表現和成就深感困惑。因而，他們時時地對中國發出苦悶的或無名的讚頌。待到緊隨着中國之長期抗戰而來之最後勝利的在望，與整個亞洲之政治覺醒，迫推着國際政治轉入於一個嶄新的新時代，英美兩國已不能不於去多採取重大步驟，宣告廢除各該國在華之治外法權及其他有關權益，中國的國際地位已隨之而來一突進的時候，一般國人也就開始大談其「中國已是四強之一」的強國論。這不但意識着中國在戰後一定會建造成爲一個像英美一樣的強國或英美的強國，而且意識着我們中國在尚未「建國成功」之前，即已是一個「強國」了。等於說，我們中國之「建國成功」，倒反落在我們中國之已經成功爲一個「強國」之後了。

不僅如此，或可說惟其如此，近五年來中國在亞洲大陸上所作之表現與成就，和由此等表現與成就即可推而知之的偉大前途，已漸次使得世界各國，甚至我們的盟邦，不無爲之「一喜一懼」，終至惶惑不安了。緊隨着英美在華特權之自動廢棄的宣布，在英美兩國之內，已有不少神經過敏者，或極端自私自利的人們，出而高唱其對華早作戒備論。他們認爲，「具有四萬五千萬人民的中國，如讓其民族主義自由發展，是會很容易地構成世界和平的新脅威。」因而，他們主張「在戰後的遠東，應建立起一種平衡力或均勢制度，使中國在亞洲不致於獨自強大，或過分強大。」結果，爲平息這類錯覺的蔓延，竟勞得我們的最高領袖不能不於此對敵作職正軍容仿午的時候，出而向世界，向盟邦，特作明確而嚴正的聲明：「中國絕無意領導亞洲」。

這種以人爲的方法增加同盟國家間的誤解，固不無部分的事出有心，然而大部分的造因，卻不容不說是由於他們之太不了解了「中國之國」。自然這種「不了解」的責任，與其委之於我們的盟友，還不如歸之於我們的自身。我們在前邊，不是已經反覆地說過了，一般國人對於我們自己的國家不是認識不足，便是犯着嚴重的誤認嗎？自己尙且如此，還怎能反責我們的隣人。

但所幸，當我們中華民族從近百年的歷史困頓中漸漸翻身，開始踏上復興或重獲自由之途的時候，或可說當中華民族即將爲自己的歷史另開一個新時代的前夕，不無有極少數的人已潛從「妄自菲薄」與「妄自尊大」

的間隙之間，轉進於『自我反省』，『自我批判』和『自我再認識』之另一境地。適於此際，在中國學術思想的領域內，歷史學，政治學，以及哲學等學科的水準也達到了驚人的提高。已有可能使一二軒學深思之者在對中國國家和中國歷史之『自我反省』，『自我批判』和『自我再認識』之深處，漸次辨明近來為一些自命開明的士大夫，或可說為一些悲觀派的憂國之士們，所倡導之『中國還不是個國家』，還沒有個國家』的論調的謬誤，以及近一時為部分的英美人士所放播之『自由強大的新中國即將是世界和平的新秩序』的流言之荒唐。並進而確認：中國不但早已是個國家，而且這一個氣派偉大，性格溫和，生活豐富，而生命力最為堅韌的中國國家或『中國之國』，和西洋近代政治文明的民族國家，以及近中東世界與歐洲世界之古今帝國，乃是三種生長並存在於不同時空之中之不同類型，不同範疇的政治組織，政治生活，政治精神和國家形態，不能混為一談。

爲了尊重歷史的尊嚴，或可說在我們面對偉大祖國之光榮的過去，偉大的未來，以及其現時代的苦難和被人誤解之嚴重，來一個痛徹的『自我反省』，『自我批判』和『自我再認識』之後，卻使得我們不能不立即坦率而莊嚴地向國人提聲，並向世界宣告：

中國或『中國之國』，在過去，或可說一直到現在，不是一個『族國』（民族國家），也不是個『帝國』，而是一個超『族國』反『帝國』的『國家』；而是一個『國家』，又是一個『天下』，——而是一個『天下體系』，『天下機構』或『天下國家』。惟其她是一個『天下體系』，『天下機構』，『天下國家』，她才不是一個狹隘的排他的『族國』，她才不是一個征服擴張式的『帝國』。

就某一方面講，無容諱言的，『中國之國』現正落伍於西洋『民族國家』之後，而就另一方面講，『中國之國』早已走在『民族國家』和古今『帝國』之前，比之『民族國家』和古今『帝國』來得前進的多多。『抗戰建國』四字之正確的意義，是不應把戰爭當作一個奇蹟看；我們要從這個奇蹟中無中生有，白手起家，憑空地創造出一個國家來，或我們要從這個奇蹟中無中生有，白手起家，憑空地創造出一個英美的國家，或德意

式的國家，或中世紀蒙古式的世界帝國來。而是應把戰爭當作是一件必要的或最後的手段看；我們中華民族現正以戰爭作為最後的手段，掃除並解放「中國之國」——一個「天下體系」，「天下機構」或「天下國家」——在生存和蛻變的途程上所遭受的威脅，追害與障礙，使得「中國之國」——一個「天下體系」，「天下機構」或「天下國家」——能夠自主自由地生存於現世界之上，並能夠自主自由地從中古式的經濟生活中過渡到鋼、鐵、煤、電、油、的現代。然後再以她的新地位，新生活，與由此新地位新生活所產生的新力量，為世界的和平人類的福利，作巨大的貢獻。不平等條約的廢除，不是說中國之已為或將為英義式或德意式的強國，而是說「中國之國」之已在生存和蛻變的途程上獲得了自由和解放。

中國人在過去，不是不能夠把中國建造成為一個國家觀念濃厚，民族意識強烈的狹隘的或緊嚴的民族國家，也不是不能夠把中國建造成為一個由征服而統治之鎮壓剝削式的帝國，只因為順應她以前所獨處的時空的要求和歷史的發展，未走向狹隘的，排他的征服鎮壓的國家主義或帝國主義之路，而邁上寬大容忍之兼容並包的世界主義或「天下主義」（也就是中國人一向稱頌的「王道精神」）之途。結果，乃「薄狹隘排他式的民族國家而不為」，亦「薄征服壓榨式的帝國而不為」，建立了並保持着一個寬大的，承納的，超「族國」，反「帝國」之「天下政治」，「天下機構」或「天下國家」。

由於「中國之國」的處境的不變，或可說由於中國歷史或東方歷史大變局之突然迫來，中華民族須要把中國之既成之「天下政治」，「天下機構」或「天下國家」加以適時的改造，或痛徹的修正與補充。須要使中國人民也起而重視民族意識和國家觀念。最好說，須要把這一個「中國之國」從「遺世而獨立」之「悠閒自得」或「無為而治」之政治生活中，和馬車帆船與手工生產之古舊的經濟生活中，過渡到適於國際共處之熱鐵的國際生活中，和機器生產之鋼、鐵、煤、電、油、的現代的經濟生活中。自是不容我們否認或忽視之鐵的事實。但為求適應上述諸需要的施政或國策之能達到正確的設計和執行，不致誤入歧途，或不致「自戰誤認」或「被人誤解」，一個先決的問題卻須要首先解決。

這一個先決的問題，就是：我們須要首先理解何爲「中國之國」。我們須要首先理解，正如我在前面之所宣告者，我們這一個「中國之國」和西洋近代政治產物之「民族國家」與近中東世界歐洲世界之古今「帝國」，乃是三種生長並存在於不同時空之中的不同類型不同範疇的政治組織，政治生活和國家形態。遠在東方世界和西洋世界相遇之前，中國不但早已是一個國家，早已有一個國家，而且這一個「國家」，還是一個超「族團」反「帝國」的「國家」；是一個「國家」，還是一個「天下」，——是一個「天下政治」，「天下機構」，「天下國家」。

客觀存在中之這一歷史事實，也就是中國是一個「國家」，又是一個「天下」這一歷史事實，也就是「中國之國」是一個超「族團」反「帝國」之「天下政治」，「天下機構」，「天下國家」這一歷史事實，乃是古今來有關中國之一切問題的核心。

若是不具有這種認識，只是「依樣葫蘆」地站在西洋近代政治產物之「民族國家」的觀點上看中國，或以近中東世界和歐洲世界之古今「帝國」例中國，則我們自必爲嚴重的錯覺所誤。有鑑於過去中國人民之民族意識國家觀念的缺乏，以及中國人民之確如「一盤散沙」，不但是會同意少數西洋人所倡之「中國文化乃是一種非政治的文化」的謬說，而且是不能不認定中國人的政治才具是低能是劣等。人家早已各自建立起一個民族意識濃厚國家觀念強烈的民族國家，我們遲至今日還未能。再不然，剛剛相反的，看到今日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的勃發，國家觀念的強烈，也就會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突變，轉而認定，所謂「建國」，就是中國要很快的建造成爲一個英美式的「民族國家」或德意式的「民族國家」。甚至，中國民族主義之過分發展，即將會變成爲一個天字第一號的全能國家，再來一次中世紀之蒙古式的外侵，坐使全世界爲可怖的「黃禍」所氾濫。在這種嚴重的錯誤認識下，我們不但是再讀也讀不通中國史，而且是再談也談不通有關中國之一切問題了。要談的話，是一談就錯。但反之，如果我們打破了西洋近代「民族國家」之國家觀念所加於我們的桎梏，並排除近中東和歐洲之古今「帝國」所給予我們的暗影，理解了上述之重大的基本要點，則我們不但是能夠左右逢源地讀

過了中國史，一談到有關中國的問題的時候，就會馬上抓着它的重心，而且是將會恍然大悟覺悟到，惟有中國文化，才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政治文化；也惟有中國文化，才是人類社會中最和平的政治文化。中國人的政治天才，組織能力，以及其爭取和平和維持和平的魄力和決心，不但是高踞於世界上和歷史上最富政治才能之古代的羅馬民族和近代之盎格羅薩克遜民族之林，並起而過之。

講到這裏，或須要我們及時地鄭重指出，我們所作之上述論述，乃係來自於客觀存在中的歷史事實，非出於著者之閉門杜撰。讓我們就在接下的篇幅中來一個簡要的說明。

第三節 「中國之國」與中國之世界主義

人類的歷史，或可說人類世界史，曾經告訴我們說：就全人類之總的動向及其所處之總的時空來講，人羣所營之社會生活的階段，自有它的一般性或統一性，但因經濟條件的不同，或自然環境之有異，於大的版中或統一中，卻每每顯現其個別的特殊。惟其如此，才有東方世界，近中東世界和西方世界的區分。東方世界，近中東世界和西方世界之內容和風格的不同，固易看到，但其最大的或最要的不同所在，而且一向為世人所忽略的地方，卻是這三大世界之「歷史人格」和「政治作風」之不同。關於他們的「歷史人格」的不同，我們曾在另一譯中再詳細討論；在此處，我們先討論這三大世界的「政治作風」之不同。

就近中東世界，西方世界和東方世界之「政治作風」的不同來講，我們可以簡明而扼要的指出：一個走的是「帝國之路」，或帝國代帝國之路；一個走的是「族國之路」，或國家主義之路；而另一個走的乃是「天下之路」，或世界主義之路，或「天下主義」之路，或「王道主義」之路。

走上「帝國之路」的，或可說走上以帝國代替帝國之路的，是近中東世界。走上「族國之路」，或國家主義之路的，是西方世界。而走上「天下之路」，或世界主義之路，或「天下主義」之路，或「王道主義」之路的，乃是東方世界——東方世界的代表人，中國。

近中東世界不是從未作過世界主義之夢，只是佛教，回教以及猶太教之先知者和教主們的『向世界夢』，早已被沙漠草原上之新舊的遊牧者之兇悍的馬蹄所踏得粉碎。西方世界也不是從未作過世界主義之夢，但當西洋中世紀天主教之宗教的世界主義和近世社會主義者之經濟的世界主義還未在西方世界出現前的千餘年和兩千年左右，東方世界的古文化之世界主義，或『天下主義』，或可說『王道思想』，已開花結果。也就是說，中國儒家之政治的世界主義，或『天下主義』或『王道精神』，即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平天下』和『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教大同』，之崇高的姿態出現於東方世界之內的中國。不，當儒家之政治的世界主義或『天下主義』或『王道思想』出現於東方世界之內的中國的時候，或遠在它出現於中國之前，中國人已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實踐方面造成了『一個政治的天下』經濟『天下』和文化『天下』的既成事實。

傳疑中的黃帝，堯、舜、禹、時代，固屬中華古帝國的初創時期，而且這個古帝國的政治範圍，也只限於黃河中下流的中原或古華夏的一部，但是經過了夏商兩代的政教經營和化育，到了周代，整個的黃河流域和淮、泗、一帶已形成爲二個部族繁殖五穀昌茂和人文蔚起的『天下』。同時，當周部族繼承於夏商兩代之後，跨登了中國政治舞台的時候，中國人在政治，經濟和文化諸領域所積累和所承受的財產已較前雄厚得多。因之，中國人在政治，經濟和文化諸領域所能作的活動，也獲得更聰明，更勇敢和更開闊。就在這個時候，中國人不但在實際政治的領域內發現了一個超『部族』超『邦國』之『天下』的存在，而且更前跨一巨步地把握着了這一個超『部族』超『邦國』的『天下』的存在。他們開始以天子作元首，以至畿或諸夏作中心地，大規模而且具有計劃地利用『國家封建制度』的統治政策作連絡，集冷各式各樣之大大小小的部族和邦國，建立起一個寬大的和聲忍的『天下政治』或『封建天下』。也可以說，因了經濟條件或自然環境的偉大，中國之太古帝王，經過了夏商兩代的蛻變，到了周代，已由一個『爲一個強力民族（或部族）以干戈作利器統治其他民族（或部族）之征服鎮壓式的大帝國』過渡爲一個『由一個領袖民族（或部族）以封建制度作連絡和其他衆

多民族（或部族）裂土而其治的天下」。

周天下所包括的部族，或可說周天下所封建的邦國，究竟有多少？我們在今日固已無從確計，不能亦不必確認一定有「萬邦咸休」，「協和萬邦」和「萬邦作乂」之「萬邦」，但以春秋前夕仍然存在的部族或邦國的數目之多作推斷，周天下在盛時所包有之部族或邦國，可少至數百，多至千餘，或數千。

周人之封建制度和寬鬆的「天下體系」或「天下機構」，在當時，自是一種極進步的政治制度，政治組織和政治生活。但是，隨着周天下之內之經濟的發展，民族的交融，和文化的進步，到了春秋時代的初期，這一種寬鬆的封建政治，已不足以適應時代的要求，而逐漸地趨向於沒落之途。結果，經過了春秋戰國之過渡和蛻變的大時代，一種更新的秩序，一種更進步和更緊嚴的政治組織，政治生活乃應運而生。於是，一個「化四海爲一家」，之緊嚴的「天下體系」或「天下機構」的政治組織和政治生活，或可說一個變封建（邦國）體制爲郡縣（地方）體制之郡縣式的秦天下即取得寬鬆的封建的周天下的地位而代之。因而，我們可以鄭重地說，中國歷史從西周經過了春秋戰國，過渡到秦代的時候，所完成的，不是一個由征服而統一的「世界大帝國」，而是把一個寬鬆的封建的「既成天下」鏈鍊成爲一個緊嚴的，郡縣的「渾然一體」的「國家」。

自然，這一個「國家」，既不是一族征服他族統而治之或「分而治之」的「帝國」，又不是全由一個單純的民族所組成的「民族國家」，而是一個以「天下」爲範圍，以「四海」作疆界，既無地域等差的隸屬，又無種族高下的區分，更無征服者與被征服者階級的對立之「渾然一體」的「國家」。這樣的一個「國家」，我們無以名之，只好於這個「國家」的「國」字之上，再加上她以「天下」二字的稱號，稱她爲一個「天下國家」或「天下國」，以區別她和其他古今來之征服歷史式的「帝國」與狹隘排他式的「民族國家」的國性和國格的不同。我們藉用「天下」二字以名國，好像是有點誇大了，其實則不然。「天下」一辭（自然是中國歷史上所指之傳統的天下），不但足爲中國人所習用，所喜用，而且中國人也確是最能理解這個名詞所涵之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特有意義。只有使用這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政治述狀詞以名中國，才能道地的道破「中國之國」

所獨具之政治精神，政治生活，政治組織和國家形態。若是不相信，我們自不妨細心地比較一番，看一看「中國之國」所具之國家內容和國家形式，是否是和近中東之古今「帝國」一樣？也是否是和歐洲之古代「帝國」與近世之「民族國家」或「殖民帝國」一樣？

這一個「渾然一體」之和平而偉大的「天下國」，或可說這一個「天下體系」或「世界體系」的政治組織和政治生活，在世人所忽視之近中東一帶，未曾實現，亦無從追求。古代之埃及帝國，巴比倫帝國，亞述帝國，波斯帝國，中世之阿拉伯帝國，和近世之奧托曼帝國，都是十足的征服殺戮式的「帝國」。她們一個個地在一片殺聲中興起，在一片殺聲中存在，也一個個地在一片殺聲中倒地毀滅。這自然是根本談不到什麼「王道」不「王道」，「天下」不「天下」，「世界」不「世界」，「大同」不「大同」。即在近為世人所驅歌的西洋，亦未曾實現，也無法追求。希臘哲人之斯多噶派，雖曾偶有世界傾向，然從不為時人所正視。當時的實際政治卻剛剛是走着相反的方向。雅典、斯巴達時代之城邦主義，也自然是談不到「王道」，談不到「天下」，談不到「世界」，談不到「大同」。馬其頓帝國和羅馬帝國時代之劫掠政策，從未走出征服和鎮壓的範圍之外，更是談不到什麼「王道」，什麼「天下」，什麼「世界」，什麼「大同」。降而到遠中世紀之天主教的機構出現，也空自費去了前後幾十位天才教皇的精力和願望，他們所追求之從宗教到政治之「世界體系」的政治組織和政治生活終屬夢幻。截止最近之最近，社會主義者的經濟的世界主義在西方抬頭之前，在西方的世界內，不但是「一個『世界性』或『天下性』政治組織和政治生活沒得出現，而且因政治的世界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的缺乏，西方世界的政治動向，不像「中國天下」和東方世界的政治動向之在「中國之國」的「世界主義」或「天下主義」或「王道精神」的指導下始終地趨向「合」趨向「平」而是始終地趨向「分」，趨向「不平」。

因為近中東的政治動向是一直地循着征服帝國與滅絕無常之舊道走，結果是從古初一直到最近，那裏一直地排演着一個帝國毀滅一個帝國的悲喜劇。同時，又因為西洋的政治動向是繼續地向着「分」處走，向着「不平」處走，結果於馬其頓式之掠奪帝國的殘骸上對峙着三個不同的王國，各走各的道路。稍後，再從羅馬式之

掠奪帝國的廢墟上起來了一羣褊狹的，鬪爭的英、法、西、葡、俄、瑞、比、荷、德、意等民族王國，更成了分崩離析之局。但反之，固爲「中國天下」和東方世界的政治動向是在「中國之國」的世界主義或「天下主義」或「王道精神」的指導是向着「合」處走，向着「平」處走，結果於「渾然一體」的秦天下的舊基上再建立起一個「渾然一體」的漢天下；於「渾然一體」的漢天下的舊基上再建立起一個「渾然一體」的晉天下，隋天下，唐天下，再依次於「渾然一體」的唐天下的舊基上建立起一個「渾然一體」的宋天下，明天下和清天下。

周秦以來，不但「中國天下」始終是保持着「渾然一體」的「天下國」，而且這個「渾然一體」的「天下國」始終是「中國作風，中國氣派」的中國文化的精派繼承者，也始終是「中國之國」之世界主義，或「天下主義」或「王道精神」的忠實的執行人。因而，她也就成了東方世界之文明和進步的推動機，和東方世界之和平與秩序的安定力，她不但對於她四隣兄弟之國自居於領導和扶助的地位，以「弭民伐罪，與滅繼絕」爲職志，樂與四隣兄弟之國和平共處，而且夏桀有「悲天憫人」和「有教無類」的婆心，頤和「普天之下」的衆庶共登「大同」之城。結果，古代的「中國之國」中古的「中國之國」，和近古的「中國之國」不但都是東方世界裏的一位嚴父，而且是東方世界裏的一位慈母；同時，她又作了東方世界裏的一位「辯人不倦」之賢明的教師先生。換句話說，這一個「渾然一體」之和平，莊嚴，偉大的「中國之國」或「中國天下」，或「中國天下國」，正像一顆巨大的政治文化之複星；她始終是放射着高度的光熱，吸引着她週遭的行星和衛星，各得其所；地在此東方世界體系的軌道內自由運行，過着和平安閒的日子，朝鮮、安南、暹羅和緬甸，一向都是這個偉大體系之內的一員，日本更是感受中國光熱最強的一顆。他如印度、阿富汗、波斯和土耳其等較遠的國家，也一向是和「中國之國」的光熱與東方世界之世界體系結締着不解的善緣。

直至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今日，在近中東，甚至在西方，一個和平寬大之「渾然一體」的「天下體系」或「世界體系」的政治組織和較治生活始終是未能建立起來。歷史上偶能征服近中東世界或歐洲世界的大帝國亦

早與滅無常，起伏更迭地失去其存位。而在「中國天下」或東方世界呢，一個「渾然一體」之和平寬大的「天下體系」或「世界體系」的政治組織和政治生活，不但是早已建立，而且兩千年來始終是伴隨着「中國之國」或「中國天下」或「中國天下國」之世界主義，或「天下主義」或「五道精神」之堅定的存在而堅定的存在着，充實着。

第二講 中國天下國與其他之帝國族國

第一節 從「中國天下國」說到國家的分類

於「中國之國之自我再認識」之第一講中，我們曾經鄭重地指出：中國，或「中國之國」，是一個「國家」，又是一個「天下」，——是一個「天下國」。因而，我們就決定稱呼這一個「中國之國」為「天下國」。這個稱號不是出自於我們之任意的『封禪』，或閉門的杜撰，而是得自於我們從歷史事實中所獲之『熟悉的判斷和長久的經驗』。換句話說，這乃是一件有血有肉之歷史事實，我們自有可能從客觀存在的史實中把它發現。我們前已鄭重說過「天下」二字，不但為中國人所習用，所喜用，而且中國人也確是最能理解這個名辭或述狀詞所涵之特有之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意義。只有使用這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政治述狀詞以名中國，才能道地的道破「中國之國」所獨具之政治精神，政治傳統，政治生活，政治組織和國家形態，但是待我們開始啓用這個名號的時候，或可說啓用這個名號的初期，無可避免的，也是我們可以預料得到的，一般的讀者，尤其是異國的讀者，將會覺得它不無有點太生冷，不順口。

這個名號之初期的應用，將使讀者覺得它不無有點太生冷，不順口，自不能說明這個名號的本身之不切當，不科學，或不合邏輯，只是說明着，在我們於今日開始提出之前，這個名號或名辭之尚未為世人所使用，或尚未為世人所發現。或可說，這只是說明着，這個名號或名辭之一向未曾為西洋人所使用，或一向未曾為西洋人所發現。我們知道，現在流行於國際間，或流行於中國學術界以及大學課堂之上，所有的政治學說與政治術語，可說是大都來自於西洋，以西洋為源泉。如果在西洋無此黃色，國際間即無從流行。不流行的學說和術語，自無怪說起來或聽起來都會覺得太生冷，不順口。

但這卻不是說，我們反對或非笑國際和中國之對於西洋政治學說和政治術語之應有的介紹和研究。也不是說西洋人故意地不願發現或故意地不願道說西洋之外之其他世界的政治學說和政治術語。只是說，直至今日，西洋學者們之對於西洋之外之其他世界的歷史和政治，尤其是中國的或東方的歷史和政治，仍是認識不足，知道的太少，而我們中國人或東方人又未能作必要之自我介紹。

惟其如此，在政治學的研究中和政治學之建設上，也就無首地遺棄著或對閉著一個廣大豐沃的領域或寶藏。不能從中國國家之政治組織，政治生活，政治精神，政治傳統和國家形態的研究中有所發現，藉以補充或彌補西洋政治學說和政治術語之窮。這種缺陷，在西洋之政治學學者或憲法學者們所努力建設的國家學說和國家分類學說中尤為顯著。

古今來，不知道有多少西洋的政治學學者和憲法學學者們，曾經一再地企圖著，或可說一往直地渴望著，能把古今來所有的國家作一個科學的或合理的分類，能夠分別地給予每一類的國家一個適當的或貼切的名字。但結果，所有此類的嘗試和努力雖不能說是已全告失敗，但至今還未見有人獲得滿意的成功。

西洋的學者們雖早已屢屢地表示不願再接受或同意亞里斯多德遠在二千年之前把人類國家分為君主國，貴族政治國和民主國等三大類的學說，也曾儘可能地將類分國家的花樣翻新，作過各式各樣的分類嘗試，但是兜來轉去，他們總是莫不破亞氏舊學說的殘舊藩籬。他們不是依據政府的形態，性質或精神之不同以區分國家，把國家類分為君主國，共和國，民主國，神權國，專制政治國，羣民政治國，武叻政治國，寡頭政治國，全權政治國，族長國和封建國等等，以致此種分類實在不是國家的分類，而是政府的分類。便是依據國家的某些特徵或國家的富力，財源，兵力，以及其在國際關係上的地位或勢力來區分國家，把國家區分為什摩海權國，陸權國，島國，陸地包領國，軍國主義國，帝國主義國，和什麼大國，小國，強國，弱國，半權國，非半權國，部分主權國，屬國，被保護國，永久中立國等等，以致此種的分類只涉及了國家之附屬的特徵或現象，而忽略了國家之基本構成，或國家之所由構成。

到了近代，經了德、法、英等國之多位的政治學者和憲法學學者們，如威茲（Witz），柏拉地福台萊（Pradier-Fodet），摩爾（Robert von Mohl），伯倫智利（Bluntschli），耶令尼克（Jellinek），和伯督士（Burgess）諸人的努力，關於國家分類學說的探究，固已是較之前人的分類大為進步。但他們所能做到的，也不過是把國家類分為神權國，王國，共和國，單一國，複合國，聯邦國和邦聯國等等；或類分為單純的國家，聯合的國家兩大類；或類分為族長國，神政國，世襲國，古典國，法治國，專制國等等；或於亞氏所分之三類外，再另加神政國；或類分君主國與共和國兩大類；或乾脆同意亞氏的三分法，而另予以新的解釋。各家所分的類目儘管不同，但他們藉以分類的標準，大都是以國家執政者人數的多寡為根據，或以國家之外貌作依傍，只是數學的或外表的標準，而非原則上的標準。此等分類，不但是科學的分類，且終未能避免為他們所指摘的前人們所犯的舊毛病，總不能使人滿意。

有鑒於這一點，所以就有人以為國家的性質是不適於分類的。將國家作科學分類的任何企試，皆將是勞而無功的事情。乍一聽這樣的說話，似亦不無有其部分的道理，但稍為加以研究，就覺得這種說法乃是一種不負責任的逃避或武斷。若說國家的性質不容易分類，倒是情理的話；要說國家的性質是不適於分類，自不會為我們所願輕信，西洋學者們之所以百試而未成功的原因，不在國家的性質之不適於分類，而在他們之尚未發現國家之基本的構成要素，或基本特性，和可能從此等構成要素或基本特性來區別或類分國家之科學原則。一旦發現了，則將會輕而易舉地給予古今來所有國家一個滿意的合理分類。

講到這裏，話剛剛講回來。西洋學者們之所以百試而未發現這種原則的原因，自不是因為西洋人之不聰明，太愚蠢，而在他們之太把他們研究的對象與範圍及其所憑依的材料局限於西洋的一隅之故。不能把他們研究的對象與範圍及其所憑依的材料從西洋的一隅擴而大之，擴大到世界各地，擴大到中國，自不能從世界各地之國家研究中，尤其是不能從「中國之國」之「天下性」或「世界性」之政治組織，政治生活，政治精神，政治傳統和國家形態之研究中，獲得強大而新鮮的啓示，促成一個偉大驚人的新發現。不然的話，他們或早已在

這個標題之下獲得了正確明快的答案。

自然，過去的是過去了。我們也不能只責備人家西洋學者們之少識中國或東方。向世界介紹「中國之國」或「中國天下國」，可以說正是我們中國人或東方人的責任。由於「中國之國」或「中國天下國」之向世界介紹，或可說由於「中國之國」或「中國天下國」之被介紹進於政治學，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之一，則不但大有助於西洋人之能迅速理解所謂「中國之謎」，而且將會一功兩得地促使我們之能對於國家構成之基本要素以及可能由此基本構成要素來區別或類分國家之科學原則有所豁然會心的發現；正所謂：

「衆裏尋她千百度，回頭纔見，」

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

這個豁然會心的發現，就是：古今中外所有之一切國家構成的基本要素，不是一個個的個人，而是一族族的民族（或部族）。所謂國家也有，不是某一個或某一個個的個人用以管理或統治另一些一個個的個人的工具；而是某一個民族用以統治另一個或另一些民族的工具，或某一個民族用以管理她自己本民族的工具；或某一個民族領袖着其他的一些民族用以共同治理一個民族大家庭或一個「公有天下」的工具。因而我們自不能以掌握國家主權者或統治者之一個個的個人的多數作為分類國家的基本原則，也不能以國家之附屬的特徵或外貌作為分類國家的基本原則，而實應以掌握國家主權者或統治者的民族之究屬統治着另一個或另一些民族，或單純的管運着自己本民族，或領袖着其他的一些民族共同治理着一個民族大家庭或一個「公有天下」之不同，作為分類國家的基本原則。

如以上述之基本原則作為國家分類的標準，則我們即可以很自然地，也可以說是很科學地，類分國家為「帝國」，「族國」（民族國家），和「天下國」三大類。

一個民族掌握着國家的主權，或可說通過國家機構，而統治着其他之另一個或另一些民族的國家，就是一般人所熱知的「帝國」。一個民族掌握着國家的主權，或可說通過國家機構而單純地管理着自己本民族的國家，

就是一般人所熟知的「族國」或「民族國家」。一個民族領袖着其他的一些民族，共同掌握着國家的主權，或可說通過國家機構而治理着一個民族大家庭，或一個「公有天下」的國家，就是向爲世人所忽略，到了今日才被我們發現的「天下國」。爲了幫助這一個新建立的新學說之易於理解，我們不妨再重複一遍，或者是再換個說法。我們可以換個說法說：由一國民族壟斷着國家的主權，或通過國家機構進而統治，鎮壓並剝削其他的一個或一些民族的國家，就是一般人所熟知的「帝國」。由一個單純的民族構成一個單純的國家，治者和被治者同屬於這一個同一的民族的國家，就是一般人所熟知的「族國」或「民族國家」。而由一個領袖民族以「天下」作對象，「四海」作範圍，領導着，化育着並凝結着其他一些民族而構成一個超「族國」反「帝國」之「渾然一體」的「天下政治」，「天下機構」或「天下體系」的國家，或「王道國家」，就是向爲世人所忽略而爲我們今日才發現的「天下國」。

中國國家或「中國之國」的構成，或可說「中國之國」的類型和範疇，或可說「中國之國」的政治組織政治生活和國家形態，無可懷疑地正是屬於上述三大類中之最後的一類。惟其如此，我們才有充分的理由不稱「中國之國」爲「帝國」或「族國」，而稱她爲「天下國」。這也正可以說，由於我們之把「中國之國」介紹進於政治學，才促成了國家分類的成功；而國家分類的成功，卻也大有助於「天下國」這個政治術語之能稱「帝國」，「族國」等政治術語有着同樣之事實的和理論的根據，而宣告確立。

「帝國」和「族國」等等的稱號，早已是爲世人所耳熟口熱的術語或名辭。我們說，或我們叫，某一個或某一些國家爲「帝國」或「族國」，在說者和聽者都覺得很平常，沒有什麼，自不會感到很陌生，很吃力，不易接受。但著突然地說，或突然地聽，某一個國家是「天下國」，自是易使得一般人在前無準備的情況下，感到他的生冷和不順。但是，我們知道，天下事，甚至我們的眼下手，爲我們所尚未發現，尙未知道，尙未聽到的，不知凡幾！或可說因爲太熱或太不熱之故，被世人所忽略的事物，不知可有許多！一旦道破，也極易使大家深深覺到這正是「先得我心」。一經發現，或一經道破，自不難和世人衛次熟悉而親切起來。從今天起，只

要我們能瞭解切當的使用，珍重的使用，隨着時日的邁進，「天下國」一辭將會同一「帝國」或「民族國」等權語或名詞一樣地暢流於世人的口間和耳際，以及政治學學者或憲法學學者們的名著中。

第二節 國家的起源與古帝國之首先出現

從國家之分類學說的研究上確定了「帝國」、「族國」和「天下國」三大類的國家類型的分類，並證明中國國家或「中國之國」是確屬於「天下國」一類類型的國家，已有大助於我們對於中國國家或「中國之國」之把握和理解。但爲求我們對於「中國之國」之能達到更深切的理解和認識，以及證明我們以民族作爲國家構成之基本要素的理論或學說的正確，似須再進而將此三類國家之所由產生的實況和歷程，以及彼此的分佈區域，加以綜合的和比較的研究。

這一來，我們自須先從國家的起源問題討論起。看一看國家的起源是否是和民族問題結着深切不解的姻緣？

關於國家起源的學說，在政治學的研究中，雖不像國家分類學說之如彼地品類繁多，但亦極盡了紛紜的能事。隨着歷史時代的邁進，前此之各支配一代人信心的國家起源說，像所謂契約說，有機說，法律說，以及形而上學的國家起源說，都已依次地成爲過去了。現代流行的學說，也可以說是一個很進步的學說，就是馬（馬克斯）恩（恩格斯）兩人所主張之階級的或階級對立的國家起源說。

他們認爲，國家一物不是從原始時代就存在的，它是社會演化到某一階段，因生產力之發展，內部分裂爲對立衝突的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時，而產生的前者壓迫後者的有組織的權力。這就是說：「國家的產生就是表示，這個社會自身已經分裂，已陷於無可調和的矛盾中，而社會自身又沒有消除這矛盾的力。爲要使這些矛盾，這些經濟利害衝突的階級，不致因這些無益的鬭爭而毀滅自己和社會，於是不得不有一個在外觀上立於社會之上，並且有鎮壓衝突和維持「秩序」之功用的權力。這個從社會中生長出來，但是立於社會之上，而且

漸漸和社會分離的權力，便是「國家」。這也就是說：國家所以發生的最初原因，是在抑壓階級的衝突。但從這種衝突中產生的國家，在事實上「總是成爲被經濟上最佔勢力的階級所支配的國家。因爲這個階級倚靠了經濟上的優越地位，便成了政治上的治者階級，並且因此又獲得了抑壓和擄取被壓迫階級的新手段。所以古代國家是以壓制奴隸爲目的的「奴隸所有者」之國家。封建國家是貴族壓迫田奴和農夫的機關。近世的代議制國家是資本來擄取工資勞動者的工具。」

單就國家之所以發生的最初原因是由於階級對立和衝突的出現和一階級之企圖鎮壓另一階級這一觀點或這一原則來說，我們很同意馬恩二氏的見解，認爲這確是一種高過前人的見解。但於同意此原則或觀點之同時，我們卻深深覺得在此處馬恩所用之「階級」一辭的上邊應立即加上「種族」二字作形容，作修正，把「修正爲「種族階級」者是。否則，馬恩之階級的國家起源說不但是只對了一半，而且是將要大成問題的。這種「種族階級」的提出，或可說是馬恩學說的修正，也或另是一個新的學說了。

我們知道，在古代，爲國家所由產生之階級對立和階級衝突的這一種「階級」之最初的形態和性質，不是單純的經濟地位之不平或差異所劃分的「社會階級」，而是以血統的，宗教的，經濟的，政治的，甚至文化的「階級」或差異所劃分之「種族階級」。否則，這種階級（如果是單純的社會階級的語）對立的國家起源說，就只能應用於西洋近代政治產物之「民族國家」，而不能應用於古代的或古今中外的「帝國」了。單純之經濟的社會階級的對立和衝突的出現和存在，乃是爲一個由單純民族所組成之單純的「民族國家」所特有之社會現象或國家現象，具有這種爲「民族國家」所特有之社會現象或國家現象的國家，自是典型的「民族國家」。然「民族國家」的出現，乃是西洋之近代政治產物，並未曾存在於古代。（在古代之雅典城裏和羅馬城中，固也曾發生過貧富之爭，但這種貧富之爭，卻發生在雅典和羅馬都已成爲「帝國」，雅典和羅馬變成了「帝國」的繁榮之後，而非是「雅典民族國家」和「羅馬民族國家」之所由生。）在古代，首先出現於人類社會之高級的政治組織和政治生活不是那爲個別的單純民族所組成之個別之單純的「民族國家」，而是爲某一民族征服了其

他的一個或一些民族因以建立的「帝國」。

「帝國」國家之所由產生，不是某一個「社會演化到某一階段，因生產力之發展內部分裂為對立衝突的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時，而產生的前者壓迫後者的有組織的權力」，而是在某一些地區之內，某一民族之漸次強大，進而征服其他的一些民族的結果。由於此等征服，出現了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種族的對立衝突時，而產生的前者壓迫後者的有組織的權力。因而我們可以說，「帝國」國家在發生的時候和成立的初期，完全是戰勝種族加在戰敗種族身上的一種有組織的政治束縛。它唯一的目的在抑制戰敗者的反抗，而確立戰勝種族對戰敗種族的統治。通過這種統治，達到戰勝種族對於戰敗種族經濟剝削的目的。即如所謂「奴隸所有者國家」和封建國家之內，奴隸主和奴隸之間的對立與封建領主和農奴之間的對立的背後，除了經濟意義的剝削外，亦實瀰漫着種族意義的鎮壓和迫害。奴隸和農奴，尤其是奴隸，固不無部分的或極少數的來自於統治者自己種族之內，但其主要的源泉乃係戰敗的種族。只有在西洋近代政治產物之「民族國家」或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家內，才演着以單純之經濟的不平和差異所劃分之兩大社會階級的對立和衝突。資本家固然是毫不遲疑地以國家作為壓榨工資勞動者的工具，對工資勞動者廣施壓榨，然而較之他們對於殖民地的敵視，其輕重的不同，卻每可構成一個有趣的對照。很有趣的，亦很可痛的，這一些強大的「民族國家」或資本主義國家大多是以一個「民族國」而又兼領一個「殖民帝國」；這些國家的資本家們，對於本國的勞動階級的剝削固已是很夠苛虐，但較之他們對於殖民地人民的壓榨，則又微乎其微了。

這不是我們故意地和馬恩兩氏的學說為難，只因爲「後來居上」，我們所處的現時代已晚於兩氏者近百年，較之他們，或可說踏過他們所鋪的階石，自更便於真理的接近或發現。數年前，當著者初孕懷上述觀點或概念的時候，不無以爲這或許是一個「前無古人」的發現或創見；然亦不無爲此「前無古人」而微有孤寂單調之感。待近讀甘柏志維計 (Ludwig Gumplowicz) 和奧本海馬 (Franz Oppenheimer) 等人的著作，卻吃驚地覺到他們對於國家起源問題所持的見解，曾有若干要點和拙論極爲接近。這一點「空谷足音」之應感，不但培

加了不少著者的興趣和勇氣，而且亦可藉以說明爲著者所提出之「種族階級的國家起源說」或不是著者個人之閉門造車；而是有心人可能共見的一面真理的發現。只要我們肯細讀「讀世界史」，我們自會隨地拾獲強而有力的史證，足以證明：在古代促使國家產生的原因，固由於對立衝突的階級的出現，但這種「階級」，不是單純的經濟的「社會階級」，而是構成複雜之「種族階級」。因而，首先出現於人類社會之高級的政治組織和政治生活，不是單純的「族國」或「民族國家」，而是龐大的「帝國」。

要證明首先出現於人類社會之高級的政治組織和政治生活，確爲龐大「帝國」，不是單純的「族國」或「民族國家」，我們就不妨再進而遠從國家和政府的區分上講起。

近人固已能區別政府不是國家，政府和國家不是一個東西，但是不少的人們卻總不無以爲國家和政府在人類的政治活動史上，是同時創立而且同時存在的東西；甚至不無以爲國家是先政府而存在。這一點卻正和客觀的史實相反。在古代，人類政府的出現，早於國家之存在。我們知道，一個政府的成立，不像一個國家的成立之難。一個國家的成立必須具備人民，土地和主權三個基本條件，缺一不可，缺一即不能成其爲國家。而政府卻只須具備了一個國家所必須具備的若干條件的一部或大部，就可成立。在古代，只要具有了民族（或部族）和領袖就可成立政府。自然，他們在這裏所說的政府，乃是一個雛形的和初級的政府，它所能執行的，不過是一個民族（或部族）的意志，不應和具有國家之後之能執行國家意志的政府等量齊觀。最顯著的例子是古代的，甚至中古的游牧民族（或部族）之遷徙無定，浪游世界，不能說她們是國家，有國家，但卻不能說她們無政府。因爲每一個游牧民族（或部族）都要有一個發號施令的首腦部的所在；這些首腦部又每每是強而有力。在這些強而有力的首腦部（政府）的控制和指導之下，這些民族（或部族）每每能完成一些驚人的活動。固然，他們的活動多是一些宗教的活動和戰爭的活動；然而宗教和戰爭何嘗不就是古代的政治；宗教的活動和戰爭的活動又何嘗不就是古代的政治活動。如果我們認爲這樣之大規模的活動已是接近了國家，或可說這樣的活動的結果正是國家之所由產生的話，則我們就不能不說，種族神或部族神的神光能夠威照之處，或者是種族

或部族的馬蹄和戰車可能踐踏之地，就是她們的國境了。據有這樣國境的國家，不待言，自不是一個單純的「民族國家」，而是一個龐大的「帝國」了。

當各有力的種族（民族或部族），在大規模之宗教的和戰爭的活動中邁向「帝國」建造的時候，不但被征服者之單純的「民族國家」無從形成或不容形成，而且也妨礙了征服者之單純的「民族國家」的生長。世界史告訴我們，除了近代之新興的帝國主義者之能由以一個「民族國家」作根基走向海外掠奪而兼領一個「殖民帝國」之新式「帝國」外，古代的和中古的諸「帝國」的統治者的本身，卻不是一個既成的「民族國家」，而只是一個或一支強而有力之兇野的種族（民族或部族）。這個種族（民族或部族）的發祥地，或可說她們儘以製造「帝國」的據點，每只是一個原始的城鎮，不是一個「民族國家」。而這些原始的城鎮，也每每是終「帝國」之世，不過演變成爲一座在這些「大帝國」之內之最佔地利的武裝堡壘，用以控制並鎮壓這個「帝國」而已。如兩河流域之古蘇末、阿卡德、愛甲德、巴比倫、尼尼微和蘇薩等城，尼羅河流域之第庇斯、麥非斯等城，以及希臘之雅典，和羅馬之羅馬城，自是顯著的更例。

這類的史實在古老的近東和中東最爲顯明。首先出現於兩河流域和尼羅河畔之高級的政治組織和政治生活，不是蘇末人、塞米人、巴比倫人、亞述人、波斯人、和上埃及人、下埃及人、米尼斯人之單純的「民族國家」，而是蘇末人、塞米人、巴比倫人、亞述人、波斯人、和上埃及人、下埃及人、米尼斯人之龐大「帝國」。在歐洲，也是一樣，最先出現於克萊特島上之高級的政治組織和政治生活，不是麥瑙安「民族國家」，而是麥瑙安「帝國」。希臘半島上之初期的城邦政治，固不能嚴格的叫她們爲「帝國」，然而也實在不是什麼「民族國家」之羣。但如由當時各城邦奴隸制度的盛行，以及她們的對外關係和對外戰爭之一面來看，卻不容不叫她爲一個「準帝國」。他如結束希臘城邦政治之馬其頓，和繼馬其頓而起的羅馬，更是一開始就以「帝國」的姿態出場。在中國，古代政治的發展，固有異於歐洲，亦不同於近東和中東，但是傳疑中的黃帝、堯、舜、禹、時代，似亦不外是一個「古帝國」的創造。卽就有史之夏殷兩代的政治活動中考察，也不無仍保有「帝國」的遺

第三節 「帝國」「族國」與「天下國」之分道揚鑣

隨着前一章節的結束，關於「國家的起源與大帝國之首先出現」一題的闡述和深討自可告一段落。我們的論述已不必再一直地向前奔馳，倒須要拉轉馬轡，將論旨回向我們的本題走。我們須要及時地鄭重指出，我們所以不厭其詳地例舉最先出現於人類社會之高級的政治組織和政治生活不是單純的「民族國家」，而是龐大的「帝國」的史實者，無非是意在藉以明證國家之產生，確是由於對立衝突之「種族階級」的出現和存在。並藉以明證我們在本講的開首，曾以「種族」為國家構成之基本要素，以及以「種族問題」之有無與如何為類分國家的基本標準或科學原則之實屬有根。然這卻不是說，這個最早出現於人類社會之「征服帝國」的政治組織和政治生活，乃是支配人類歷史之唯一的或永久的政治組織或政治生活。若是如此的話，則將立即和我們在前邊建立之類分國家為「帝國」，「族國」和「天下國」三大類型的理論構成嚴重的矛盾。

剛剛相反的，首先出現於人類社會之高級的政治組織和政治生活，儘管是「征服帝國」的形態，但是隨着地域環境或經濟條件的不同，民族的有異，以及歷史時間之推進，促成國家誕生之民族與民族之間的對立和衝突亦因之而有不同的轉變或質變。除了某一地域仍是以「征服帝國」之興滅無常作為它的主要歷史動態外，其他的地區卻已各自不同地起了質變或他轉。最顯著的變異，是另在兩大不同地域或世界之內，出現了兩大不同之政治的和歷史的動向或動態。這種不同的動向或動態：一個是從「征服帝國」向「民族國家」處解放；另一個乃是把一個「征服帝國」蛻變為一個超「族國」反「帝國」的「天下」或「天下國」。

原始「征服帝國」之質的「不變」和「變異」，以及其「變異的不同」，剛剛把世界劃分為三大不同的政治區域。這三大不同的政治區域：一個是中東和近東；一個是歐洲；另一個就是我們中國。就在這三大不同的政治區域之內，漸次地並分別地出現了並支配着「帝國」，「族國」和「天下國」等三種或三類不同的政治組

織政治生活和國家形態。

就近東和中東這個區域或世界的歷史來考察，他們知道，這個世界乃是一個以「征服大帝國」代替「征服大帝國」之帝國與滅無常的舊世界，也是古今來最暢行「帝國體制」的一個政治區域。上次大戰的結果，那一個橫跨亞、非、歐、三洲之奧托曼土耳其世界大帝國，或可說那一個近中東古老世界之近代統治者，雖是瓦解了，帝國之舊主人，土耳其，脫掉了「征服帝國」之百納的舊衣或破敝的殭殼，而另着嶄新的「民族國家」之時裝出現。以致在近中東之廣大的沙漠和草原上也開始滋生着民族新國之胚胎和芽苗，靜待政治解放的時雨的到來而發榮，而成長。但這一方古老荒曠的地帶，卻一向是為「征服帝國」的「體制」所支配。直至上次大戰結束之時，六七千年來，近中東一帶的政治史，始終是一個「大帝國」代替一個「大帝國」之新舊帝國興亡更替的歷史。粗略計之，繼蘇末帝國，塞米帝國，巴比倫帝國，克塞帝國，上埃及帝國，下埃及帝國，米尼斯帝國，黑哥羅斯帝國之後者，為埃及帝國，赫提帝國，亞述帝國，波斯帝國，馬其頓帝國，羅馬帝國，阿拉伯帝國，東羅馬帝國，蒙古帝國，和奧托曼土耳其帝國。上次大戰之後，新型的「民族國家」雖已在此間開始抬頭，然而在她們的頭顱，亦仍籠罩着英法大帝國的黑影。

在歐洲，表面看，「大帝國」之繼承「大帝國」，似亦是相續無間。馬其頓帝國之後，繼之以羅馬帝國；羅馬帝國之後，繼之以神聖羅馬帝國；神聖羅馬帝國之後，繼之以拿破崙帝國；拿破崙帝國之後，繼之以奧匈帝國；而奧匈帝國之後，又繼之以今日之所謂「希特勒帝國」。但如果我們深入歐洲歷史的內幕，卻發現完全不是那一回事。

支配歐洲世界，或可說支配西洋社會的政治組織和政治生活，曾伴隨着歷史時代的前進，屢屢地企圖着離棄（實已漸次地離棄）由征服，鎮壓和統治而形成之「大帝國體制」，轉而向各個民族彼此獨立自由之「民族國家體制」或「國際體制」處邁進。我們知道，繼馬其頓帝國之後者，不即是羅馬帝國，而是彼此分立的三個王國。繼羅馬帝國之後者，不是一個既不神聖，又不羅馬，更不帝國的「帝國」之繼承，而是英、法、西、

蘭、俄、瑞、比、荷等新「民族國家」之次第成立。繼神聖羅馬帝國之後的拿破崙帝國，雖可說這像是一個「帝國」，然而曇花一現，她不但是未曾減少了歐洲的「民族國家」，反而又送出了德意志等幾個強大的「帝國」。上次大戰，不惟是未能鞏固並擴大拿破崙帝國之後的奧匈帝國的統治，反而使得她全部瓦解。由奧匈帝國的瓦解，又爲歐洲產生了不少的「民族新國」，如捷克、如波蘭、如羅馬尼亞、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等國的出現。今日，在納粹統治下的德意志，雖能以閃擊的戰略和壓倒式的暴力，於前二年之中之極短速的時間內征服了百分之六七的歐洲，並曾一度嚴重地威脅着英國和蘇聯的安全和生存，好像是一個空前之「希特勒式的世界大帝國」即將實現了，且將給予歐洲，甚至世界一個「希特勒式的千年和平」；然而不然，稍知國際政治和時代動向的人們類能知悉，這只是一時的歷史逆流，它不久即將隨暮潮的退落而死去。希特勒之「武功」和「光榮」，正在說明着在歐洲世界早已沒落的「帝國體制」之即將正式銷亡之前之回光返照。這次歐戰的結束，不但是「征服帝國」的「體制」勢必要在歐洲正式滅跡，恐亦將有助於近中東世界以及南亞等地之民族解放。

從羅馬帝國的崩潰之日起，歐洲的政治史是一直地告訴着我們說，歐洲世界是如何地繼續作着從「征服帝國」向「民族國家」處解放的奮鬥。新型的「民族國家」是一天比一天的多，「國際體制」也就代替了「帝國體制」。這一種新型的「民族國家」的內容和外形之不同於「征服帝國」的內容和外形，正是一個剛剛相反的對照。這可以說是，這乃歐洲人在反「帝國體制」的活動史上跨了一大步；但也可以說，這亦是歐洲人在反「帝國體制」活動中所走的另一極端。

當近中東世界一直地演做着一幕幕「征服大帝國」毀滅着「征服大帝國」之與滅絕的悲哀劇，而歐洲世界又在繼續地作着離棄「帝國體制」，力向「民族國家」處邁進的關爭的時候，中國的歷史卻告訴了我們另一個不同的故事。

在中國，政治的發展，既未曾走上近中東世界之路，一直地以新舊「征服帝國」之興亡起伏相更替。然也

未曾邁向歐洲世界之途，繼續地從「征服帝國」之政治生活中向獨立自由之「民族國家」處解放或分解，以「國際」代替了「帝國」。她卻另外取道於超「族國」反「帝國」之「王道坦途」，將一個「太古帝國」漸次地質變或淳化為一個「渾然一體」的「天下」或「天下國」。藉助於我們在本書第一講和本講的前兩段所已作的研究，我們知悉，黃帝、堯、舜、禹等傳疑時代之中國國家的誕生，雖是一個「帝國」的建造，但是經由夏殷兩代的蛻變，到了周代，前此之那個「為一個強力民族（或部族）以干戈作利器統治其他民族（或部族）之征服鐵線式的「大帝國」已過渡為一個「由一個領袖民族（或部族）以封建制度作連絡和其他眾多民族（或部族）裂土而共治的天下」。待到中國史通過了春秋戰國的大時代，到了秦代，中國人在「中國天下」或「中國世界」之內所完成的，不是一個由征服而統治的「世界大帝國」，而是把一個寬鬆的「封建天下」鍊成爲一個緊嚴的「國家」。這一個「國家」，我們前已鄭重介紹，既不是「一個一族征服他族統治而治之的「帝國」，也不是爲一個單純的民族所構成的「民族國家」，而是以「天下」作對象，「四海」爲範圍，既無地域等差的隸屬，又無種族高下的區分，更兼征服者與被征服者階級的對立之「渾然一體」的「國家」。爲區別這個「國家」和其他之「帝國」和「族國」的國性和國格的不同，我們曾稱她爲「天下國」；也只有稱她爲「天下國」，才能道地的道破「中國之國」所獨具之政治精神，政治生活，政治組織，政治傳統和國家形態。

所謂「天下國」，不是一個「帝國」之更擴大，也不是「一些「民族國家」之總結合，而是一個「原始帝國」和「封建天下」之質變和再質變。在中國，幾可說在這個「天下國」的國境之內，只有代表人民利益和違背人民利益的朝代（是政府，並非國家）的起伏，而和代表着不同生活，不同文化或不同血統的種或族的興滅。雖也曾偶有野蠻民族的侵入，但結果，大都是拋棄了他們固有的生活和種族的偏見，而消失於這個「天下國」的寬容中。而同時，在這一個「天下國」的國境之內，也只許大一統之「天下政治」和「天下政權」之運行和行使，而不容「地方政權」和「地方政治」之過分發揮，更無所謂離心的「族國傾向」。所以結果，在中國，或可說在這一個「天下國」的國境之內，於大一統的秦王朝之後，繼起了一個大一統的漢王朝；於大一統

的漢王朝之後，依次地繼起着大一統的晉王朝，隋王朝，唐王朝；再依次於大一統的唐王朝之後，繼起着大一統的宋王朝，元王朝，明王朝和清王朝。

最後，當本譯即告結束之際，我們或不妨再附帶地說幾句話，略論一論今日的印度和蘇聯。

我們知道，當「帝國」，「族國」和「天下國」早已分道揚鑣地在近中東世界，歐洲世界和中國世界的分途發展的時候，或可說當歐洲世界會繼續地從「征服帝國」向「民族國家」處解放，已變為「民族國家」的「國際」，而近中東世界也已不無有點開始從「征服帝國」向「民族國家」處解放的時候，印度，古老的印度，或可說一個半「近東中東性」又半「東方性」的印度，卻仍然是停留於由「太古帝國」向「天下國」的「國家」處作初步蛻變的階級。印度，和平的印度，雖久已不愜於「帝國」生活，亦無意於「族國」傾向，很嚮往「中國之國」之所取由的政治路線，亦和「中國之國」有着很深的友情，然終以太和平了，至今尙未能擺脫外方的牽掣，亦至今尙未能離棄「征服帝國」的舊生活，而登臨於「天下國」之「國家」境界。

可以同印度作對照的，卻是今日的蘇聯。當今日的印度仍然是停留於由「太古帝國」向「天下國」的「國家」處作初步蛻變的階段的時候，另一個半「西方性」又半「東方性」之特殊的龐大帝國——帝俄——卻已突兀的，猛烈的，在蘇維埃的新制度下，或可說在民族自決和人類聯合的新口號下，向類似「天下國」之「國家」處突變。這不但說明了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的前途，並實證着「中國天下國」的前途，而且說明了人類世界的前途。世界的明日，或人類的歸宿，恐即是一個更大規模，更寬容的「天下國」的創建和保持。

第三講 中國之國之所以爲中國之國

第一節 東方情調與西方情調

從本書的第一講到第二講，我們會就中國是一個「國家」，又是一個「天下」，「中國之國」是一個「天下國」之自我認識處探討到國家的分類和國家的起源；復就國家的分類和國家的起源的探討中，說明了中國「天下國」和其他之「帝國」，「族國」的不同，以及「帝國」，「族國」和「天下國」乃是古今來世界人類所營過之國家生活的三大類型。在這種綜合的和比較的研究中，我們對於中國國家的內容和外形，最好說我們對於「中國之國」的內容和外形，或已不無獲得相當的認識與把握，再提到中國國家或「中國之國」的時候，或即會在聽者或讀者的腦際呈現出一幅明確的輪廓，一個明確的概念，——一幅「天下國」的輪廓，一個「天下國」的概念，不致再和西洋近代產物之民族國家與近中東世界歐洲世界之古今帝國相混淆。若是我們能夠緊繼前兩講之後，再進而把「中國天下」同「西洋世界」或中國歷史同西洋歷史放在一起，來一個高空的瞰眺和全面的研讀的話，則我們不但會爲「中國之國」所獨特具有的「天下性」或「世界性」獲得豐富而有力的旁證，而且將會更擴大向廣泛地發現中西兩大人羣所營的生活方式，社會形態，文化情調，亦在在地表現着顯然不同的風格和內容。再從這顯然不同之風格和內容的深處，反而求之，或會使得我們能夠更深澈地理解中國國家或「中國之國」。

講到這裏，我們自不能不馬上就來一個很抱遺憾的聲明。我們將只把中西的歷史放在一起，而不把近東東的歷史也放在一起，來一個比較者，自不是我們故意地認爲西亞無人，土耳其無人，埃及無人，阿拉伯無人，波斯無人。也不是我們故意地忽視近中東古老文明的家鄉，那一個亞、歐、非、三陸相會之地。（關於這

一地區於促進或開創人類世界的文明上，所有之宗教的，藝術的，甚至科學的成就與貢獻，自不能隨便掩抹，將永爲人類所崇敬，所紀念。得功夫，當另爲專論以論之。）因爲不幸的很，這一地區，或這一世界，正如我們在前章中所一再申述，乃是一個「帝國體制」流行的區域，建立在這一地區之上的古今不同的龐大帝國的興亡來去太大了，也太頻繁了，以致一部近東中東史，只是一串大小勝利，大小毀滅，大小征服和大小被征服的故事。她們所經由的毀滅和破壞，多於她們所成就的建設和發展，以致她們未能形成一個獨立而永續的歷史體系。她們雖曾有過她們自己之獨特的生活方式，社會形態和文化情調，然而幾經破壞，幾經毀滅和幾經更改，不是已變質爲不東不西的東西，便是只剩下殘餘的灰燼和遺蹟，供人憑吊而已。在近中東的人羣尙未能把她們之政治生活，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來一個徹底的整理或重建之前，環顧世界，如欲將一切不同體系的不同人羣之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諸生活作一有系統之史的對比的話，也只有先從中國和西洋（也就是歐洲）這兩戶人家開始了。

我們現在拿中國和西洋作對比，無疑是含有以中國代表東方，以歐洲代表西方的涵義。這當然不是僅僅地爲了中國所具有的人口和地域同歐洲相埒之故，而正是因爲中國和歐洲乃是兩個各自具有她們各自的獨特的文化情調和完整的歷史體系的世界。西洋人把她們自己的歐洲稱爲一個世界，另把她們向東來的路上所經由之不同地區分作爲「近東」，「中東」和「遠東」，自是一個很牽強的稱呼。正確的講，如果歐洲是一個世界，東亞大陸及其島嶼更是一個世界。以中國代表東方或東方世界，也是西洋學者們所公認的事情。

東西兩大世界，或可說住在東西兩大世界之內的兩大人羣，或可說住在「中國世界」或「中國天下」和西洋世界或歐洲世界之內的兩大人羣，所營之生活方式，社會形態和文化情調之顯然不同的風格和內容，是隨便舉出眼前的實例就可將他們加以說明的。

例如先就文學和藝術來講吧。中國詩歌之初期的成就，即是抒寫性靈和抒洩情感的抒情詩歌的匯流；以後更是如此，且於有意無意間流露着非戰的思想。西洋詩歌的初作，大部是崇拜英雄和詠歌戰爭的敘事的史

詩；且代代有此類的作品，有意無意地頌歌戰爭。同時，中國的藝術，似是起源於山水風情的鑑賞和對於大自然的愛慕。而西洋的藝術，卻似起源於英雄美人的肉體的崇拜和戰爭的描寫。

他若在日常生活方面，亦各表現其不同的旨趣。當西洋人正在啖生肉，飲乳酪，狂舞高歌的時候，中國人卻相反地偏愛食蔬食，品淡茶，緩步清歌以自享。同時，當西洋人著短裝，登革履，斷髮短鬚，表現精神的時侯，中國人卻又相反地偏愛披長袍，踏絲履，長髮修髯，以示風雅和安閒。西洋人講鍛鍊，泅冰，滑冰度冬夏；中國人講養生，種菜澆花，翫春秋。西洋人的日常生活以動爲常態，以靜爲例外；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以靜爲常態，以動爲例外。就生活的大範疇講，中國人愛大陸，以大陸爲生息的天地；西洋人愛海洋，以海洋爲活動的世界。就生活的小範疇講，中國人愛田園，以田園爲身心休憩的處所；西洋人喜都市，以都市爲智勇競爭的場所。

講到哲學，政治和宗教，中國人和西洋人更是各自走着各自的方向。中國的哲學，可以說是「唯情」的哲學；哲學的最高境界，是「物我相忘，人我相安」。西洋的哲學，可以說是「唯理」的哲學；哲學的最後成就，是「物我對立，真偽發現」。中國的政治可以說是「靜態」的政治；政治的終極理想，是「無爲而治」，「與民休息」。西洋的政治，可以說是「動態」的政治；政治的最高目標，是「國家萬能」，逼人效命。同時，中國人可以說是輕宗教的人民；中國人的宗教觀念極薄弱，宗教生活也極自由。流行於中土的宗教，是解脫的宗教，中國人接受了東方教主的告誡，了悟到「生之苦」，有意從生活中求得解脫。西洋人可以說是重宗教的人民；西洋人的宗教觀念極濃厚，宗教生活也極嚴格。盛大於西洋的宗教，是生活的宗教，西洋人接受了西方教主的啓示，憧憬着「生之樂」，努力從生活中獲得生命。

最後，說到中國人所營之倫理的，社會的和政治的組織，是以家族爲中心和起點，跨過了國家，而達於天下。這也正可以同西洋人所營之倫理的社會的和政治的組織，是以個人爲中心和起點，走到了國家，而且終止於國家作對照。

諸如上述的實例，真是俯拾皆是，取用不盡。因之，就有人揭出了歸納的結論。有人說：西方的文化，是「力」的文化，是「征服自然」的文化；中國的或東方的文化，是「情」的文化，是「和自然融洽」或「放任自然」的文化。也有人說：西方的文化，是「動的」的文化；中國的或東方的文化，是「靜」的文化。因之，也就有人更肯定的說道：

『東方是東方，西方是西方』。

把文化類分爲東西，再把東西文化類分爲「情的」和「力的」或「靜的」和「動的」的分類，容或實在今日仍很能動一般的聽，討得他們之欣然接受。然而這樣的分類，卻只是一種不認識或忽視文化一物之世界性和一般性的分類，一種似是而非的說法，隨着吾人學術思想的發展，也不能再爲我們所同意。至於英國之反動的桂冠詩人吉普靈 (Kipling) 攜着「先知者」的架子，叫出：『Oh! east is east and west is west, never the twain shall meet.』的時候，不但是含有輕蔑東方的意識，而且他總以爲東方將永遠是東方的卑下，西方亦將永遠是西方的豪華，二者將永遠不會相遇於一地，而有所平等或混同。這等於把世界文化武斷地分爲東西兩極，並認爲東方的一極劣於西方的一極。這自是一種極頑固，極自大，而且極不通的說法，無怪連他自己的同國人就聽不過，英國的前進學者如威爾斯等人，即會起而加以喝斥與譴責。我們知道，所謂文化這種東西，是一種最富有世界性或人類一般性的東西，不會爲不同的地域所全面局限，也不會爲個別的人羣所截然割分。我們不能把它類分爲「東方的」和「西方的」，更不能把它類分爲「情的」和「力的」，或「靜的」和「動的」的分類。

自然，我們所說之不能把文化類分爲「東方的」和「西方的」，更不能把文化類分爲「情的」和「力的」，或「動的」和「靜的」的分類的話，自是專就類分文化爲東西或某某等類的『類』字上來講話。若是拋開了『類』的觀點，則前人所作之上述的說法或分法，自亦非無一是處，全無價值，一文不值的瞎說。如能改說『類』的不同爲『風格』或『情調』的不同，則前人所作之上述區分，倒卻很有它的用處和價值。

我們固不應不知或忽略人類文化之世界性或一般性而談分類，然亦不應不知或忽略生活於不同地區或不同的經濟條件之下的不同人羣之於世界文化或人類文化之一般性中所賦有之個別的特殊性。透過了生活於不同地區或不同的經濟生活之中之不同人羣的特殊性，所謂民族文化是自然而地要表現着她們個別之不同的風格或情調。以「東方的」和「西方的」，或「情的」和「力的」，或「靜的」和「動的」等字眼來類分人類的或世界的文化，固然是不適之論，但若借此等字眼來說明世界文化或人類文化之因通過了生活於不同地區或不同的經濟生活之中之不同人羣的特殊性而表現之不同的風格或情調，並借重此等不同的風格或情調進而說明東方世界和西方世界之不同，或東方是東方與西方是西方，倒卻是一種很有見地的說法了。

不待言，我們在此間所說的「東方是東方與西方是西方」，自和吉普靈所說的不同。我們所說的，只是在人類文化之世界性和一般性的籠罩下所見之東方和西方或中國和西洋之個別的特殊性；也只是「東方情調」和「西方情調」的不同，或「中國情調」和「西洋情調」的不同。

第二節 中國何以是中國與西洋何以是西洋

講過了「東方情調」和「西方情調」或「中國情調」和「西洋情調」的不同，也可以說是講過了「東方是東方與西方是西方」或「中國是中國與西洋是西洋」以後，問題似乎仍然是仍然不算完。不但不算完，它偏要逼迫着我們不能不進而探求「東方何以是東方與西方何以是西方」或「中國何以是中國與西洋何以是西洋」的所在了。

要說明這一樁「東方何以是東方與西方何以是西方」或「中國何以是中國與西洋何以是西洋」之重要而複雜的歷史公案，自然不是一件不經嚴密的思考或不加審慎的研究，即可提供出答案的易事。一般的東西學者，多喜歡談說東方和西方或中國和西洋是如何的不同；從東面或中西文化的不同，說到東面或中西哲學的不同。或者是從東面或中西哲學的不同，說到東面或中西政治的不同。縱然他們所說的全對了，他們所說的，也不過

如我們在前節所已講過的一樣，只是說到了一個如何不同的「如何」，而未曾說到一個爲什麼不同的「爲什麼」。爲追求這一個爲什麼不同的「爲什麼」的所在，也可以說是爲了追求這個重大的歷史課題之能獲得一個完澈的解答或解決，我們自不能再作進一步兩步或三步的思考和研究。

待我們從事於進一步兩步或三步的思考和研究之後，我們卻深深地覺得，這樁重大的歷史公案的核心的解釋之所在，是：因自然環境或經濟條件的不同和歷史遭遇之有異，以致分別出現於東西或中西兩大世界的中西兩大社會之所由締造的動力之所屬型，以可說那創造，支配和推動中西歷史前進者之所屬型，也就隨之而不同。除了他們在人類社會之一般的史之發展上還能守着共同之大的步趨外，他們在文化上，哲學上和政治上所作之個別的活動，表現，與成就，亦即隨之而各異了。

我們因不同意單純的地理史觀論，然卻不能不承認地理環境對於人類社會的發展有着絕大的影響。蘇聯的社會學學者柯金先生(M. Kohn)說得好：「人類共同和自然界鬭爭的過程就是社會生活之基本內容；地理環境對於人類社會的發展，有絕大的影響。固然不是直接發生影響而是通過在它的影響之下發生的經濟關係。」佔在學術研究的立場上來說話，我們固不應太任我們的思想視野，但卻不妨大膽地打破一切傳說的束縛，從上述的論據的據點深入，發掘到所謂「爲什麼」的所在，來一個賦有建設性的理論或學說之建設嘗試。

這一個有建設性的理論或學說之建設工程的第一步，即是我們不容不直接了當地指出並說明：在不同之「經濟關係」的反映下，那創造與促進東西或中西文化者和組成與支配東西或中西社會者的「人格」根本不同。或可說這也就是「中國天下」和「西洋世界」的「歷史人格」的根本不同。「中國之國」之所以爲「中國之國」者，或正可借重於這種「歷史人格」來說明。

在中國，我們可以說，創造文化者是農夫 (Farmers)，促進文化者是農夫 (Farmers)，傳播文化者是農夫 (Farmers)，而支配文化者仍是農夫 (Farmers)。同時，中國社會之組成者是農夫 (Farmers)，中國社會之管理者和保衛者是農夫 (Farmers)，而中國社會之破壞者和改革者還是農夫 (Farmers)。反之，在西洋，我們可以

說，創造文化者雖是農夫 (farmers)，但促進文化者是水手 (sailors)，傳播文化者是水手 (sailors)，而支配文化者更是水手 (sailors)。同時，西洋社會之下級組成者雖是農夫 (farmers)，而西洋社會之上中級的統治者卻是水手 (sailors)，西洋社會的保衛者是水手 (sailors)，西洋社會之破壞者和改革者更是水手 (sailors)。自然，在這裏，我們所使用的水手 (sailors)，這個名詞，不是極狹義地專指那生於舟中，死於舟中，來自海洋，去向海洋之古海盜式的小氏族而言，而是廣泛地將那一些大規模地來自海洋，侵入陸島，或來自陸島，侵入海洋，或水陸兩便而兩棲的野蠻的民族 (或部族)，都包括在內。所以 sailor 一字實含有 sailor + hunter + nomad 之複合的涵義。

根據以上的論列，如果我們不嫌再來一個新新創立的學術術語之於一般人仍甚陌生的話，我們似不妨稱「帝國」，「族國」和「天下國」之分類的宣告之後，再度直接了當地向世人宣告：『一部中國史是一部農夫 (farmers) 活動史；一部西洋史是一部水手 (sailors) 活動史。』假如我們願意把辭句修飾得更週緣一點的話，我們不妨說：『一部中國史是一部由內在的改革和革命走向自我循序發展的歷史；一部西洋史是一部由外來的征服和破壞，屢退步而屢躍進的歷史。』

明白了「一部中國史是一部農夫的活動史；一部西洋史是一部水手活動史。」或可說明白了「一部中國史是一部由內在的改革和革命走向自我循序發展的歷史；一部西洋史是一部由外來的征服與破壞，屢退步而屢躍進的歷史。」我們似已把握了中西歷史的鎖鑰，體認到中西歷史的神髓，自不難左右逢源地了解了人類文化或世界文化之見於西洋者爲什麼顯現着「力的」或「動的」的姿態或情調，而所見於中國者或東方者，又爲什麼顯現着「情的」或「靜的」的姿態或情調；所謂「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或「中西歷史及其政治」又何以會顯現着不同的風格與內容的道理。同時，我們也可自輕而易舉地來說明在中國的政治哲學和政治實踐的領域內，「何以會呈現着強烈的世界主義，或「天下主義」或「王道精神」的意向，而中國何以會是一個「國家」，又是一個「天下」或「中國之國」何以會是一個「天下國」的探因了。

當我們了解了，或可說當我們把握了中國歷史的祕密之後，我們也即會另有目的地因類觸及或因類接近東世界內部的內幕。這中東世界何以一直地演着新舊帝國起伏更替之興滅無常的悲劇？何以未能建立起一個統一的終極體系？也自然不會是緣因而然。

這原因也不是爲了別的，亦曾是因爲他的「歷史人格」之個別的特殊使然。支配近中東世界歷史者的「人格」，不是聰慧的農夫 (Amirba) ，也不是精敏的水手 (Suez) ，而是那些兇悍強悍之無定居的游牧之人 (Nomads) 。我們知道，在近中東一帶，創造文化者固爲古初的農夫 (Farmers) ，然而掠掠文化，奴役文化，或可傳播文化與毀滅文化者，卻每每是些以騎背爲家的人們 (Nomads) 。史澈底，近中東社會之支持者，保存者和毀滅者，也都是爲此等「以騎背爲家」的游牧者 (Nomads) 所主演，所包辦。因而，當我們回顧前邊所已提出之「一部中國史是一部農夫活動史」；「部西洋史是一部水手活動史」的宣告的時候，我們卻不妨再附帶宣告：「一部近東中東史乃是一部游牧人 (Nomads) 的活動史。」

第三節 中東歷史與大鹽海洋

游牧人所採用的求生手段，固與農夫或水手所採用的求生手段大異其趣，而農夫所採用的求生手段也和水手所採用的求生手段迥然不同。道或者是我們所熟知的事情，然我們之所應知悉者，自不應只限於知此而已。我們應擴大的了解，並進而知悉：由於一般的求生手段之迥然的不同，他們在生活上所反映之生活方式和生活意識也就因之而不同了。換句話說，在不同的「經濟生活」的反映下，「農夫型」和「水手型」的人羣們之在文化的，哲學的，和政治的諸廣大領域內所作的活動表現，與成就，也就因彼此「人格」的不同而隨之各異了。

農夫是以自然爲友的，是私自自然相安的，是重情的，是和平的，是泛愛的，是知足的，是保守的，是好靜而不好動的。中國人之所以無在或無往而不反映出「農夫人格」之趨樂和本色者，正是因爲中國人的身心浸透

於「田園經濟生活」的情調和色調之中的緣故。農夫的詩歌，自然是要寫愛性靈的抒寫和情感的抒洩，而不喜戰爭連綿的製作。農夫的藝術，也自然是很容易地會從那些和他們最接近之大自然山水風情中獲得生命，而不會從那些和他們距離遙遠之英雄美人的肉體上感到啓示。同時，中國人之喜歡食蔬食，飲淡茶，緩步清歌以自享，自暴道地的農夫式之日常生活形態，當縱自他們不喜曠生肉，飲乳酪，狂舞高歌之水手情調。田園爲農夫出沒的鄉部，中國人無怪愛田園。大體爲農夫生息的天地，也無怪中國人愛大陸。農村和田園是和平的，寂靜的，自然無怪生息於農村田野間的中國人形成和平而恬靜的生活範疇。

基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和「推己及人」的農夫性格，當然是要產生出「物我相忘，人我相安」的忠恕哲學。基於「敬鬼神而遠之」，和「未知生，焉知死？」之農夫的現實主義，自然會產生出輕宗教的習性。基於「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的農夫意識，自然是要產生出「無爲而治」，「與民休息」，的靜態政治。同時，基於「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和「四海之內，皆我兄弟」之農夫心境，也自然是要產生出一個超「部族」，超「邦國」的世界主義，或「天下主義」或「王道精神」。

依據的「國家」，對於農夫似是一個無利而且有害的組織。「國家」可能給予人民以幸運遠求之海外冒險的機會，但農夫最安土重遷的。「國家」可能給予人民以掠奪財貨之對外戰爭，但農夫於除卻不得已之革命戰爭和自衛戰爭之外，是反對戰爭的。「國家」可能給予人民以國外市場之取得和對外貿易與投資之安全，但農夫是輕視商業的。然「國家」也可能要給人民以重稅和兵役，這是農夫所最感頭痛的。所以在中國，人民之依據的「國家觀念」極薄弱，因而依據的「國家機構」也極不完備。但反之，農夫雖不需要一個狹義的或狹隘的「國家」，然卻需要一個比「國家」小的家族組織或家族制度，和一個比「國家」大的「天下機構」，或「天下政治」。家族制度，能給他們一個社會生活，社會秩序，和社會保險。「天下政治」，能給他們一個充滿着廣泛的或無限制的和平與自由之宏毓的天地，讓他們可以在其中自由的開發和耕耘。因而，在中國，不獨人

民的家族觀念極濃厚，而且以「天下」作對象的政治組織或政治體系也早已具備規模。以致在中國之政治哲學和政治實踐的領域內，自然而然地要呈現着世界主義，或「天下主義」或「王道精神」的意向和動力，而促成一個超「部族」超「邦國」的「天下」或「天下國」的出現。

剛剛相反的，水手是以自然爲奴的，是要征服自然的，是尙智的，是鬭爭的，是自私的是貪饞的，是進取的，是好動而不好靜的。西洋人之所以無往或無在而不反映出「水手人格」之趣味和風格者，正因爲西洋人的身心浸透於「海洋經濟生活」之情調和色調之中的緣故。水手的詩歌，自然是要喜愛冒險的和戰爭的史詩的歌詠，而不會抒寫性靈的感傷。水手的藝術，自然是很容易起源於同他們關聯最切的戰爭的寫狀，或對於領袖人物，英雄美人之肉體的崇拜，而無意於田園風情的啓示。同時，西洋人之酷愛喫生肉，飲乳酪，狂舞和高歌，自是道地的水手式之日常生活形態，當然是他們不喜歡食蔬食，品淡茶，緩步清歌以自享之農夫情調。都市是水手們獵獲滿足的過路驛站，無怪西洋人之喜都市。海洋爲水手們追求幸運的有爲世界，也無怪西洋人之喜海洋。都市和海洋是緊張的，鬭爭的，自無怪來往於都市和海洋之上的西洋人，形成了緊張而爭鬭的生活範疇。

基於「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或「天演淘汰，適者生存，」的水手體驗，自然是要產生出「物我對立」之「唯理」哲學，或「唯力」哲學。基於「勝利接近天國」，「上帝特惠強者」，的水手希冀，自然是要產生出尊崇宗教，敬上帝的風習。同時基於「人類是政治的動物」和「天賦人權」之水手的警覺，自然是要產生出「政治鬭爭」和「爭取政權」之動態政治。最後的，也或者是最大的區別，基於「優勝劣敗」和「弱肉強食」之水手胸臆，也自然是要產生出極狹的，排他的部族主義，國家主義，帝國主義，而昧於世界大同。

「天下政治」和家族制度，對於水手似乎是一個繁重的累贅，迂闊而無利的組織。「天下政治」可能給人以廣泛的和平或無盡的和平，但水手是不喜歡和平的。「天下政治」可能給人民以普遍的自由，或無限的自由，但水手是只喜自己自由，而不喜他人自由的。然「天下政治」也可能要人類一個利他主義之自我犧牲的要

求，這是和水手部族的小我利益相衝突的。同時，家族制度，可能給人民以社會生活，社會秩序，和社會保險，但這是水手們可能於「國家機構」中求得滿足的。然家族制度亦可能要給予人民以家族義務和拘束，這是水手們之個人主義的負擔和累贅。所以在西洋，一般人不但對於「天下政治」示漠然，就是對於家族制度，也總是乏興趣。因而，「天下政治」或家族制度之在西洋世界之政治意識的和社會意識的領域內，一向是缺乏着極根存在和發長繁榮的潛力。但反之，水手們雖不需要大的「天上政治」和小的家族制度，然卻需要一個比「天下體系」小比家族組織大的「國家機構」。「國家」雖可能給人民以重稅和兵役，這是水手們習以為常的。然「國家」卻可能給人民以幸運逐求之海外冒險，可能給人民以掠奪財貨之對外戰爭，還可能給人民以國外市場之取得和對外貿易與投資之安全，這是水手們所日夜祈求的東西。自然，我們不必再多說，「國家機構」在對內方面，還可給人民以社會生活，社會秩序和社會保險了。所以在西洋，不但狹義的或狹隘的「國家機構」特別健壯，而且一般人對於「國家」的權威懷着迷信般的崇拜。所以他們始終是防守於部族的或國家的芬蘭之內，走不出部族主義或國家主義之外。

中國人並非孱弱而就是廢夫，先天的選定了要建造起一個和平的，寬大的，「渾然一體」之樊夫式的「天下國」。而西洋人也非是生而就是水手，先天的選定了要製造出一些戰亂的，褊狹的，對立排他水手式的「帝國」或「族國」。只因爲在不開的「自然環境之影響下」所發生之不同的「經濟關係」的偉大，才於人類社會和世界文化之大的統一中，又復決定「中西南太人羣的文化情調」，政治作風和歷史動盪之於「農夫型」或「水手型」之個別的特殊或不同。我們知道橫線在西洋人面前的世界，是無盡的海洋；海洋就是西洋人的經濟前途，和政治出路。同時，相反的，橫線中國人面前的天地，卻是一個完整的原野或大陸；大陸就是中國人的政治的出路，經濟的前途。

波濤逐波的海洋，所能給予和所要給予人類的刺激和啓示：一方面是冒險，是征服；另一方面是對鎖，是隔離。在進行冒險和征服的一面，所有有效的手段是戰爭；而在進行戰爭的過程中，所有必要發揮的力量是

智慧，是勇敢。智慧，勇敢和戰爭，會有力的鑄成「水手型」的政治的內容和外形。由於戰爭的結果，是征服或被征服的對立之出現，被征服者屈服於勝利者的武力之下，被征服者的人民和土地也就變成了勝利者的戰利品，淪為壓榨和迫害的對象。接近海洋的優秀水手們，每會在海洋之上建立起各式各樣的政治征服或海上帝國。

海洋有便於強大者的外侵和征服，但亦有利於個別單位的防守和自衛。海岸的控制和操縱，不全在於蠻力的強大，而有待於技術的精優。海上的發展不在於全部的侵佔，而有重於據點的攻守。在海濱或海上據有基地的民族，每會感到自己生存空間之有限，以及生活資料之欠豐厚，恨望着海外世界的繁榮做夢，得機會就會邁向海外之發展和冒險；然同時又因為她們自己遠據有此等有限的生存空間和不豐的生活資源，亦每會促使她們懷抱着死守舊地的決心。這一點關係很大。它不但加重了各民族間的保守或偏見，而且也加強着各國民族單位對於征服者之有力的反抗或離心。因而，它也就極易促成或促進各個據有不同基地或據點之諸不同的優秀水手們之能達到各式各樣的自我發展。惟其如此，以海洋作背景的歐洲世界或歐洲人羣，一方面可以屢屢地在海洋之上建立起龐大的「帝國」，（帝國之持續，全在於帝國創造者之能操縱着海水的控制；一旦失去了控制的能力，她的帝國也就隨之崩潰而瓦解。）而另一方面卻亦曾從反「帝國體制」之艦隊戰爭中向「民族國家」或「民族國際」體制之另一極端處轉變。同時，海洋乃是促進商業發達之最有利的媒介；而商業的發達，又是工業昌茂和工商業城市興起和強大之主要素。工業昌茂和工商業城市之興起和強大，不但大有助於歐洲「民族國家」的形成，而且也是工業革命或機械生產之能首先出現於歐洲世界的重要原因。

反之，阡陌連阡陌的曠野或大陸，所能給予和所要給予人類的刺激和啓示：一方面是在開發和耕耘了另一方面是互惠互助。在進行開發和耕耘的過程中，所有有效的手段是和平；而在和平發展的過程中，所有必須發揮的力量是寬容和懃懃。寬容，懃懃與和平，曾有力地鑄成「農夫型」之政治的內容和外形。由於和平發展或殷勤耕耘的結果，是先進者開化後進者的關係的成立；是後進者同化於先進者之中，後進者的人民和土地化

成爲先進者週身的血肉的一部，後進者也進化爲先進者。生息於大陸之上之前進的中國農夫們，自會專心致志於一個和平的，寬大的，「渾然一體」的「天下」或「天下國」的建造。

大陸啓示着人類去開發去耕耘，而同時也促使着人類走向互惠與互助。在廣大而肥沃之無盡的原野上，有的是豐富的生活資料，只要懲肯努力耕作，您就可以生活無虞；有的是廣大的生存空間，只要您願意經營建設，您就可以安居生息。爲生存，爲生活，您可以自由開發，自由耕耘，既不須剝削他人的生存或生活，以保障自己的生存或生活，更不須毀滅他人的生存或生活，以取得自己的生存和生活。剛剛相反的，爲了加強自己的生存或充實自己的生活，卻反須在互惠與互助的原則下，保障他人的生存或改善他人的生活。而同時，由於原野上河、川、江、湖、的自然連絡，舟車四通，疆界不清，既不能割地以自限，更不能閉關而孤立。在這個阡陌相連，城廓相望，閭閻相接，而雞犬相聞之息息相關的「天下」內，不但不允許「小國寡民」之異風異俗的自我籠型，而且從「有無相通」之生活必需中，又復決定了彼此間之有利的經濟依存。惟其如此，以大陸或原野作背景之中國人羣，一方面可以在「中國天下」內自由開發，自由耕耘，彼此間有着無限的自由；而另一方面在互惠與互助的聲求下，又復彼此日趨向心，終至於渾化不分。惟其如此，「中國天下」的開發和耕耘，雖然是來得極爲緩慢，但卻來得極爲穩固；凡是中國人開發耕耘所到之處，即永爲中國人所有，不會再退出，亦不允他人分割。也惟其如此，在中國曾經一次大的事變，這個「天下國」的內容和形式要一度的更加充實和鞏固。

現在我們可以這樣的說：波濤連天的海洋，迫誘了西洋人賦形爲親離海洋的水手，採取了水手式的求生手段，而賦予西洋人以「水手型」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意識。同時，平疇萬里的大陸或原野，迫誘了中國人賦形爲酷愛田園的農夫，採取了農夫式的求生手段，而賦予中國人以「農夫型」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意識。反過來講，現在，截止現在止，我們還可以這樣的講：只有具有「水手人格」的西洋人，才能夠了解海洋，才能夠控制海洋，才能夠在海洋之上完成了各式各樣的政治征服和統治，創造出一個戰鬪姿態的「海洋文化」。而同時，也

只有具有「農夫人格」的中國人，才能夠了解大陸，才能夠開發大陸，才能夠在大陸之上完成了一個和平寬大而渾同的政治耕耘和收穫，創造出一個充裕和平內容的「大陸文化」或「田園文化」。

從今日往前走，西洋人於控制海洋之外，似仍是昧於大陸的特性，或田園的特性，不懂大陸（現世的德國雖有點要懂的意思，然不幸，很快地就被希特勒導入歧途，或田園。但反是，中國人於大陸或田園的開發和耕耘之外，已痛切地感受到近百年來海洋所給予她的威脅和不幸，開始去研究海洋，去了解海洋，並進而去學習控制海洋。大陸同海洋之結婚，似即是中國新文化，東方新文化，中國新政治和東方新政治的前途的所在。

當我們熟悉海洋與大陸之對於「中國天」和「西洋世界」所起的作用的時候，我們自亦有可能會進而知悉，經濟環境或自然條件之給予近中東世界的響影又爲如何。

我們知道，橫陳在近中東人羣面前的世界，不是一個完美的原野或大陸，也不是四通八達的海洋，而是一片不毛的沙漠和荒涼淒迷的草原。不毛的沙漠和荒涼的草原也就是近中東人羣之所有的經濟源泉和政治前途。

由於廣大之沙漠和草原夾雜着一些河流的肥沃岸域而構成之近東和中東，或可說由遼闊的荒涼和點線的繁華而組成之古老世界，是誰都知道，它不是一個上帝恩惠特厚的地區。它不是一個可以廣泛地從事開發，或普遍地施行耕耘的天地，也不是一個可以彼此分立，各守各的據點，各個民族可以各自發展各自之政治經濟的處所，只是一個牛羊駝馬可能喘息馳逐的世界。換句話說，這座地區，不是誠樸的農夫們所可自由安居，所可自由耕耘的世界，也不是機敏的水手們得能涉足遨遊，得能從事工商的處所，而是一個爲兇悍的游牧人羣所獨能馳騁角逐之場，或攻戰襲劫之地。在不剷削他人的生存或不取消他人的生存，即不足以保障自己的生存或建立自己的生存之自然環境中，或經濟條件下，自不容他們走向和平發展的道路，由互惠到依存，由提攜到同化，把它開發成或耕耘成爲一個繁榮昌盛之「渾然一體」的「天下」；也不容他們劃地自界，從各自獨立的發展

中，形成爲一個自由競爭的「國際」。相反的，他們卻不能不停留於以種族征服種族，以「帝國」毀滅「帝國」之新舊帝國的興滅無常中。

例如原始住居或侵入兩河流域和尼羅河畔的人羣，雖曾於得天獨厚的機會中，很早地而且很快地踏進了農業的階段，創造出人類歷史上之最早的太古文明。但是他們的繁榮，也就是她們的隣人或後於她們而來的後起者之生存和繁榮的威脅。或可說，也就是其他種族之即將由饑寒而走向衰敗或消亡的代價。這不是爲了別的，只因爲在這個廣大遼闊的天地內，只有這一點極有限的生活資料和生存空間之存在，自然是誰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了。而得者之生，也就是失者之死。惟其如此，生存和繁榮的誘惑，和饑寒死亡之威迫，也就支配了這一地區的，或這一世界的歷史。其結果，是：生存者以侵略爭取生存；然又以生存招致侵略。或可說，侵略者以侵略招致侵略；以戰爭招致戰爭。或可說，生存者與侵略者以生存毀滅生存；以種族征服種族；以「帝國」毀滅「帝國」。因而，也就形成了『游牧型』之「帝國體制」。這或者就是近中東世界之一向的政治特徵。一直到最近之最近，當地理因素在人類歷史上稍稍減低其重要性，而經濟條件亦稍可以人工改進的時候，近中東世界的歷史動向也才開始地有點變，有點異樣。

明白了近中東歷史之與沙漠和草原的關係，或者是會有助於我們對於中西歷史與大陸海洋的關係之更深的理解。

第四講 中國歷史走到了西洋歷史的前頭

第一節 一部中國史是一部農夫活動史

應用『一部中國史是一部農夫活動史』，『一部西洋史是一部水手活動史』的理論或學說去解釋『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或『中西歷史及其政治』之所以走向不同之道的道理，或『中國之國』之所以爲『中國之國』的道理，或會像我們前以『帝國』，『族國』和『天下國』的理論或學說去類分國家爲三大類型一樣，或可能獲得東西學者們的承認和同意？也或可能被他們所稱道，認爲是在真理之追求中，或學術思想之前進裏，一個新境界之開發與開拓？但是一開場，或可說緊隨着我們所作之我們由研究經思考而始達到達構成此項理論或學說的經過的陳述和論證之後，就提出此項理論或學說（又一個極陌生而又極重的理論或學說）的結論的應用，而不談構成此項理論或學說之所經由之研究和思考之所憑依的史據，或正同我們提出了『中國之國是一個天下國』，和『帝國，族國，天下國乃是古今來人類所營之國家生活的三大類型』的理論或學說之陳述與論證和應用之後，而不加以史實的說明一樣，自亦很可能地會使得一般人士之由於對此項理論或學說之過分的陌生而暗懷疑慮或駭怪。爲了解除此項可能發生的疑慮或駭怪，我們自不妨，且理應於緊隨上述理論或學說之已在前一講中的提出和陳述以及其邏輯的論證與實地的應用之後，再拿出系統的歷史事實來，補它一個史實的說明。

在中國，自有史時代起，每當一個大的政治變革之到來，總是和農夫大陸，與大陸之開發，耕耘或捍衛有關。

這些變革，不是在中國大陸或東亞大陸之上，一個農業民族（或部族）和另一個或另數個農業民族（或部族）因相遇而融合成爲一個大的農業民族集團（或部族集團），加強了並擴大了大陸開發和農事耕耘的力量和

範圍，從部族範圍的開發和耕耘擴大到邦國規模的開發和耕耘；便是在這一個大的農業民族集團中，起來了一個新興的優秀的最了解大陸開發，亦最勤於農事耕耘的政治單位或農業單位，代替了舊有的統治。她利用封建體制作連絡，將一個邦國規模的開發和耕耘迅速地向「天下」擴張，而建立起一個「封建天下」，或「封建的天下農業機構」。再不然，就是這個寬鬆的「封建天下」或「封建的天下農業機構」沒落了，這個「封建天下」內含的有力份子或進步單位即起而向前猛進一大步，踏過了這一個寬鬆的「封建天下」，建立起一個中央集權金字塔之一之緊嚴而進步的「郡縣天下國」，或「郡縣的天下農業機構」。她一方面在經濟上，充實了擴大了並統一了田園農業或精耕制農業之「天下」開發和耕耘；另一方面在政治上，確立了並鞏固了這一個以「天下」作範圍，以「郡縣」為單位之「新型國家」，或「新型的農業機構」的農夫統治。從此以後，這一個「新型的農業機構」，這一個「新型的國家」最好說這一個「天下國」或「郡縣天下國」的政治的轉移，就永遠是由內在的改革和革命的方式相更替；她就永遠的為這個「天下國」的主人們自己（這個新型的農業機構或新型國家的組成者與支持者之農夫大眾）充實着，管理着，和保衛着。這中間，雖偶有兩三次的例外事變之出現，但似是例外而實非例外。表面看這一個為中國農夫大眾們自己所創造，所改革，所充實，所保衛的「天下」或「天下國」同一個（或一羣）不懂大陸開發不解農事耕耘之兇悍的游獵蠻族相遇，而且是他們征服了，但結果，一個是一無所獲地被驅逐，另外的兩個卻全部地消滅於這個偉大和半的「天下國」之中。

以上就是中國有史以來的政治變革的大略形勢。即在隨行的段節中，我們再進而分別討論。

因為史前史料的不充分，我們對於中國史前史的政治變革，還不便多下判斷。但就現有的古代史的史料加以研究，已可約略地窺知夏殷之際的歷史情狀。當新興的殷民族（或部族）和夏民族（或部族）在古中原相遇的時候，夏民族固已是一個久已進入了農業社會的民族或民族聯合體（或部族聯合體），而殷民族也同樣是一個踏進了農業階段的民族了。在名義上（或當史家的說法），似乎殷民族把夏民族征服了；實際呢，卻是一個

農業文化較低的夏民族消化於一個農業文化較高的夏民或民族聯合之中，而形成了一個更大的農業民族集團。她一方面加強了流播大了黃河流域的農業開發和耕種，另一方面又充實了中原文化之自我，締造了鞏固了夏民族所已樹立之趨部族的農業經濟，政治基礎，並奠定了中國歷史和文化之可能長足發展的基石。

隨後，周民族起來代替殷民族指導中國政治的時候，不能看做外來的征服，只能看做是內部產異之新陳代謝，等於在一個大的農業民族集團中起了一個優秀的，健全的，最了解農業開發最勤於農耕的政治家地位或農業單位。她不但把一個邦國規模的農業開發，由黃河流域擴張到大江以南，住於一天下，一國，而且以此「天下」為對象，封建制度為手段，將夏族以來所創具之以農業開發和耕種作青島的的封建制度，文化生活，向前推進了一步兩步或三步。結果，周民族不但創造出來一個在當時最進步亦最發達的封建的社會制度和寬鬆的「天下政治」，（或可總名之為「封建天下」，或「封建的天下農業機構」）把那個在當時已知的文、世界和半文、世界都統統地包括在這個寬鬆的「封建天下」或「封建的天下農業機構」之內。而同時，周民族曾經天才地維持着這一個「封建天下」或「封建的天下農業機構」在有秩序的秩序中過度四五百年之久，範圍了並強化了中國政治之向心的力量，以及中國歷史之邁向「合一」和「平」之處而邁的動向。以致她能在古典文化的創造領域內達到了「嚆」的境地，並能為一個由此寬鬆的「封建天下」或「封建的天下農業機構」脫胎而成之緊嚴而生動之「郡縣天下國」，或「郡縣的天下農業機構」之新型的國家生活和社會生活預立規模。

待到周民族所營造之封建的社會制度和寬鬆的「天下政治」，或「封建天下」，或「封建的天下農業機構」不足以適應時代的要求，自告沒落之後，一個新型的秦天下，一個新型的「郡縣天下國」，或可說一個新型的「郡縣式天下農業機構」即脫胎而出。她起來創制了並確立了一個嶄新的中央集權式的中央政治，一個新的分部治事的部官政治或人才政治，和一個以「郡縣」為單位，以「四縣」作疆界之宏大而緊嚴之「天下體系」或「世界體系」之政治組織，政治生活，經濟機構，經濟生活，文化體制與文化化生活。她建立了「天下」（在

當時已知的文明世界，半文明世界，甚至部分的野蠻世界，的全部在同一的精耕制度下或灌溉系統下，開發着，耕耘着，灌溉着。也就是讓「天下」的全部在同一之經濟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待遇下浸潤着，凝結着，發展着。既無地域的限界，又無種族的區分，更無征服者與被征服者階級的對立。秦之代周，自然是更不能看做是外來的征服。這一次，卻應視為一個劇烈而偉大的為內部革命。

這個革命所作的破壞工作固然巨大，她所成就的建設工作更是驚人。但我們卻應切記而深知者：這個革命的破壞無論是如何的巨大，她所摧毀的只是一個違背了時代要求的封建體制，卻並未摧毀到那構成中國社會基層和文化源泉之農夫大眾的實力，反而把他們的苦難解放了，把他們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提高了。同時，無論這個革命的建設是如何的驚人，不外是把她所建立之中央集權的政府，都會治專的政治，和一個「天下體系」的政治組織和一個「天下範圍」的經濟機構的維持和運用，都統統地放在農夫階層的優秀份子的肩膀上。

從此以後，直到現在還未休止，中國的政治和政權可以說是完全落到中國農夫的手中。不但秦以後的朝代興革，每每是崩潰於農夫的發難，重建於農夫的革命，而且秦以後諸朝代的開國皇帝十之七八是直接間接地從農夫大眾的行列中躍出。此外，真正操縱中國政治支配中國文化的士大夫，可以說是全部的來自田間，而且是還要歸回田間。我們固不必仿效西洋，一定的稱中國的士大夫為中間階級，然而這一個極類似西洋近世之中間階級的中國風的士大夫，不僅比西洋的中間階級早出了兩千年，而且他們所代表的，不是少數財閥的權益，而是代表着廣大的農夫階層的福利。他們反對和農夫利害衝突之商人剝削與政府聚斂；他們輕視商人的活動，限制商人的活動，也抗議官府的聚斂和重賦。截止今日而上的數，一直到秦代，我們可以說：在中國的社會內，如果是階層的話，它只有一個階層，這階層就是農夫階層；在中國農夫階層之上無階層，在中國農夫階層之下也無階層。我們固不應否認，在中國農夫階層之內，仍有着貧富差異的存在；但這種貧富的差異，是流動的，循環的，不固定的，不是為某一些家族所專有，所壟斷，而是隨時隨地可以互易而倒置的。在資本主義尚未侵

入中國之辭，在中國農夫階層之內，地主，自耕農和佃農等地位或關係之升沈興衰，正當是帶着勤儉與寬裕的工作曲線而互相更替地在他們自己的圈子內兜圈子。關於這一基點，我們或不防舉詩以爲證：

「朝爲田舍郎，

暮登天子堂；

將相本無種，

男兒當自強！」

這一首在過去民間極爲流行的舊詩歌，不僅是舊日父兄或師長勸誘子弟們努力讀書的運動劑，也不僅表示着在中國有一個獨特的公平的而且進步的考試制度，而實是中國社會階級可以隨時倒置的寫照。

至於說到晉隋間之五胡亂華，和元滅宋，清滅明等故事，好像是爲中國農夫所創造，所改革，所管理，所捍衛之「中國天下」或「中國天下國」已爲北方的游牧的或游牧的蠻族所征服，所毀滅。而實際呢，卻完全不是那樣的簡單。不惟爲中國農夫所創造，所改革，所管理，所捍衛之「中國天下國」仍然健在，所謂「城廓猶昔，而人民亦猶昔，」反而又感受了一些新鮮事物的刺激與補充，使得它的內容和範圍更見豐富充實與擴大。晉隋間之五胡亂華，固然造成了南北朝之表面對立，但與其說是南北大分裂，勿寧說是民族大混合。因爲一度大擾攘的結果，不但物歸故主，而且還增添了不少的新東西。其次，說到元清的入侵，在她們更是得不償失了，如果僅就狹隘的民族觀點看。拙於學習，不耐學習，所謂「以殺戮爲耕種」的蒙古騎士們，不懂開發，不解耕耘，不惟不幸地沒得從中國學習到些什麼，將他們自己的生活改善，不到九十年，也就失掉了統治者的王座，而重復回歸於極北方之荒寒的草原。長於學習的滿清弓弩手，雖是怠於農耕，懶於開發，然卻於不知不覺中學會了中國的一切，更於不知不覺中消失到這個「中國天下」和「中國天下國」的範疇中。

直至最近一世紀，中國和西洋正面相遇的以前，中國的農夫不但是堅定地管理着捍衛着爲他們自己所締造，爲他們自己所改革，爲他們自己所享有之和平寬大的「天下」或「天下國」，而且更溫和更積極地將這個和平

寬大的「天下」或「天下國」的大門四開，歡迎着住居於四境之外的一些大大小小的後進民族，或一些大大小小之後起的四隣兄弟之國。她——中國農夫——不僅是對於四週之夫夫小小的兄弟之國而交之以道，接之以禮，「處之以寬大和容忍，而且教之以農業的開發和耕耘，文化的開發和耕耘，甚至政治的開發和耕耘。結果，在寬大容忍的感照下和開發耕耘的扶助中，整個的東亞大陸已斷次地晉入於大一統之「合」與「平」的境界中。於是遙遠之東北的三韓，西南的越南，遲遲與緬甸，也都自動地加入了「中國天下」的「天下體系」。或可說他們都加入了「中國之國」之農夫大家庭，作為這個大家庭之中的諸成員的一員。待到中國史經漢、漢、漢、江、淮、流域擴展到北太平洋與南太平洋。

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洋之突然相遇，或可說中國農夫和西洋水手之突然相遇，在海上，在邊境，中國農夫吃了不少的虧，也失了不少的土，但是「中國之國」的本部或「中國天下」的核心卻仍然是完整無缺的掌握在中國農夫的手中。西洋的水手們雖然是一再地用暴力迫使中國的四隣兄弟之國和他們的長兄分家徙居，但無人能夠吞下或分割這一個「渾然一體」的「天下」或「天下國」的本身。

當中國農夫為捍衛這個「天下」或「天下國」之存在和完全被迫對西洋水手作戰的同時，或繼續作戰的同時，他們也早已在這個「天下」或「天下國」之內屢屢的發動着必要的改革和革命。他們雖堅決地維持着他們原有之「農夫型」的和平和寬大的傳統，但卻也珍惜着他們之一向之「農夫型」的頑強而不可征服的精神。他雖重視他自己之自足自給的保守，但也力行他「保守而進步」的進步。她遲疑了一會，徘徊了一會，終於加緊地促進了他自己之必要的進步和改革。為時不過一百年，不過六七十年，或可說不過三十年，他，這個老大的農夫，已在新時代的覺醒下，以解放自己並反抗侵略之「新力士」的新姿態和世界相見了。在不久的將來，待到她戰敗了他的強敵之後，她不僅是仍要本着農夫的本色和平而親切地和她的舊日的親故回復親近，而且還要準備着他的新隣人親切握手，仍舊是本着他農夫的本色，為人類的和平和世界的大同作更大的開發和耕

耘，促成現世界之能於和平寬大的道途上轉向合作與互助的「合」與「平」的處所走。

第二節 一部西洋史是一部水手活動史

政治變革之在西洋呢，剛剛是和中國異趨而行。自從有史時代起，西洋歷史上之大的變革，總是和水手，海洋，與海洋之侵襲，征服或反征服有關。

西洋歷史上第一次的政治變革的到來，就是一個由大海掠奪轉化為島國耕耘的農業部族之和另一個由山地獵人化身為荒海水手的北方蠻族的相遇。結果，是後來的水手蠻族毀滅了前者的城廓田園，擄掠了前者的妻奴牲畜，竊取了前者的文化，而復歸回於北方的半島，另行建立起一羣水手族支配下的諸城邦，和一個小規模的北方殖民帝國。接着，是一個新興的北方蠻族由北方南下，一方面蹂躪着這個半島上互相戰爭的諸城邦，另一方面臨海化身，也變成一個和她的前行民族一樣機敏的水手。於是在水陸並進之下，建立起一個獵人水手混合型之狄克推多支配下的水陸大帝國，不久，這個大帝國分裂了。另一個新興的西方蠻族（不知她的來源是來自海上，抑是半島上的土著？）開始了她自己身邊的領土征服。待她完成了她身邊半島的內陸征服之後，也就轉而面向大海（或可說她回頭復面大海），了解了她面對的大海（或可說回復了她幼時於大海的記憶），很快地變成了與海水相親的水手。她破壞了一個海上的秩序，又建立了一個海上的秩序。她完成了一個更加擴大的海上征服，並建立起一個以地中海作為內湖的大帝國。隨後，另由「一波逐一波」之野蠻的北海水手之羣的大舉侵入，瓦解了這個大帝國，久經混亂，而另行建立起一羣新興的水手民族支配下的民族王國。她們各自佔有一塊陸地，也各自領有一片海洋。爲了海的誘惑，她們在海上爭霸，一國代替一國或一國學樣一國地建立起新式的海上殖民大帝國。爲了海的誘惑，她們發明了加速生產之機器工具，創設了工廠制度，先中國或東方促成了一個劃時代的產業革命的到來，將一個中古的歐洲迅速地過渡到現代。仍是爲了海的誘惑，現代歐洲之諸民族國家間的海上競

爭或世界侵襲的規模也就愈來愈大，所用的手段亦愈演愈烈。

以上就是西洋有史以來之政治變革的大略形勢。我們也即在接後的段節中加以較詳的論述。

由於西洋古代歷史的指示，我們知道，自從東部地中海之島國海民以克來特與邁錫尼等地作據點，感受了近東古文化的脈流，進而孕育了一個農業階段的古愛琴文化之後，第一次的政治變革就是一個來自北方古巴爾幹半島之上的蠻族的秦馬乘舟，來一個古海蓋式之鬼海冒險的侵入。侵入者無情地毀滅了被侵略者的城廓田園，殺其男夫，擄其妻奴，並竊其文物，棄其廢墟而北去。於是被征服者，或可說被毀滅者之文化的餘渣乃隨其勝利的主人移地植根，而另開希臘城邦之花。希臘世界新文化的代表人，也就是「以海為家」的雅典城的水手們，開始以海水作她們之政治的和經濟的工具，來一個海上殖民帝國的建造嘗試。但當雅典人之海上的殖民帝國出現之後，爲了這個帝國，整個的希臘半島也就很快地失陷於混戰之中。

不久，另一個北方之新興的山地種族馬其頓也同樣學步地由北方的山中南下。她征服了互相戰爭的希臘諸城邦，奪其政權，竊其文化，而同時也就發現了希臘人控制海水的秘密。於是水陸並進，在她們的鑿聲和馬蹄之交響樂下，很快的建立起來了一個掠奪鎮壓式的海陸大帝國，確立了一個東部地中海的海上統治。但可惜，這一個視作個人或部族之戰利品的征服帝國的經營和統治，是無可避免地走不出狹隘的水手政治的範疇。征服者與被征服者之間，只有利害差異的對立，缺乏休戚相關的聯繫。在鎮壓和剝削的關係上，一個世界體系或「天下體系」的政治組織，政治生活，自然是無從建立。一個由內在的改革或革命之新陳代謝的政治變革或社會變革，也自然是無由產生。在西洋歷史上，雖曾記有亞力山大大於征服波斯之後，曾自娶波斯皇帝的女兒爲后，並令他的將士們也各娶一個波斯婦人爲妻的故事，似亦不無有撮合東西之意。其實呢，這只是一個青年水手的個人羅曼斯，很少有政治的意義。所以一旦亞力山大大王像秦始皇帝暴卒之後，後繼的不是一個渾然一體的「天下」，而是互相排擠的三個王國，各走各的道路。

正當希臘世界或馬其頓世界內的三王國互相排斥，爭吵不休的時候，一個來路不明之新興的西方蠻族

馬，以丁樓的小平原作據點，並以泰伯河上的七丘作堡壘，組織軍團，已開始向意大利半島之北方，東方和南方進行着侵略性的征服戰爭。而同時，她也就開始征服地中海的邊緣上面對大海；從專於海水的了解，並從事於海水的征服。待她以三次的大海戰擊潰了她的海上勁敵迦太基之後，就確立了一個羅馬水手之海上新統治。

利用地中海上統治，很快地又征服了一個半沒落的希臘半島，和一些半希臘化的近東北非諸王國。於是，一個完整的地中海變成了她的內湖。眼看着她一個可能成功的世界體系或「天下體系」的政治組織和政治生活已爲海水之有力的介紹而實地出現了。然而仍可惜，羅馬水手們同希臘水手或馬其頓水手們犯了同樣的病症。她不僅同樣的突不破狹隘的水手政治的束縛，而且猶分地相信她仍控制海水的力量，更變本加厲地將這個帝國的政治基礎赤裸裸地建築在征服欲壓榨和迫害的關係上。這個掠奪帝國的組成，是地域等差的隸屬，是種族高下的對立，自然是談不到什麼平等與協調，更談不到什麼平等與協調的開發和耕耘。所謂「羅馬世界」，是一個充滿着不平和仇恨的世界。所謂「羅馬統治」，是一個征服者所加於被征服者之「分而治之」的統治。所謂「羅馬主義」，也自然不是那超「部族」，超「邦國」之世界主義，或「天下主義」，或「王道精神」，而是一個道地的侵略主義或帝國主義。晚世的羅馬，對於異族的待遇，固不無稍趨寬大，所謂「羅馬公民資格」的賜予，固亦不憚過去之嚴苛與懷吝，然而這已是始於「羅馬秩序」開始動搖之後，格於當時的頹勢和危機，不得不然，已無補於「羅馬世界」的協合。所以這個大帝國的政治前途，亦仍不能違由內部之改革和革命的推動走上新陳代謝之自我循序發展之路，反而坐待外來之新的征服和破壞之伴同着一個混亂與退步的時代的到來。果不其然，待到羅馬和水手對於海濱的控制力逐漸見衰退之時，就另有「一波逐一波」之後起的北海水手蠻族之羣的大舉入侵。由於她們入侵的結果，不惟這個大帝國瓦解無遺，不能像「中國天下」或「中國天下」一樣地將這些後起的野蠻民族吞融消化，反老更生，且因在政治哲學和政治實踐的領域內，苦於無「渾然一體」或「大一統」的潛熱或潛能可資憑藉，任何優秀的後起民族再也不能在這個瓦解之後的大帝國的廢墟上恢復或重建故羅馬帝國的舊規模。經過了幾百年的黑暗時代，在這個可能建設成功爲一個像中國一樣之「渾然

「一體」的「天下體系」，「天下機構」，或「天下國」的世界上，卻走出了一羣大大小小之新與水手的民族王國或帝國，互相排擠，互相戰爭。於是在歐洲世界的自己圈內，更是形成了一個紛爭戰亂之局，再也走不出無政府的時代。（若是單就歐洲的歷史來看這一個新的局勢，這自不是歐洲歷史的倒退，而是歐洲歷史的前進。西洋水手們雖不能像中國一樣建立起一個「渾然一體」的「天下政治」，但卻已力抗任何民族之再建造什麼征服帝國。）

仍是爲了水手和海洋的姻緣，待至歐洲的新主人們開始發現了大西洋，而且企圖控制大西洋的海水的時候，西洋的政治重心，也就很快地由地中海的北岸移至大西洋的左岸。同時，西洋的歷史也就脫離了以地中海爲舞臺之冗長的中古生活，踏進了以大西洋爲活動基地之近代。

伴隨着這個時代的開啓，在西歐新興之民族國家的羣中，接近海洋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和法國西即起而向東方尋找香料和黃金。因而他們發現了東來中印的新航路，又發現了美洲新大陸以及西印與荷印。因而他們也就征服了美洲，西印與荷印，或先或後地建造起一些或大或小的海上殖民帝國。最後，後起的島國英吉利，一個最接近海洋又最了解海洋的國家，也就成功爲一個最能征服海洋控制海洋的國家。她雖未能像希臘、羅馬的水手們一樣，完成了一個全歐洲世界的征服，但卻利用她的海上優勢，在海上一敗西班牙，再敗荷蘭，三敗法國，而另於歐洲之外製造出一個「領土之上無落日」的世界大帝國，確立了一個最龐大最新式的海上統治。爲了她的海洋帝國，爲了她的海洋統治，爲了她的海外貿易，也就迫誘得英國人發明了機器的製造和應用，創造了工廠制度的生產，促成了一個產業革命的到來，將歐洲迅速地從中古過渡到現代。

就某一些方面看，這一個「領土之內無落日」的世界大帝國的出現，不能不說是近代世界史上的一件驚人的成就，也不能不承認是哥羅薩克遜民族之征服海洋和控制海水的天才的優越。但是可惜的很，以哥羅薩克遜民族作代表之現代之經濟榨取式的殖民帝國，不過是西洋帝國之古舊的掠奪方式的新花樣；以哥羅薩克遜水手們以及拉丁水手和日耳曼水手們之現世的海上統治，仍未能走出帶腦水手們和羅馬水手們之狹隘的水手政治

的範疇，甚至較前者更爲苛虐與無情。惟其如此，這一個「領土之內無落日」的世界帝國，仍是一個「帝國」，而不是一個「天下」。

一直到今天，我們可以說，西洋世界的世界史和世界政治是始終是爲古今來的水手所創造，爲新舊的海洋所支配。新與的水手部族或民族征服了或推翻了舊水手部族或民族統治下的城邦或帝國，而另行建立起一些新的王國或帝國；新水手的新統治，也就代替了舊水手的舊統治。而同時，新與的海洋的誘惑壓倒了古舊的海洋的誘惑，新與的海洋也就取代了舊海洋的地位，作爲新與水手們之角逐幸運的場所或表現身手的舞臺。在這些古舊的和新與的海洋之上，我們曾一再地聽到新舊水手之勝利的歡呼，但亦曾一再地聽到被征服者之臣妾奴虜般的幽泣與悲咽。如果海水是一面反映歷史之劍的明鏡的話，從這面海洋的明鏡中，我們首先看到西洋社會或民族階級之顯著之不平和对立的倒影。我們曾看到希臘、羅馬時代奴隸主是如何地鞭打奴隸民族之背，又看到中世紀之封建領主們又如何地扼殺被征服的民族變爲像牛馬一樣的農奴，可以自由生殺買賣。

到了近代，這面海洋之明鏡，不僅反映各個新與帝國之內之種族的迫害和不平，已進而反映各個民族國家之社會的不平和不安。表面看，工業革命之後，在西洋之新與的民族國家內，由於水手自由民化身的中間階級的興起，發動了社會革命，從統治者之水手貴族的手中奪到了政權，會將廣大的農奴解放了。然而不然，這一聲新興的中間階級，一轉身間，又復變成了資本主義社會內之財閥統治。剛剛解放了的農奴，未待喘息，就又被經濟的變策，驅進了萬惡的工廠，淪入於更愁慘之工奴的命運。於是所謂階級鬥爭的勞資戰爭即出現於各國的國內，而所謂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戰爭與爭霸戰爭也就頻臨於國際之間了。

在這種新時代之更嚴重的毀滅威脅下，西洋的歷史動向趨於急轉直下之勢，纔有意擺脫狹隘的水手政治式部族政治的束縛，在社會主義者之經濟的世界主義的號召之下，開始向大世界之大統一的「合」處和「平」處轉進。然而不幸，水手終是水手，海洋亦仍是海洋，征服侵襲亦仍是征服侵襲。當這種新的轉進剛剛開始之初，也就又招致到一個很強烈的時代逆流的澎湃，由於納粹，法西斯等時代逆流的湧現，古舊之水手式的

入，侵征服與統治的企圖已再度地復活於歐洲世界。現行歐洲大戰之初期的表現，可以說正是納粹德國和法西斯意大利等所謂「無的」帝國企圖以空軍的優勢壓倒英法當所謂「有的」帝國的海軍優勢，代英國或英美而為海洋之女王。這仍是一幕海洋的爭奪。

第三節 中國歷史走到了西洋歷史的前頭

前邊所已講述的歷史事實，雖是一個簡略的對照和陳述，然似已很清楚地速寫出了中西兩大人羣或中西兩大大世界的歷史動向或歷史動態之顯然的不同。由此等顯然不同之歷史動向或動態之啓示，自可使我們進而知悉：中西歷史何者是接近人類之「合」和人類之「平」，又何者是反人類之「合」和人類之「平」，而趨於人類之「分」和人類之「不平」。而由此「合」與「平」或「分」與「不平」的趨向的不同，亦自可使我們再進而知悉：中西歷史在人類或世界的史程上所居之地位的不同。

站在全人類的立場上看歷史，或可說站在歷史的立場上看人類，誰都知道，亦誰都承認，歷史的總動向，人類的總歸宿，是應向並要同「渾然一體」的「合」處走和「一視同仁」之「平」處走。向此方向走的是前進，是正常，是健康，反此方向走的是反常，是病態。因為「合」和「平」的背後是「和平」是「太平」；「分」和「不平」的背後是「仇恨」，是「戰爭」。

中國的歷史，既然是一部農夫活動史，一部由內在之改革和革命而趨向自我循序發展的歷史，在中國之政治哲學和政治實踐等廣泛的領域內，自會在在地反映着強烈的世界傾向或「天下意志」或「王道精神」。而在此等強烈的世界傾向，或「天下意志」或「王道精神」的指導和反映下，中國的歷史動向是自然而然而地要向着「渾然一體」之「合」的方向和「一視同仁」之「平」的處所走。因為中國的歷史動向是向着「渾然一體」之「合」的方向和「一視同仁」的「平」的處所走，所以中國歷史上的「戰爭」少，「和平」多。在中國歷史的上，有過五百年的「和平」，有過四百年的「和平」，有過三百年的「和平」，更廣展地有過百年或二百年的

「和平」。若是進而言之，如我們想正確地了解「和平」一詞在中國歷史上和政治上所含之真正的意義，我們最好將「和平」二字改換為我們中國人一向慣用的「太平」。因而，我們可以說在中國歷史上，曾經屢屢地出現着長期的「太平」。

習言不察，或可說自從中西相遇之後，一般人不大說「太平」，而只說「和平」。或單以「和平」一辭兼述「和平」與「太平」二辭所分別合具的意義。好像是「和平」就是「太平」，「太平」就是「和平」；這二者是一件同樣的東西，或一個同樣的政治境界。其實呢，這是一個很粗魯的誤解。「和平」和「太平」二者之間有着巨大的間隔和級差，幾乎是質的不同。我們知道，所謂「和平」，不過是指陳國與國之間之暫安的局面而言，或者是國際間之一時的未來戰爭之稱，而「太平」一語，乃係專辭狀述「普天之下」早已超越了無兵戎，無紛爭，無迫害之政治境界，而另達一富庶康樂，家給人足，一切的一切「各得其所」，和一切的一切「各得其平」之人類社會之最高級的政治境界。

達到了這個境界，不但是遍天下可以呈現出「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刑措不用」，「天子垂拱」，以及「男耕女織，百工各事其專，四民各樂其業」的治績，而且是遍天下可能晉入於「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盛世。甚至，還每每可能達到「民胞物與」，「仁及禽獸草木」的境界。這種境界，這種政治境界，自然是只可能出現於那「渾然一體」的「天下」，而無從出現於國與國之間互相對立爭戰的「國際」。「國際之間」可能企求與可能實現的政治境界，只不過是初級的「和平」，而「天下之內」可能企求與可能實現的政治境界，已不是人類政治境界中之初級的「和平」，而是高級的「太平」了。惟其如此，自從周秦以來，這一個「渾然一體」的「天下」或「天下國」之出現於中國之後，中國人所最關懷的所在，不是國與國之間之「和平」不「和平」，而是「天下之內」或「普天之下」之「太平」不「太平」。

「中國天下」之存在，以及「中國天下」之曾經屢屢地高達「天下太平」之最高級的政治境界，自都是平

真萬確之實有其事的歷史事實，並非是出自或人的或史家的幻想。然這卻不是說，在「中國天下」之內，已經根絕了戰爭。不，我們決不否認，在「中國天下」之內仍偶有戰爭的出現，並曾打得相當的激烈。但每次戰爭之起，與其說是分裂「天下」之戰，不如說是鞏固「天下」之戰；與其說是求「天下」之「亂」，不如說是求「天下」之「再治」。『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五百年亦必有戰亂之起。這戰亂，可以說是「天下人」尋求「王者」之戰，或尋求「堯舜之君」之戰，尋求像堯舜一類的「王者」出來，「行王道」，「施仁政」，「止干戈以爲武」，或「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以拯救或重建那一些正在危險之中或已經破壞之後之最高級的政治境界的「天下太平」。講到這裏，我們很可以再和近中東世界與歐洲世界之不同的政治傾向作一個有趣的對照。近中東世界的人羣每喜把他們的統治者視爲「神體」，也希望他們之爲真的「神體」。而歐洲世界的人羣也每喜把他們的領袖或國王看作「英雄」，也希望他們之爲真的「英雄」。但是在中國，就不然了，中國人民既不把他們的王者或元首看作「神體」或「英雄」，也不希望他們之爲真的「神體」或「英雄」，卻只把他們視之爲「萬全的聖人」，並急切的要求着責望着他們之能爲「萬全的聖人」。如果有「萬全的聖人」如堯舜者之君或差近堯舜之君，「以天下爲懷」，「以四海爲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而「下有望治之民，由「四海之內，皆我兄弟」之同情以致於「四海同心」，則「天下之內」或「普天之下」，自會油然「太平」，正如水之就下，誰能禦之。

反之，剛才說過了，西洋史的現代史之現階段的新動向雖是顯示出要向大統一之「合」的方向走和民族平等與社會平等之「平」的處所走的徵兆，但在昨日以前的過去，代表着水手活動的西洋史，卻始終是走着侵略，攻伐，或征服與反征服之對立衝突的道路。因而，西洋世界的政治哲學和以治實踐總是向着反世界傾向之狹隘的部族主義，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另一極端處發展。在這種極端的部族主義，或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或帝國主義的控制和反映下，西洋的歷史動向，也就很自然地向彼另一反方向之「分」處和「不平」處邁進。由於西洋世界的歷史動向是向着「反協會」，「反公平」之「分」處和「不平」處走，以致西洋

歷史上的「和平」少，「戰爭」多。西洋無三百年的「和平」，無一百年的「和平」，或可說無百年的「和平」。在西洋的歷史上，可以說是從來出現過像在中國歷史上所屢屢出現之政治的「太平」境界。西洋的進步人比們雖早在追求著人類政治境界之初級的「和平」，然至今仍不知道更不理解人類政治境界之尚有高級的「太平」。惟其西洋世界向未達到，亦向不理解人類政治境界之高級的「太平」，於稀疏的或短促的「和平時代」之外，卻曾有過數百年的「混戰」；有過「百年戰爭」；有過「三十年戰爭」；有過「十年戰爭」；在不滿二十五年的短時間之內，也就會爆發了兩次全歐洲的全面戰爭。

我們說西洋歷史上的「戰爭」多，自不是說西洋歷史上從無「不戰之時」。既然戰爭不是連一日都不停的接連下去，戰爭與戰爭之間自然是有其「不戰之時」。這些「不戰之時」之於多戰的西洋世界，也不像一般人所想像之向不爲人所重視。相反的，他們卻極端地重視著這一些「不戰之時」，而且每每是寶貴的親切地把它們稱呼爲：「某某和平時代」。

這一些「和平時代」之到來，在古初的西洋，只有讓它們之一「自來自去」，至多是新上帝或神祇以勸其遷去而早來。到了羅馬帝國之全盛時代，出了極大的代價（在衆多之弱小民族之獨立和自由的嚴重犧牲下），才換得短短一時的所謂「羅馬和平」。然此所謂「羅馬和平」，亦正如曇花一現，永不再來。一直到了近代和現代，各民族國家之間，固然是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和年復一年地在製造着「戰爭」，但如他們卻亦曾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和年復一年地在企求着「和平」。「戰爭」與「和平」之交互出現，構成了西洋世界之近代和現代的國際生活。這也是在近代和現代的西洋世界內，外交事務和外交人物之所以特別活躍並特別重要的由來。「外交」一物，固不是一件可以消滅國際戰爭之特效工具，有時且會促使國際戰爭之早日來臨，然在無政府狀態的國際生活中，卻也只有仰賴各國家之妥善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動，才有可能保障「舊國際和平」之過去，「新國際和平」的早來。但當西洋人開始努力以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動來促進「國際和平」並保障「國際和平」的時候，中國人在「中國之國」或「中國天下」或「中國天下國」的「天下」之內，已屢屢地享受人類政

清境界之高毅的「天下太平」者約有數千年。

根據此類的歷史事實來檢討，我們現在還可以回顧到我們在本講和前講之內所已一再申述之「一部中國史是一部農夫活動史；一部西洋史是一部水平活動史」的實判，進而更堅定地向世人公告：「一部農夫活動史是一部和平的歷史；一部水平活動史是一部戰爭的歷史」了。

當我們心平氣和，不帶一絲的民族感情和地域偏見，來將「一部和平的歷史」和「一部戰爭的歷史」作一個全面的比較或對照的時候，無可諱言地，亦不必諱言地，我們會深深地感覺到：在人類之純智能活動領域內的某一些活動，「一部和平的歷史」所曾經表現的歷史活動，較之於「一部戰爭的歷史」所曾經表現的歷史活動，或不無失之於太保守，太妥協，或太消極。例如對於科學精神的忽視，以及對於征服自然或奴役自然諸活動的冷遇，自是中國史——一部和平的歷史——之應當痛切地來一個自我批判的所在。但如果我們轉回頭去，回顧政治活動的領域，或可說回到那偉大的政治體系和高毅的政治境界之創造上，一部中國史的成就較之一部西洋史的成就，卻已來得前進的多多。在歷史的總動向和人類的總歸宿是應向並要向「渾然一體」和「一視同仁」之「合」處和「平」處走之大的前提下，或可說在人類歷史之趨向「世界大同」或「四海一家」之漫長而艱辛的永途上，一部充滿着和平慈祥和寬大容忍與公平的中國史已是無可否認地走到了一部瀾漫着戰爭，征服，擴張，仇恨和迫害的西洋歷史的前頭了。

「和平」二字雖尚遠不及「太平」一語所內含的意義及其所指示的境界之崇高，博大與深澈，然亦已是人類社會和人類歷史上之一件極名貴的東西。它已多多少少地指示出世界歷史的總動向和人類社會的總歸宿的所在。但不幸，時至今日，她正像一個美麗嬌怯而不幸的處女一樣，屢屢地被一些國際強盜和民族敗類等妖物奸污着，曲解着。此間，我們所說的「和平」，自然是和平發展的「和平」，是不侵略反侵略的「和平」。不是「魯宋人」殺人放火」之「屠夫的和平」，更不是汪逆漢奸等「賣國求榮」之「奴隸的和平」。剛剛相反的，中國的歷史，可以說是一部在充分的自衛之下之和平發展的和平史。酷愛「和平」的中國農夫大家們，固不喜賦

侵犯或毀滅他人的家鄉和祖國，但他們卻更熱切地熱愛着他們自己的家鄉和祖國。大難來時，他們從來是英勇地捍衛着他們自己的家鄉和祖國，無情的消滅了他們的敵人。

第五講 中國之國之急進性與迂緩性

第一節 「中國之國」之急進與迂緩性

聽過了，或讀過了本書前行諸講的人士們，卽或是中國之外的異邦人士們，卽或是沒有時間，沒有準備，能夠聽完或讀完本講以下的幾講，已很可能使他們隨着本書前行諸講的研討和闡述而來到一個新境地；在這個新的境地中，被深切的理解了「中國」或「中國之國」。然亦很可能，在他們的中間會有人認爲我們太爲中國鼓吹，過分地誇大了中國人的歷史活動或政治活動，有意爲中國或東方近百年來的厄運出氣。若是真有人懷着這樣的感覺，自亦不是全無道理可言，也不是要求他們改變，他們就可以改變。關於這一點，我們卻不願再多說什麼，只有請他們能夠繼續的聽下或讀下。

是的，在本講之前的前行諸講中，我們曾經鄭重地提出並客觀地討論了，因爲通過了中國之特殊的「地理環境的影響」，在中國所發生的「經濟關係」或經濟生活之不同於歐洲和近中東，以致「一部中國史是一部農夫活動史」，以致支配中國數千年歷史之一貫精神，不是狹隘的部族主義，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或帝國主義，而是寬大的世界主義，或「天下主義」或「王道精神」。在此等強烈的世界主義，或「天下主義」，或「王道精神」的指導之下，中國的歷史，或可說東方世界的歷史，是始終的趨向「合」而不趨向「分」；趨向「平」，而不趨向「不平」。因而「中國之國」不是一個褊狹的，排他的「民族國」，也不是一個征服鎮壓的「大帝國」，而是一個寬大容納的「天下」或「天下國」。因而中國人在「中國天下」或東方世界內所慣常追求之政治生活或政治境界，早已不是初級的「和平」，而是高級的「太平」。

一旦政治的太平境界出現了，（我們前已說過，政治的太平境界會屢屢地出現於中國歷史之上，）不但

「天下之內」或「普天之下」可以「不見甲兵」，「不開紛爭」，到處是「和平」。「和平」，「和平」；也不但是「天下之內」或「普天之下」可以「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獄空無人」，「刑措不用」，「王者垂拱於上，億民各樂其業」；而且「天下之內」或「溥天之下」每每是差能達到一個近乎「大同之世」的邦世，像禮運之所描寫：「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甚至會達到一個「民胞物與」，「仁及鳥獸」，和「仁及草木」之超政治的政治境界。能夠實現，或可說能夠產生這種政治境界或政治生活之政治機構或政治體系，自不是一個由國與國間之激烈的戰爭和熱辣的外交所構成之「國際」。而是一個不為戰爭所威脅，也不為外交所支配之「渾然一體」的「天下」。久處於這一個不為戰爭所威脅，外交所支配之「渾然一體」的「天下」之內的中國人，或可說一向出沒於「太平」境界之中的中國人，自然而然地，或久而久之，不但是會忘掉「鈞心鬥角」之外交技術，而且是鄙視攻伐侵襲的戰鬪生活。

一個無外交，無戰爭，甚至無軍隊，無警察的政治生活，如果施之於現世界現時代之任何的一個國家，固將是一個天大的荒唐與糊塗，然而這在古昔的中國，卻構成了「中國之國」或「中國天下」或「中國天下」之「天下生活」的真內容。在古昔的中國，惟有這一個無外交，無戰爭，甚至無軍隊無警察的政治機構和政治生活的建立，才有可能使「中國天下」或「中國天下國」類入於「太平」境界，並久留於「太平」境界。無外交，無戰爭，無軍隊無警察的「天下」或「天下國」，才與人類政治境界之高級的「太平」結了不解的姻緣：無「太平」不成其為「天下」；無「天下」也自然無從有「太平」。許多人不明白這一基本要點，不了解古今中外歷史時空的不侗，反而自作聰明地對中國過去之無外交，以及中國人之一向的「非戰」與「非兵」，痛加譏評。不是說中國人沒有外交天才，不長於辦外交，乃是一件可恥的事情，便是更痛切地以秦為界碑，把秦以前的中國劃為「有兵文化」的時代，秦以後的中國，劃為「無兵文化」的時代。秦以後的中國之「無兵」，他們不知道是因為這一個「渾然一體」的「中國天下」或「中國天下國」之「不需要兵」，而認為是中

國人之「不肯當兵」，是中華民族的「墮落」。這真是大笑話。我們知道，久處於「天下之內」，或出入於「太平境界」之中的人們，不僅是會忘掉了外交，忘掉了戰爭，亦無從泛起國家觀念，民族意識。無國家觀念民族意識的人民，在政治上所重視所珍貴的東西，只是「家族制度」，「天下體系」，以及「家族制度」與「天下體系」的協調和聯繫。惟其如此，不同的人羣才能夠走向接近，龐雜的種族才能夠趨於大同。「中國之國」之所以稱「天下」，「享」太平者正在此。只須使用「天下」和「太平」二語來闡述「中國之國」的意義和價值，已可十足地說明了「中國天下國」的急進性或進步性。

我們絕無意借本書來鼓吹中國或「中國之國」的國格之偉大，給予中國歷史以誇大的渲染，但是待我們詳細地根據着客觀存在中的史實的研究，大胆地突破了世人之傳說的誤解，揭開了所謂「中國之謎」，而另將中國或「中國之國」真面目真性情向世界介紹之時，倒難免有使世人殊感陌生之感，由於他們彼此間的陌生，自無怪或會有人懷疑到介紹人之不無有意誇大。但請聽者或讀者注意，即或這是誇大了，當講者誇述「中國之國」的急進性或進步性的時候，他卻從未忘記要得暇一述「中國之國」，或「中國天下」，或「中國天下國」之急進性的反面的迂緩性或散漫性。自然，在我們安詳地講過了「中國之國」的急進性之後，我們才有可能，也才有時間，來闡述「中國之國」的迂緩性或散漫性。

講到「中國之國」的迂緩性或散漫性，會使得不少的人為之愾然若失，或噤口無言。如果是說到極端，會使得中國的敵人對她發生猙獰之快意的兇笑，會使得中國的隣人對她作種種鄙視之態；會使得「中國之友」為中國的國運擔心不已，捏着一把冷汗；會使得漢奸敗類們叛背祖國，向敵人屈膝；也會使得愛國憂國的志士們為之痛心啼血，自己怨憤自己。待到中國的抗戰大業已出了他人意料之外並出我們自己意料之外地渡進了第七年代的今日，固然是中國和中國人民已與日俱增地接受到發自世界各角落之各色各樣的讚頌，各色各樣之莫明其妙的讚頌。但大家不應健忘，想還記得，直至抗日戰爭暴發的前夕，西洋的人士們，甚至我們自己，不是還未完全休止痛罵中國和中國人是「病夫」，是「愚昧」，是「散沙」，是「腐敗」，是「落後」，是「混

「亂」，以及「不進步」，「死保守」的責罵嗎？我們的惡隣，我們的大敵，不是胆敢向世界宣稱，我們「中國還不是一個國家」嗎？

不錯，如果一個民族故意地或有計劃地「重文輕武」，以體力壯健爲粗野，以「弱不勝衣」爲風雅，甚至以「手無縛雞之力」爲美觀，個個養着長可數寸的長指甲，應當稱之爲「病夫」的話，我們承認，我們在最近之過去是「病夫」。如果一個民族過分的愛和平，反戰爭，遇事力主「息事寧人」，不但是不去侵略他人，而且忽視了自己的安全，自己的邊境，甚至連自己的國疆都沒有弄清楚，應當稱之爲「愚昧」的話，我們承認，我們在最近之過去是「愚昧」。如果一個民族重家族而輕個人，賤「國家」而貴「天下」，既無民族意識，又乏國家觀念，應當稱之爲「散沙」的話，我們承認，我們在最近之過去是「散沙」。如果一個民族一味地崇古信古，不僅是一切的一切都要「遵古炮製」，而且厭惡新奇，反對新奇，應當稱之爲「保守」的話，我們承認，我們在最近之過去是「保守」。同時，如果一個無外交，無軍備，甚至無警察的國家，應當稱之爲「不是個國家」的話，我們也承認，我們在最近之過去「不是一個國家」。

站在今日之極端的國家主義的立場上，或狹隘的「民族國家」的觀點上，來審判這一個「中國之國」，或「中國天下」，或「中國天下國」，則我們不但會覺得，亦將會同意，我們這一個「中國之國」的本身不僅是一個極盡人間迂腐的政治組織，而且這個迂腐的政治組織所能給予和所已給予我們中國的政治生活與政治活動，只是迂緩與散漫。這種迂緩和散漫，會使得「中國之國」兩千年來無大進步，也是她近百年來遭受困頓的主因。

話雖如此，「中國之國」之所以爲「中國之國」，卻決不是如此的單簡。居於現世界之現時代，一反「民族國家」的立場和觀點，仍是固執地或單純地站在世界主義，或「天下主義」，或「王道精神」之上，來讚歌「中國之國」，或「中國天下」，或「中國天下國」之舊生活與舊機構，而忘記了「中國之國」之現世的新處境，固與中國無益，而且有害。俱着拋開了歷史的時間和空間不管，只是死硬地將「中國之國」，或「中國天

下」，或「中國天下國」放在今日之極端的國家主義的評判之下來審判，雖會討好或見快於中國的外敵和內奸，然終是不公平不科學的一偏之見。這一偏之見，不但是無助於中國的進步，而且是大大的加重了「中國之國」之現世處境的不幸和困難。若能離開兩極端的見地，客居於歷史時代的立場上或觀點上來觀看「中國之國」，則我們除掉要對而且應對她的急進性表示衷心的讚頌外，自亦無可逃避地不能不指出並批判她的迂緩性或散漫性。不過這裏有一點卻是我們萬萬不應忽略的，就是：「中國之國」，或「中國天下」，或「中國天下國」之所顯示的迂緩性或散漫性，卻正是來自她的急進性或進步性。

中國人既然是能夠建造起一個超外交超軍備，其大無外，自由寬大而放任的政治組織和政治生活，而安享高級的政治境界之「太平」，自可藉以反證中國人絕不是不能辦外交，不能作戰爭，不能創造與發明，而是中國人忘掉了外交，鄙視了戰爭，無羨於新奇或發明，而安於寬大，放任之中庸與和平。誰使中國人忘掉了外交，鄙視了戰爭，無羨於新奇或發明，而安於寬大放任之中庸與和平的呢？要是追究責任，實屬別無他人，除了中國人羣之「歷史人格」的「農夫型」外，就是「中國之國」，或「中國天下」，或「中國天下國」的急進性或進步性了。有了急進的「天下」，或「天下國」，才有廣泛深澈的「和平」與「太平」。然廣泛深澈的「和平」和「太平」，也就分外地加重了中國農夫之無邊際的和平，中庸與保守的習性。這種過分的和平，濃厚的中庸，以及強固的保守的習性，不僅使得中國人之於一切的一切，都要息事寧人，好辯而不好動，不為己甚，不走極端，而且使得中國人信古好古，厭惡新奇，並反對新奇。在息事寧人，好辯而不好動，不為己甚，不走極端，以及崇古好古，厭惡新奇和反對新奇的氣氛中，自然是要迂緩了中國社會發展的速率，而構成中國社會發展的迂緩性。同時，我們知道（前亦已曾一再申述），「中國之國」之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以及倫理的秩序的基礎，是建築在「天下政治」和「家族制度」的依存上。由於「天下政治」的建立，就肯定了國家生活（民族國家）的出現；由於「家族制度」的強固，也就大大地損害了團體精神和個人權力。在「九世同居」的「百忍堂上」，不知犧牲了多少個家庭成員們的個別的創造與開拓。所謂「各掃自己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

霜，」的諒解，不知殺傷了若干量的團結精神和社會生活。而「四海一家，中國一人，」的氣宇和胸懷，又不知淹沒了幾多斛的民族意識和國家觀念。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因而也就造成了中國國家和中國人民的散漫性，造成了中國國家和中國人民之驚人的散漫性。

講到這裏，我們或正可以極有趣地來建設起一個矛盾的辨證邏輯。這個矛盾的辨證，就是：由於「中國之國，或「中國天下」，或「中國天下國」的急進性才促成了「中國之國」，或「中國天下」，或「中國天下國」的偉大與和平；由於「中國之國」或「中國天下」，或「中國天下國」的偉大與和平，才促成了「中國之國，或「中國天下」，或「中國天下國」的寬鬆與笨重；而由於「中國之國」，或「中國天下」，或「中國天下國」的寬鬆和笨重，也就無言地於「中國之國」，或「中國天下」，或「中國天下國」的急進性中存在着她的迂緩性。

就大的原則來講，誰都了解這一個簡單明白的事理：一個巨大，寬鬆而笨重的物體運動起來，要比一個小巧玲瓏或短小精悍的物體來得迂緩。人類的政治組織和政治生活的管理和運用，也是一樣。一個巨大，寬鬆而笨重的「天下」，或「天下國」運動起來，一定是要比一個短小緊嚴而精悍的「民族國家」來得迂緩。當彼東西兩大世界彼此隔離的古昔時代，中國人躲在一個巨大而寬鬆的「天下」之內，只感到她的和平與寬大的舒適，而不覺她的笨重與不便。但待到東西兩大世界之猝然相遇，「中國天下」，或「中國天下國」之和西洋「民族國家」之羣在國際間猝然相遇而共處的時候，和平與寬大已不值錢，倒使人迅速感到並深深感到「中國之國」的笨重與不便，甚至於冥頑與不靈。惟其如此，這一個偉大而和平的「中國天下」，或「中國天下國」也就反而落在西洋「民族國家」之後了。正所謂一個時代的急進者，惟其太急進了，反而害得他漸次地或突然地落伍於時代之後了。

第二節 「中國天下國」之治理與儒法黃老

由於中國或「中國之國」是一個「國家」，又是一個「天下」，——是一個「天下國」，再加上這一個「天下國」的急進性與迂緩性之矛盾的統一，不但使得她於東西兩大世界猝然相遇之時大吃西方的虧，而且是遠在東西相遇之前，「中國之國」在東方世界獨處之時，已使得她在政治上和歷史上所表現的性極其特殊，也極其微妙複雜，不易把握。因而，也就一直地苦惱着古今來之千千百百的中國哲學家和政治家，以及近代之革新人物和革命志士，甚至侵略中國之帝國主義者。

我們知道，自從這一個超「部族」超「邦國」，反「帝國」的「天下」之被富有政治天才和組織能力的周人所發現所把握，得能伴隨着周王朝之建立而出現於東方世界之後，直到平王東遷，周室式微，歷史家所稱之東周時代的到來之前，橫陳在中國政治家和哲學家的面前的問題，只有一個，就是如何以周王畿和周天子作中心，來鞏固這一個「既成天下」，並如何地來治理這一個「既成天下」，最好說如何地來「平」這一個「既成天下」。但待東遷之後，周王室或周天子的權威趨於沒落了，而諸侯們的封建邦國日益強大，於是在這一個「既成天下」之內，也就因之出現了兩種不同甚至相反的政治傾向：一個是「既成天下」之「天下傾向」；另一個是強大諸侯們之「邦國傾向」。這兩種相反的政治傾向的呈現，與其說是當時之政治的或種族的矛盾，無寧說是當時之社會的矛盾。周王室之所以趨於沒落，諸侯邦國之所以日益強大，固不全由於中國社會在當時之急速發展，然周天子的沒落和諸侯邦國的強大卻在有力的反映着並加速着當時中國社會之急速發展。但在表面看，這兩種不同的政治傾向的出現，似只是一種政治的矛盾，或種族的矛盾。以致在當時，尤其是繼春秋之後的戰國時代之到來，橫陳在中國政治家和哲學家的面前的問題，似已分別地指示着相反的兩面。這相反的兩面，就是：「天下乎」？抑「邦國乎」？

有鑑於此，當時的哲學家和政治家們也就各因其所見的不同，聚頌紛紜地爭辯着，宣傳着，並實地試探着，如何能「治」「天下」，「平」「天下」之「道」，或如何能「富」「邦國」，「強」「邦國」之「術」。

創立儒家學派，並首先領導着門徒弟子們起而作實際政治活動的孔子，曾看到「中國之國」之「天下性」。他認為中國是一個「既成的天下」，是一個完美的或完整的「天下」；這一個「天下」就是一個自然的而且合理的政治秩序；絕不容任何人割裂，亦不容任何人毀壞。所以他大聲疾呼地高呼「尊王」，力主「正名」，並痛斥諸侯大夫的僭越。在他看，「王」是「天下」的權威之所在，「名」是「天下」的秩序之所繫。推其如此，他所擁護的，他所捍衛的「天下」，乃是一個「仍舊貫」的「天下」，一個寬鬆的「天下」；一個天子和諸侯、卿、士大夫裂土而分治的「封建天下」。他覺得，惟其寬鬆，惟其分治，才成其爲「天下」；古代的中國是一個寬鬆而分治的「天下」，當時的中國以及未來的中國亦應仍是一個寬鬆而分治的「天下」。換句話說，因爲古代的中國是一個「封建天下」，所以他主張當時的中國以及未來的中國仍應是一個「封建天下」。

但這種主張，這種號召，卻未曾把握着當時的歷史動向，自未能滿足當時之時代要求。一個相反的主張和號召也就因之應運而生。這一個相反的主張和號召的抬頭，就是法家學派的興起。

創立法家學派，並影響實際政治甚大的人物如申（申不害）韓（韓非）等人，以及先申韓而存在之實行家像齊之管仲，秦之商鞅，則剛剛和儒家相反。他們有見於「中國之國」之「國家性」，或「邦國性」，或「族國性」，而不見她的「天下性」。他們有鑑於周王室之沒落於上，周天子所建立的「天下秩序」已紊亂不堪，卽不認當時的中國是一個「既成天下」，而且也不相信未來的中國可能建設成功爲一個「渾然一體」的「天下政治」或「天下機構」，或「天下國」。同時，他們又有鑑於當時各邦國的卿大夫們之腐敗墮落，人民之水深火熱，亦不敢僭封建制度之仍應繼續存在。在他們，卻深深覺得，一個最理想的政治單位，或可能實現的政治單位，只是那邦土千里或數千里，甲車千乘或數千乘大小之新型的「邦國」，或「郡縣式」的「邦國」。只有強有力之集權式的諸侯或公室，透過了反封建體制之「郡縣制」，直接地並全面地控制了「邦國」之內之所有的土地和人民才有可能施行有效的土地改革，社會改革，兵制改革，而建立起一種緊嚴，進步，而且有效的「邦國機構」或「邦國政治」，促成「國富」而「兵強」的實現。至於「邦國」以外的問題，或可說「邦國」

與「邦國」之間的問題，他們似乎是根本沒有考慮到；就是偶爾考慮及之，也總是認為只有賴「戰爭」或「盟會」來解決。惟其如此，他們所注意的，只是「邦國」之「強」不「強」，而不是「天下」之「平」不「平」。也可以說，他們所注意的，只是「邦國」，而非「天下」。

法家雖一反儒家的主張和號召，而另來一套主張和號召，但他們卻同儒家一樣，也未嘗把握着當時的歷史動向；自亦未能滿足當時的時代要求。當時客觀存在中的時代要求，卻剛剛地越出了儒法兩家所能提供之個別的方案之外。

當時的時代要求是什麼呢？

當時的中國，不但是熱切地要求着一個比封建社會更進步的社會，而且堅定地堅持着，要將那一個「既成的中國天下」，或「寬鬆的中國天下」，或「封建的天下」，或「緊嚴的天下」，或「郡縣的天天下」。

這種無言的歷史動向，在春秋時代，甚至在戰國初期，似尚無人知道。待到戰國中期以後，它已漸次顯著，因而也才漸次地為極少數的哲人和政治家們所理解，所把握。也就有人開始迎上前去，採合了儒法兩家的觀念，主張和號召，向一個更緊嚴更進步之「新型天下」或「郡縣式天下」，或「渾然一體的天下或天下國」的建造的目標上邁進。因而也就為李斯、秦始皇諸人的偉大事業鋪下了一條可能成功的道路。一個「郡縣式的天下」，一個「渾然一體的天下國」，終於伴隨着半封建形式和半封建意識的瓦解而出現。如果我們不過於求全責備的話，論功行賞，這一個緊嚴而進步之「郡縣式天下」或「渾然一體的天下國」之能出現於中國，儒法兩家也都曾出力而有功；儒家供給於「中國之國」一個「天下」形式，法家又供給於「中國之國」一個「國家」內容。

秦以後的中國，可以說是以一身而具備雙重人格；他既是一個「國家」，又是一個「天下」。然而頑固的儒法卻總是不肯或總是不能正視這一事實。儒家有見於「中國之國」的「天下性」，但蔽於「中國之國」的

「天下性」。得機會，總是不惜從事於種種復古運動的努力，要將「中國之國」向古昔之寬鬆放任之封建時代回引。反之，法家呢，固有見於「中國之國」之「國家性」，但亦蔽於「中國之國」的「國家性」。一上台，總是以殘地一筆抹殺「中國之國」的「天下性」，把她當作是一個單純的「國家」或「邦國」看待，置諸於純法治的鐵腕之下來治理。結果，每每是勞而無功，坐使「中國之國」逸出了他們的可能治理之外。

由於彼此間之不放心於對方之能善良地治理這一個「天下」或這一個「國家」，並由於彼此之不能善良地治理這一個「天下」或這一個「國家」，而造成之「中國天下」或「中國天下國」的廢弛或紊亂，每每引起或加重儒法兩家在朝在野間之互相攻訐與明爭暗鬪。而在儒法兩家之朝野攻訐和明爭暗鬪的局面下，治理這一個「中國天下國」的大權，卻每每地溜入到另一宗派者——「黃老」——的手中。說也奇怪，待到「中國天下國」諸諸於「黃老」者的治理之下的時候，「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治平時代』」卻每每會隨之而出現。

一般大總統嚴重地誤解着黃老之學和黃老者，認為他們是「清靜無爲」，什麼事都不作的逸玄者。殊不知蔡煥於觀察力最敏銳，對宇宙，對人生，理解得最深刻，而決心最大的老子之黃老學派的黃老們，一方面固然是力注「無爲」，但是另一方面他們卻又在力主「無不爲」。在政治上反儒法的黃老，可以說是儒法兩家的真知己，他們曾經儘可能地利用了儒家和法家。表面上，他們既不認中國是一個「天下」，也不認中國是一個「國家」。但是骨子裏，他們卻機敏地識破，「中國之國」是一個「天下」，又是一個「國家」。因而，他們對於這一個「中國之國」，倒每每能堅定地把握着，並安詳地治理着；須要「平」，「天下」的時候，他們裝出比儒家還要徹底，還要放任，還要寬大的寬大；反之，須要「治」，「國家」的時候，則他們又露出比法家更徹底，更苛酷，更毒辣的毒辣。更迭爲用，神乎其術。他們倒每每能不動聲色地「平」了「中國之國」的「天下」，又「治」了「中國之國」的「國家」。

但是真的黃老不常有，這一個「中國之國」或「中國天下」，或「中國天下國」的治理卻往往落在廷磨的腐儒或死硬派的法者之手。結果，此等不良的治理，每每是加速地促進了「中國之國」的運行出於治者的治理

之外。自然，在此間所說的「促進」，也只是「促進」而已，「中國之國」之每每地運行於治者治理之外，自有他的原因在。

第三節 「中國之國」之歷史發展與所謂「一治一亂」的循環

「中國之國」，或「中國天下」，或「中國天下國」每每地運行於治者治理之外的顯著的跡象，就是近為近人所誇說之中國歷史上的「一治一亂」。

中國歷史上之有「一治一亂」的跡象，不是到近人才始發現，還在先秦時代。孔孟諸人即曾顯露的提及，甚至一再地提到。例如孔子常常地擊「天下有道」和「天下無道」相對比。孟子也曾指出：「五百年必有王者興」。這自是說明着，他們在那時已看到在中國的歷史上已經有着「一治一亂」的跡象。秦以後，中國歷史上之「一治一亂」的跡象更為顯著，亦更為具體。因而，也就會有機會會被中國的有心人把它機敏的認識，更機警地道破。凡是讀過羅貫中所著之「三國演義」一書的人們，當都會在該書之第一章第一頁第一行的開場白中，讀到如下之幾句使人怵目驚心的話，這幾句話就是：

「話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他所說的「合」，就是中國歷史上的「治」；他所說的「分」，也就是中國歷史上的「亂」。「天下大勢」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也正是所謂中國歷史上的「一治一亂」。

是的，周秦以來，「中國之國」，或「中國天下」，或「中國天下國」，雖是始終地存在着，而且擴大着；「中國之國」，或「中國天下」，或「中國天下國」的創造者和支持者之中華民族，雖是一脈相承的繁延着，而且增殖着；代表「中國之國」，或可說為中華民族之所獨具之「中國作風」，「中國氣派」的文化，雖是繼續着，開展着，而且充實着；但「中國之國」，或「中國天下」，或「中國天下國」的政治史的推演，卻並非平順無波，而是在「一治一亂」的波動中前進。這種「一治一亂」之具體表徵，就是掌握中國政權，治理「中

「國之國」，或「中國天下」，或「中國天下國」的王朝或政府，卻未曾一脈相承，萬世一系地存在着，繼續着。並沒有從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或秦始皇、秦二世、秦三世、一直地排下來，而是姬去嬴代，嬴去劉代，劉去曹代，楊去李代，李去趙代，川流不息地更替着不同的王朝或政府。新王朝之建立，每每是一個「治」的局面之開始；舊王朝的崩潰，每每是一個「亂」的局面的到來。

爲什麼「中國之國」的政治史要沿着「一治一亂」的波動前進的呢？若是按照傳統的說法，很爲簡單。「一治一亂」之類見於中國歷史，是由於王朝執政者治理「天下」之「善」和「不善」。「天下之治」，就是說當時的王朝或政府之善於治理，或有力治理；「天下之亂」，就是說當時的王朝或政府之不善於治理，或已無力於治理。由於舊王朝之已不善於治理，或已無力的治理，自然是要鬧得「天下大亂」。「天下大亂」的結果，不善於治理「天下」，或無力於治理「天下」的舊王朝或舊政府自不能不讓路於一個新王朝或新政府的到來。而由於新王朝或新政府之善於治理，或有力治理，也就結束了「天下之亂」，而另開一個「天下之治」的時代的到來。

爲什麼一個王朝，一個同一的王朝，在起初可以治理中國，到以後就漸漸不能夠治理了呢？舊日史家的回答仍是很簡單。一個王朝的興起，大多是由於「王者」或「聖哲」的出現，和「王道」「仁政」的施行。至少是，那一些開國皇帝，或盛世君主，大多是「起自民間」或「深知天下疾苦」以「澄清宇內」，「安平天下」爲己責的英雄，豪傑或天才，所以能使「天下治」。然久而久之，「聖王不作，王道不行，仁政滅熄」，而未世帝王率多習於安樂，或耽於酒色，政事不修，昏虐無道，而「天下」自然是要隨之「大亂」了。

這種說法，這種解釋，在過去自可以言之成理，故可能支配着千數百年來的國民史觀。但是時至今日，卻已不容我們仍是無條件的全盤接受，或不負責任的因襲舊說，不能不於此等解說之外進而探求其他之更真切更重要的因由。以王朝之健全或墮落來解釋「中國天下」之「治」與「亂」，固不能斥之爲全無理由的臆說，然而這只是理由中的一因或一面，而不是唯一的或全面的理由。我們知道，歷代末世的君主，固多是一些身心衰

病，平庸無能，或墮落荒唐之輩，然亦每有恭儉謙仁，或腐精圖治的人。中國歷史上之所以會頻頻地演做着「一治一亂」的史劇，自必另有其所以然的主因在。

什麼是它的主因呢？

要回答這項追問，自不是一件輕易的事情。但待我們回過頭去，重把我們所已講過的諛旨溫習溫習，能夠切實地把握了「中國，或「中國之國」，是一個「國家」，又是一個「天下」，——是一個「天下國」，」的認識的話，則我們卻將會自然有所會心的識破：中國歷史上之所以頻現「一治一亂」的主因，並無別的神祕，就只在「中國之國」是一個「天下」，是一個「天下國」之故。或可說就只在她是一個農業「天下」，是一個精耕制的農業「天下國」之故。

因為「中國之國」是一個「天下」，是一個「天下國」，所以她每能進入於「天下太平」之最高級的政治境界。一旦「天下太平」了，則不但遍「中國天下」的各角落可以達到社會安定，文物制度進步，人民生活改善的境地，而且在「遍天下之內」所有之農夫農婦的安居樂業中，人口的生殖率每會達到驚人的提高和猛進。人口生殖率之驚人的提高和猛進，再配上農業生產上之週期性的豐歉，每會漸次造成一種農業增產率不能和人口增殖率相應的現象。而「天下性」之「中國之國」或「精耕制的農業天下國」，既不能像古代的羅馬帝國或近世的殖民帝國一樣，可以加重殖民地的剝削作手段，來緩和本國的經濟危機，又無從以工商的活動為調濟，來拯救農業之窮，自只有任其自由發展。結果，嚴重的農業恐慌，經濟危機，和政治不安，也就因之而起。經濟的危機和政治的不安每會加重王朝的墮落和官吏的腐敗，也每會促成儒法之間的政治爭鬪，並加重儒者或法家治理中國的法術的紊亂。及其極也，愈治愈惡，終至「天下大亂」。於是一個天下性的農民暴動出現了。伴着天下性的農民暴動的出現，一個舊王朝也就隨之被推翻。而同時，每當中國「天下大亂」或「要亂」的時候，每等地給予了野蠻民族一個可能蠢動或入侵的機會；由於野蠻民族的入侵，每每是加速或加劇「中國天下」的「大亂」。但「大亂」的結果，人口銳減了，農荒過去了，經濟的和政治的問題已不復存在了，而農

夫真結之「天下願望」和「太平要求」乃再度抬頭。經由儒法之再度合婚，或彼此讓步，一個稍稍革新的舊秩序也就伴隨著新王朝之建立而再度地從漆黑一團之無秩序的紊亂中出現。通過黃老耆之休養生息，也就是又一度的「天下太平」時代之到來。

在過去，一般人之看待中國歷史之「一治一亂」，既只是把它當作爲王朝政治的良否的反映，「天下之亂」固不如「天下之治」，但是「天下之亂」，也正可以作爲人民之對於王朝的不良治理之有力抗議，藉着結束舊時代而另開新時代的功用。這自無所謂中國歷史之「循環」與「不循環」，和中國社會之「停滯」與「不停滯」。但待我們在今日來討論這項歷史公案的時候，卻不應，亦不能，再像古人之悠然。不能不首先地探研一番，中國政治史上之有「一治一亂」，是否是會經構成了「中國歷史的循環」？中國政治史上之有「一治一亂」，如果就是「中國歷史的循環」的話，它將大有礙於中國社會的前進與發展。

這一問題之所以於此時此地提出，似甚突然，而實非突然。要追查這一問題之所由起，自不能不說它是遠起於所謂「亞細亞社會的停滯性」一說的出現。

我們知道，自從馬克斯於區分社會經濟構成的前進的諸紀元的時候，提出了「亞細亞的生產方式」，並暗示着東方社會不無帶有「亞細亞的停滯性」之後，一般人又有鑑於中國社會之未能先於西洋社會或等於西洋社會之進入於資本主義社會，也就隨聲附和，並倍加渲染，大談而特談地大談其中國社會之「停滯性」。及其極也，日本帝國主義者也就喜出望外地大率利用這一點，對於所謂「中國社會之停滯性」廣作加油加鹽以及繪影繪聲的歪曲宣傳。到了中日大戰開啓之後，日本軍閥的代言人，像秋澤修三等人，一面裝着學者，甚至是國際學者的樣子，來講述「中國社會的構成」。另一方面卻不惜拿出比盜賊還卑惡的手段，利用一切所能運用的新術語，對於中國歷史加以曲解，他說：「中國社會的根本性格，是「停滯」的，是「循環」的，而且是「倒退」的；「中國社會的停滯性，是社會矛盾的循環，社會過剩之反覆的形式，是中國社會的根本性格」。

片面的，機械的，甚至最極端惡意地，把秦以後直至鴉片戰爭之前的中國社會史，甚至把從西周起直至鴉

片戰爭之前的中國社會史，看作爲「社會矛盾的循環」，或「歷史的循環」，不但是誤把中國的政治史變爲中國的社會史，而且是等於說秦以後的中國社會，甚至西周以來的中國社會，是始終一致地隨着中國政治局面的「一治一亂」的「朝代興替」兜圈子「停滯」不進，甚至「後退」。這當然是一個極盡惡意的曲解，全無根據的翻言，其荒謬，其幼稚，幾不值一辯。我們知道，就理論上講，任何的一個社會制度絕不會完全「停滯」不動。而就事實來看，誰敢說，亦誰能信，經過了春秋戰國之大改革或大革命的大時代，秦漢的社會仍是和西周的社會一樣？又誰敢說，亦誰能信，唐、宋、明、清、的社會會與秦漢的社會，甚至會與西周的社會無異？

所謂「中國社會的停滯」，或所謂「中國社會矛盾的循環」，除了帝國主義者之惡意的曲解外，自亦不無由於少數人對於中國歷史認識之過分的幼稚與無知。我們固不必特別的重視，但我們卻不妨借此機會來檢討中國社會之史的發展，究竟是採取了一個何種形式。

談到中國社會之史的發展，我們無容諱言，亦不必諱言，秦以後中國社會之史的發展，不及同時期之西洋社會之史的發展來得明確迅速和矯健。但這卻不是說，秦以後的中國社會是一直的「停滯」不進，只是說秦以後中國社會的發展，不是走着筆直的直線，而是繞着大的灣子，遵循着一個螺旋狀的軌道前進。惟其是它繞着大的灣子，遵循着螺旋狀的軌道前進，較之西洋社會之直順發展，自然是要來得遲緩或迂緩。有人誤「遲緩」或「迂緩」爲「停滯」，或正在此。

爲什麼秦以後中國社會之史的發展，要繞着大的灣子，遵循着螺旋狀的軌道而迂緩地前進呢？

要回答這項問題，倒卻很爲簡單。這不是爲了別的，仍是因爲秦以後的中國或「中國之國」，是一個「國家」，又是一個「天下」，是一個「天下國」，是一個自足自給的「天下國」，是一個急進而又保守的「天下國」之故。我們前已一再申言，因爲中國或「中國之國」是一個「天下」，是一個「天下國」的緣故，會大大的加重了並加濃了中國農夫之酷愛和平，喜歡中庸，以及好靜而不好動的根性。這種強固的濃厚的中庸性格與和平精神，每每地會使得廣大的中國農夫不歡迎任何之激烈的社會改革，甚至會出而作頑強的反抗。

中國歷史上之「一治一亂」之「天下大亂」固然是大都由於廣大的農民之起而發難。秦以後，所有之舊王朝的傾覆，除一二例外，也可說大都是爲農民暴動所推翻。但某一舊王朝之被推翻，卻不是說，某一舊社會之已隨之而同歸於盡。某一舊王朝之被推翻，或「天下」之一度「大亂」，卻反會增加農夫大衆們對於舊社會舊秩序的愛護與留戀。惟其如此，轟轟烈烈的農民暴動，原本是一種社會革命，很可能推翻一個舊社會，而另建一個新社會，但結果，卻每每是中道變質，或中道和緩。也惟其如此，中國歷史上之偉大的改革和革命，雖每爲農夫大衆所發動，但卻亦每每爲農夫大衆所破壞，所阻止，或所和緩。「天下大亂」之後，朝代興革之餘，削痕鱗鱗的舊社會，喪志失神的舊制度，卻每每爲農夫大衆所喜歡恢復。及其極也，由上而下之官辦的社會改革，甚至爲了農民本身的利益而實行之官辦的社會改革，及因而建立之新的社會秩序，亦每爲農夫大衆所反對。中國歷史上幾個著名的政治悲劇：如秦王朝之急劇傾覆，太平天國之終未能建立，以及王莽改制的失敗，王安石變法之不能成功，自是一些最具體最顯明的史例。

秦王朝之急劇傾覆，太平天國之未能建立，以及王莽改制的失敗，王安石變法之不能成功，固都各有其他的原因，不一定全由於或單由於它們之爲農夫大衆所不喜，並爲農夫大衆所反抗。但秦王朝之急劇傾覆，王莽改制的失敗，王安石變法之不能成功，以及太平天國之未能建立，卻在說明着，秦以後，幾次重大而劇烈的社會改革都未能完全成功；因而也就大大地迂緩了中國社會之躍進歷程。

但這卻不是說，中國社會從未有過改革和革命。剛剛相反的，我們曾一再地鄭重說過，「一部中國史是一部由內部的改革和革命而走向自我循序發展的歷史。」我們知道，執行大改革，或可說執行大革命的秦王朝，固然是建立未久，即猝然的傾覆了，但先秦的封建社會卻並未伴隨着秦王朝的傾覆而復活。同樣的，太平天國的革命雖未成功，但是太平天國事變之後的中國社會，已大大的和太平天國事變之前的中國社會不同。他如王莽的改制和王安石的變法雖都失敗了，然而爲王、王二人所分別摧毀之漢，宋舊社會的社會不平等束縛，亦絕未全盤恢復。每一度之大改革或大革命，雖都因農夫大衆的反對以及主持人之不了解「中國之國」之「天

「下性」和中國人民之「農夫型」而失敗，或未告成功，但每次的失敗卻絕不是全無收穫的撲空。除了秦王朝之外，它們雖未曾每次明確地給予中國社會一個劃時代的變革，但卻各能促使中國社會向前推進一步兩步或三步。也惟其如此，中國社會之史的發展，終仍能繞着大的灣子，沿着螺旋狀的軌道徐徐前進：雖甚迂緩，卻極穩健。

第六講 中國天下國與西洋民族國之相遇

第一節 「中國天下」與「西洋世界」的相遇

當「中國之國」，或「中國天下」，或「中國天下國」，正在繼續地孤處於「東方世界」或「中國天下」之內，仍舊度着她寬鬆，安閒而放任的日子，緩緩地前進的時候，陡然地一個氣質不同，生活不同，而作風大異的「西方世界」卻已無言地出現於「東方世界」或「中國天下」的門外。

遠在十六世紀之前，雖然說「中國天下」和「西方世界」之間並不是沒有交通，而「中國天下」和「西方世界」的相遇，或可說「中國天下」或「西方世界」之正式接觸，實在講起來，卻不過僅僅只是近三四百年的事情，甚至可以說，僅只是近百餘年間的事情。

如果在今日，我們仍是把東方和西方嚴格地分為兩個獨立的世界，自然是很不通。但我們若是把一百年前或者是三百年前的東方和西方合為一個世界，卻是更不通。一百年前或者是三百年前的西方是一個世界，是一個獨立的世界，一百年前或者是三百年前的東方更是一個世界，一個獨立的世界。我們若是從大處着眼，將東方的歷史和人類世界的歷史對照來讀，則我們將曾認識，一百年前或者是三百年前的中國史或東方史，是「中國天下國」開發着耕耘着「中國天下」和東方世界的歷史，是「中國天下國」改革着充實着「中國天下」並提攜着，教育着，保衛着東方世界的歷史，也是我們東方世界和平發展自足自給獨自過活的歷史。

這期間，這一個極其長久的期間，中國雖然是與外族久有關係，與許許多多的外族久有關係，但是這種關係，一直是縱的關係，而不是橫的關係，是「上國」與「屬邦」的關係，（自然，這只是禮儀上道義上或文化上的「上國」與「屬邦」的關係，只是聘問慶吊上的「上國」與「屬邦」的關係，不是行政上的上國與屬邦的

關係，更不是經濟榨取上的上國與屬邦的關係，)而不是分庭抗禮或彼此對立的國際關係。她雖屢屢地接待着藩屬來朝來貢的使臣，但她卻從未和任何國家交換過公使或大使。她從未過過國際生活，更不知國際政治爲何物。凡是尚未渾化於「中國天下」之內的外族，不願和中國來往，中國決不勉強。她們如來，就必須(每每是自願)尊中國爲「上國」，而以向化者自居。除此以外，則中國卻極其寬大慷慨之至。只要她們送上一些珍禽異獸或玳瑁象牙一類的土產，就可換得中國天子大量之金銀絹帛的厚賜，而來貢使者又每可順道地兼營一遭貿易，滿載而歸。惟其如此，外國的貢聘往往自動地打破規定，規定三年一貢或一年一貢的貢聘，她們卻每年來貢或一歲數聘。

而最近三百年來，或一百年來的中國史或東方史，卻是「中國天下國」走出了「中國天下」或東方世界之外，或可說就在東方世界的門口和西方世界之新興的「民族國家」或「民族國家」之羣相遇而相處的歷史了。這一個東西世界的相遇，就西方世界講，已不無相當的醞釀和準備，不能說是出之於偶然，但就中國方面說，卻是毫無企求，毫無準備，不能說不是全然來之於偶然。這一幕既屬偶然又非偶然之東西世界的相遇，一方面有着歷史的和世界的意義，另一方面卻有戲劇的意味，爲近百年來東西世界所合演之悲喜劇之所由發生的根源。

東西的相遇，或中西的相遇，或可說中西的接觸，既然是在中國之全無準備，一切漠然之下出現，在其初，她——中國——自會，亦自易，因襲着她一向的舊習慣，對於西洋國家之叩關，持着既不歡迎，亦不拒絕之漠然態度，或無可無不可的見地。遇到事情，或偶有交涉，中國自然仍以傳統的自尊心看自己，並以傳統的自信心對西洋。或可說中國自仍以「天朝」或「上」自居，並以自願向化的人民看待西洋。她無意從西洋得到些什麼，或學得些什麼，因爲她認爲她不會從西洋得到些什麼，或學得些什麼。因而，對於西洋的所有和西洋的所能就不大重視，亦不願多知。但這不大重視和不願多知，卻只是不大重視和不願多知的漠然處之而已，卻並非像西洋人所渲染，也不像我們在今日所想像，中國在和西洋相見之初，一開首就是如何的頑固和排外。

我們知道，代表「西方世界」和「中國天下」之間的直接航線的開辟，是在十六世紀之初，佛郎哥（葡萄牙）的航海家和商船之到達中國澳門。中國一向是一個重農賤商的國家，她一向是鄙視商人的（不管他們是中國的臣民，或者是蠻邦之人），但對於這一個「不潔之客」的遠臨，倒很寬大，亦極客氣。否則，自不會把她自己的一塊國土（澳門）無條件地借給於一個素昧平生的異國商隊贖貨。自然，這裏邊或不無含蓄表示「天朝」的寬大，施恩於「遠人」，准許他們來到中土經商作買賣，藉以綏懷「萬方」之意。

不過這期間，彼此的交接，只不過是偶或在中國西南海疆數地舉行一些零星的小貿易品的交易，實還談不上什麼「中國天下」和「西方世界」的相遇，或什麼中土文化的接觸。中西文化的接觸，要到一五八〇年（明萬曆八年）羅明堅（Michel Ruggieri），利瑪竇（Mathes Ricci）等人到了中國之時。伴隨着羅利等人之進入中國而進入中國的西洋文化，是天主教和天文、算學等學術。除了天主教的教義之未能協調於中國的儒教，尤其和中國的尊祖精神相衝突，爲一般士大夫所反對外，而於純科學之天文學和數學，卻是很虛心的接受。

反之，在中西相遇的前夕或更前，西洋人對於中國所持的態度，卻遠不像中國人之對於西洋的冷漠。剛剛相反的，可以說是熱切極了。我們固不必過於認真地來誇說，由於中國養蠶術，造紙術與火藥，羅盤等物之傳入西方，以及中國茶、絲、錦、絹諸貨之偶一出現於歐洲市場，曾經如何地引起西洋人對於中國之景慕，甚至如何地引起西洋人之對於中國懷着帶小說風味的嚮往，然自經過馬哥波羅遊記的介紹和渲染，西洋的人士們，尤其是西洋的水手們，大都在夢想看一個幸運日子到來，船夠足踏這一個「遍地黃金」或「遍地絲綢」之遠處的東方之國。

且地理大發現的時代來了。繼新大陸的發現而東來遠東的航路開闢了。繞過南非，跨過印度，而居然來到中國了。西洋人的歡快和興奮是不必再說了。

西洋人的興奮和欣悅，固在他們之已獲得實現了他們久所癡想之夢，到達了他們所夢想到淨之國，而征服美洲，劫掠非洲，以及僑佔印度所給予他們之可以暴發橫財的舊經驗，舊事例，自亦是其中的要因。他們滿以

爲一個暴發橫財的機會又到了；一到，就可動手。但當他們和中國一度接觸之後，倒使得他們爲之暗中吃驚不已。在他們的面前或船前忽然出現的這一個東方之國，或「黃金之國」，或「彩絲之國」，固然有的是黃金和白銀，有的是彩綉和香茶，但他卻既不像那既繁文化又無政治的印第安人之國，或尼哥柔人之鄉，也不像那僅有文化而政治極其紊亂的印度人之邦。「中國之國」之疆域恢廓，「中國之國」之高度統一，「中國之國」之太平雍容，中國皇帝之無上尊嚴，中國士大夫之風流儒雅，以及中國式之宮殿城關的巍巍壯麗，中國風之典章制度或服飾飲食之自成體系，早已使得初到中國國門的西洋水手們和商人們爲之惶惑不已了。他們深深覺得，這一個東方之國，「黃金之國」，或「彩綉之國」，雖多黃金和白銀，錦綉和香茶，而其安全和平尊嚴，卻是不可輕言侵犯的，不敢隨便放肆。所以遠邇於「中國天下」的大門之外者百餘年，總是謹慎將事，小心觀察，不敢貿然有所衝撞。

這期間，他們所希求於中國的，仍不過是中國西南疆沿海一帶幾個城市的一些零星的小貿易。在中國，也認爲是無關輕重，無傷大雅，甚至樂得有少數藍眼金髮的洋商們在海疆邊陲熱鬧。而況且他們還多少地偶爾帶來一些天文，數學一類的「技藝」，或洋槍大礮一類的「奇玩」。惟其如此，中西之間倒也相安無事。這期間，爲了繼佛郎機人之後而來之所謂「紅毛番」的和蘭人（即荷蘭人）之在臺灣，呂宋以及澎湖列島一帶之強求「互市」，以及當時中國疆吏謂之在該區域剿緝海盜或靖掃海疆，駐紮在漳州、泉州等地的明朝的官員們與會和相關的商賈小有衝突，也只不過是一些極小的地方事件而已。

第三節 中西戰爭與「中國之國」之戰敗

若是中西之間仍是一直地在中國國門的門傍或門口執行一些小貿易品的小貿易，或小規模的「互市」，中西之間，自然是仍可繼續的相安無事。再設若緊繼前行少量的天文學和數學的輸入，而能另有其他學術思想的輸入，或較有系統與較大規模的輸入，則中西之間（雖然是存在着極大的歧異）的感情亦或會較易與較快地進

向接近。然而不幸，繼西洋少量或片段的天文學和數學而來的，或可說以驚人的速度和駭人的數量迎潮壓海而來的，卻不是西洋的哲學、文學、和藝術（像漢唐時代中印之間的接觸一樣），而是為中國素所鄙視的商人或商船。尤其不幸的，不是英國的民主政治，代議制度，自由思想和工業革命，而是為中國人所最感頭痛的鴉片商人和鴉片商船。

惟其如此，也就逐漸的，或可說也就很快的，惹起了中國朝野對於西洋的鄙視和仇視，認為所有的西洋人都是惟利是圖的商人，甚至都是惟利是圖而且有意禍害中國之鴉片商人。因而，日甚一日地加強着他們自己的保守傾向或所謂「閉關主義」。自然，清政府以異族入主中國之故，在對內對外的政策上嚴取守勢的態度，於有意無意間，自更加重了這種保守傾向或所謂「閉關主義」。

但西洋的商人和商船，尤其是英國的鴉片商人和商船，卻並不因中國朝野對他們的鄙視和仇視以及中國政府的保守傾向的加重而不來。相反的，他們卻與日俱增地擴大規模並加快速率而來。

我們知道，當英國商人來到中國作鴉片買賣的時候，已是英國在西洋戰敗了西班牙、葡萄牙，以及荷蘭、法國等海上諸先進之後，儼然地已是「海上之女王」。這時候，英國已進入了一個擴大海外貿易，並進而壟斷海外貿易的新時代。在當時之英國政府和人民以及一般的經濟學家們的心目中，都以為對外貿易的擴大乃是促使國家富強的唯一手段。他們以為：「國王的收入繫於對外貿易，帝國的榮譽繫於對外貿易，商人的事業繫於對外貿易，文藝的發展繫於對外貿易，貧民的給養繫於對外貿易，土地的改良繫於對外貿易，海軍的維持繫於對外貿易，帝國的國防繫於對外貿易，金融的手段繫於對外貿易，作戰的勝利繫於對外貿易，對敵的威脅繫於對外貿易」。惟其如此，她——大英帝國——有求於世界各處：願意從世界各處得到些什麼；賣出些什麼，或買進些什麼；如有可能，再佔領些什麼，或掠奪些什麼。惟其如此，她對於歐洲的貿易有興趣，對於美洲的貿易更有興趣，對於非洲的貿易有興趣，對於東方，對於中國的貿易更有興趣。老於世界商情的英國人，早已銳眼看到，遠居於東方的中國是一個極有貿易前途的海外貿易區。她自不肯隨便放棄或收縮這一個已經開始對華實

易。而同時，這時候，英國的工業革命已經開始，過去的手工業都已漸次地變為機械製造，大量生產，海外市場的開闢，在英國的國計民生上，一天比一天地來得重要。這一捆樁有前途的中國市場，她不肯輕易放棄或收縮，且勢必盡可能地求其擴大並深入。也惟其如此，英國的鴉片商人和商船不僅是不因中國朝貢之都親和仇視以及中國政府的保守而不來，反而有組織有計劃地從其南亞殖民地，也就是鴉片出產地之印度，擴大並加速而來。

英國之向中國傾銷鴉片，在其初，或只爲利之所在，在牟利而已，並沒有禍害中國之意，亦或祇向中國之歐教文化以及禮俗儀節挑戰的心。但當彼中英或中西開始交往之初，或可說當中英或中西剛嘗試通商之初，英國不向中國出售其他的正常貨物，而偏要傾銷鴉片，不但不能緩和了中英或中西相遇之時中西間之歧異文化，以及禮俗儀節上的歧異，反而分外地加重了並擴大了此等的歧異，因而也就加速地促進着中西衝突的爆發。而英國或西方之既已叩了中國之關，欲入中國之市，或中國之室，又復堅守彼此的歧異，不肯遷從並尊重中國的禮俗儀節，和其在東方久居之傳統地位，也自然是更加注定了中英兩國之間，或可說向中國天下與西方世界之間之終必一戰的命運。

中國的傳統，固然是不喜歡商人和商業，不高與同他人講生易敵買賣，但如果當時英國來到中國所作的生易或買賣不是鴉片，而是其他正常的貨物，西洋風味的日用必需品，甚至是西洋風味的奢侈品，（這類的貨物，不是說完全沒有，但較之鴉片輸入數量的驚人，實已渺不足道了，）久而久之，也未始不能動中國人以有易無易之心，開中英間或中西間正常的通商之路。很可能經由中英間正常的通商關係，爲日後中西之間之政治的，文化的，思想的和觀念的相見和相交，準備下一個有利的準備時間，或學習階梯。而同時（或可說遲一步的諸事），即使英國同中國交易之初，英國向中國售賣鴉片，如果英國的臣民能夠遵從中國禮俗儀節行事，則亦仍可減少中國的不快和厭惡，遇事自仍可以傳統的寬大態度出之。至少是乾隆嘉慶兩朝間，英國兩次派遺使者到北京去洽辦之通商和減禁的交涉，不會全無結果。中英間的和平交涉之門，自不會永拒不開。

然，這兩次北京洽商的失敗，清政府的無知和虛弱，亦應負相當的責任。若是中英之間的和平交涉之門開闢了，則近百年來的中國史，東方史，甚至世界史，決不會是今日的這個樣子。但不幸，事實的巧遇和發展，剛是適得其反。

由於正常的貿易關係之不能建立，或可說由於初步諒解之未能實現，自然是日甚一日地加深着中國朝野之對於英國鴉片商人和商船之來華的厭惡與恐懼（甚至於波及到其他之普通商人和商船），也自然是要日甚一日地加深着對於洋商的限制，力求對外貿易的收縮或斷絕。而適當其時，清王朝的王朝政治已開始向着下坡走，所謂中國歷史上之「一治一亂」的「天下大亂」或「天下將亂」已是又一度地的來臨之時，以後清政府的對內對外政策已日趨紊亂，反映到所加於洋商的限制，也極其失常。相反的，由於海上帝國之正如朝日方昇，由於殖民浪潮之方興未艾，由於對華貿易之特別有利，尤其是對華鴉片貿易之特別有利，在英國自然是要力求其能繼續並擴大。而在對華貿易日益擴大的途中，自然是深深感到，中國政府所加於通商上的限制對英國的商業發展最為不利，日思有以打破之道。在其初，自然是竭力的找尋和平交涉之門。

在和平交涉中，英國政府或不無有意要儘可能的遷就中國的禮俗儀節，但在實際行動上，她所採取的步調，形式和精神，卻仍是百分之百的西洋型，與中國的傳統和習慣格格不入。在英國，自難免要以平等國家的地位和中國相見，然終因中國之對於西方世界之過分陌生，以及英國使者之未能妥善的介紹英國之世界地位，說服中國，終致招到中國朝野之極大反感。在一向從來辦過這類類交的中國政府和士大夫們看起來，英國之自大，實不下於英國人之硬要向中國兜售鴉片之荒謬。甚至硬向中國兜售鴉片尚不可忍，不守「天朝」的禮俗儀節，不跪拜「天朝」的「天子」的失禮，卻絕不可忍。拒絕一切的要求，禁止他們前來作買賣，自是天經地義的專情。反之，由於和平交涉之未能和中國獲得更進一步的接近和瞭解，以及一切要求的失敗，在英國自亦深深覺得，中國政治文化的特殊，禮俗生活，甚至思想的奇特。並深深覺得中國人不懂得「外交」，不了解「國際」，無「外交」可言，亦無從對她辦「外交」。似只有先以實力改變中國的思想 and 觀念，甚至她的禮俗和生

活，然後才能開中國的外交之門，或通商之路。因而，就漸次地泛趨向中國之政教禮俗以及中國人的思想和觀念挑戰之意。而同時，她同中國幾次辦理交涉的交涉本身雖是失敗了，但幾次的深入中國，卻漸次地窺悉中國國家軍備的廢弛，總等於無軍備，無國防，因而，也就漸次地踏上對中國討戰之路。再反之，由於鴉片貿易之繼續擴大，由於鴉片流入之爲害日烈，尤其是由於「英夷」之「自大無理」或「無理取鬧」，清政府的態度和士大夫的輿論，也同樣地傾向於戰爭，向「撻伐」或「剿夷」的戰爭之道上走。或可說對於英國或西洋的挑戰，也漸持應戰的態度。

中英雙方，或可說中西雙方，既都向戰爭的路上走，自然是「求戰得戰」，終於道光二十年（也就是西歷一千八百四十年），爆發了近世世界歷史上之最有名的鴉片戰爭，或中英戰爭，或中西戰爭。

這個戰爭，中國人，以及其他國家的人，都稱它爲鴉片戰爭。中國人和其他國家的人自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稱這個戰爭爲鴉片戰爭，因爲這個戰爭的起因，照通常的眼光看，完全是由於鴉片貿易；是由於英國人硬要向中國傾銷鴉片，而中國起而加以嚴厲制止之故。但英國人卻稱它爲「通商戰爭」，而不稱它爲鴉片戰爭。英國人之不稱這個戰爭爲鴉片戰爭，固在認爲鴉片貿易乃是一種不名譽的貿易，因鴉片貿易而起的戰爭稱之爲鴉片戰爭，太不好聽，亦太不榮譽。然他們之稱它爲「通商戰爭」，也不是全無理由。在當時的英國人看，或不無以爲貿易就是貿易，不管它是鴉片，或者是其他的物品。世世代代生存於非洲大陸的萬千黑人，還可以活提生擒，作爲牲畜一類的貿易品向美洲大批輸入，難道鴉片就不能夠嗎？總之，他們的注意點在通商，在擴張貿易，而中國之限制通商，阻礙英國之擴張貿易，就是頑固不通之至，亦即「排外」之極；打擊中國的頑固和「排外」，解除了通商的障礙的戰爭，自然就是「通商戰爭」了。這種見解之是否正確，自屬另一問題，然亦可多多少少地說明着中英之間或中西之間的觀念的不同。

其實呢，這次戰爭，稱它爲鴉片戰爭也好，稱它爲「通商戰爭」也好，而鴉片戰爭或「通商戰爭」的稱號卻絕不能夠概括這個戰爭所含之全面的意義。除掉鴉片戰爭和「通商戰爭」之外，實乃中英之間，或中西之

間，最好說實乃「中國農夫」和「西洋水手」之間，之不同形態，不同作風，不同情調的政治之戰，經濟之戰，文化之戰，觀念之戰，思想之戰，以及生活禮俗之戰，是「中國天下」與「西方世界」之戰。如僅就軍事之觀點來看，這個戰爭的規模既不巨大，而戰鬥的行進又不激烈，是否就能夠稱得起是一個大的戰爭，實不無問題。但若就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觀念的，思想的，以及生活禮俗的觀點來看，則這個戰爭，乃是近世世界史上唯一無二的大戰爭。

但戰爭的結果，是中國戰敗了，英國戰勝了。或可說是東方戰敗了，西方戰勝了。

中國的戰敗，英國的戰勝，或可說東方的戰敗，西方的戰勝，在當時之中國的士大夫們看，固然認為是一樁奇恥大辱，然而卻並未把它看得過分的嚴重。只不過把它當作歷史上中國之曾經偶爾的戰敗於匈奴，突厥，或契丹，女真的往事一樣看待。萬沒想到，由這一敗而出現的江寧條約（不平等條約的老祖先），已在經濟上，政治上，甚至文化上，給中國加上了一面全副的鎖枷鐐，押解着一個四萬萬人的中國走進了一個充滿着壓榨和迫害的國際。當中國開始營過國際生活，和西洋世界正式往還的時候，他已成了一個半自由，甚至無自由的囚人。這不但迫使中國之政治的和經濟的地位在國際間退居於半殖民地或次殖民地之極不利的地位，自欲不暇，更無從為東方，為世界，為人類的福利說話或致力，而且在文化上，觀念上，思想上，以及禮俗生活上，也為中國開了一個千古未有的變局，坐使中國後復徘徊並亂動於無色的黑暗之中者正百年。

第三節 「中國之國」之何以戰敗

這一個千古未有的變局，百年長期的困頓，所給予中國的歷史，東方的歷史，甚至世界的歷史的影響太大了。百年來自視這個變局或身受這種災害的人，自會要特別的重視這個戰爭，更特別的重視這個戰敗。也自然然而地，他們要追問中國何以會戰敗？中國之所以戰敗的原因何在？

中國在這次戰爭中所以吃敗仗的原因，論者固然是持論不一，但歸納近人的意見，於清政府之昏聩糊塗，

劣於野應之臨陣的人事因繁外，大都以其主要的原由是出於我們中國國家在當時還不如西洋諸國之富強與開明，我們中國人民亦遠不及西洋人之勇武和愛國。不惟我們中國的國家組織，政治機構，不如西洋列強的國家組織政治機構之緊嚴生動而有力，就是我們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國家觀念，團結精神，以及愛國心，亦遠不及西洋人。不惟我們沒有國際知識，不善於同西洋人辦外交，而且我們無國防，無軍備，根本不能同西洋人作戰爭。甚至可以說，我們中國的一切，都不如西洋。

爲什麼？這究竟是什麼？

嚴格的問起來，直至最近之最近，迄未有人能提出什麼明確的答覆，只是極含混的提出一些『姑妄言之』之『偏之見』。有不少的人認爲，這是因爲了中國國家一向是一個『專制國家』，而中國人民久受儒家思想的束縛和禮教的壓迫之故。也有不少的人認爲，這是因爲了中國沒有『民主』，沒有『科學』之故。還有不少的人（正是我們在本書中所一再駁斥之人），更直捷了當認爲中國人根本是『一盤散沙』，因而也就同意了『二外人的說法』，認爲『中國的文化乃是一種非政治的文化』。中國人的政治天才，組織能力，不但是根本的不及西洋人，而且低得多。當中國和西洋相逼而相戰的時候，或可說當中國和英國相逼而相戰的時候，人家已是世界上的第一等強國，老實不客氣的講，我們『中國還不是一個國家，還沒有一個國家』。

這些人，尤其是後者，所犯之不可挽救的病症（正是我們在本書第一講中所鄭重指出的重病），就在於他們根本不認識不了解『中國之國』。他們誤把近世世界史上之『中國之國』之和西洋國家（西洋近代政治產物之民族國家）的相遇和相戰，當作是一種同類型同範疇的『國家』的相遇和相戰。只因爲彼強我弱；或可說只因爲彼爲『民主』，我爲『專制』，彼有『科學』，我無『科學』；或可說只因爲彼有民族意識，國家觀念，彼是民族強國，而我無民族意識，國家觀念，我是民族弱國，或我尚不是一個國家，所以結果是彼勝我敗了。這種說法，這種解釋，儘管至今還在支配着大多數人的見解，然爲求吾人對於這一巨大的世界事變之能獲達正確的認識，已不容不把它們加以無情的廓清。近世世界史上之『中國之國』之和西洋國家的相遇和相

戰，根本不是同類型同範疇的「國家」的相遇和相戰，而是異類型異範疇之「中國天下國」和「西洋民族國」的相遇和相戰。換句話說，近百年來，「中國之國」和西洋國家的相遇和相戰，乃是一個和平的，寬大的，利他的，保守的，放任的世界主義者，或「王道主義」者——一個自足的，自給的，從不向他人土地財貨，而以四海為家，天下為公的「天下國」——毫無準備毫無戒心地和「一羣鬪鬪的，褻狹的，自私的，進取的，國家主義者，或帝國主義者」——一羣貪婪的，掠奪的，以損人利己為能事，使戰爭成為生活的「民族國家」——的相遇，並被迫而相戰。這樣的一個相遇和相戰，也才是中國在當時所以戰敗的主因和要因，自然，在當時，加重「中國之國」的地位和處境之不利者，仍有下列數事之偶遇與巧合。當中國和西洋猝然相遇並被迫作戰的時候，西方世界已踏上了工業革命之途，那一些戰鬪的，褻狹的，自私的，進取的「民族國家」已是一些進入於鋼鐵化的「族國」，而中國，這一個和平的，寬大的，利他的，保守的世界主義者或「王道主義」者的「天下國」，卻仍在悠遊歲月，過着帆船馬車之中古式的舊生活。而同時，值此千載不遇的緊急關頭，清王朝的王朝政治卻正是江河日下的向着朝代末的末世走。這一個「天下將亂」的政治局情不知削弱了多少「中國天下國」對抗「西洋民族國家」的力量。

中國人不是先天的只能建設起一個寬大而放任之「天下政治」；或「天下國」，而不能建設起一種狹隘而緊嚴之「民族國家」。西洋人也不是先天的只能建設起一些狹隘而緊嚴之「民族國家」，而不能建設起一個寬大而放任之「天下政治」或「天下國」。同樣的，中國人不是命定的不能及時完成中國的工業革命，而要永遠地過着帆船馬車的舊生活。而西洋也不是命定的獨能及時完成或提前完成西洋的工業革命，而獨享銅、鐵、煤、電、油、的新生活。只因為經濟的，地理的和歷史的諸條件之不同，遂使得生活於不同世界之中的人羣們各自型鑄其各自不同的「歷史人格」，各自建造起一個或一些他們「各自以為適」的國家，並或早或晚地進入鋼、鐵、煤、電、油、的新時代。這情形，這道理，也正是我們在本書第二、第三等講內所一再闡釋的道理。經濟的，地理的和歷史的大陸性與海洋性，曾經決定了中國文化之「農夫型」和西洋文化之「水手

型」。

生長並生活於戰國倥傯的世界之中的西洋國家（民族國家），自然是要澈頭澈尾地形成爲貪饒的，掠奪的，戰國的，褊狹的，自私的，進取的，警覺的國性和國格。在相斃相戰之「國際生活」的需要中，她們不但是要能夠辦外交，更需能夠作戰爭。各個國家的人民既然是在國與國之鴻溝深險和壁壘森嚴下，不能夠離棄他們的本國而生活而存在，悠縱不教他們有民族意識和國家觀念，他們自會有民族意識和國家觀念；悠縱不教他們愛民族愛國家，他們也非愛不國。反之，如果生長並生活於一個「其大無外」之「渾然一體」的「天下」之中，或外無敵國獨立，內有統一傳統之和平安閒而放任的「天下」中之「中國之國」，自然是要澈頭澈尾地形成爲自足的，自給的，利他的，保守的，放任的國性或國格。在「定於一尊」和「四海一家」之「天下生活」的陶冶裏，她不但是不需要辦外交，亦無從辦外交；她不但是不需要習戰爭，亦無從習戰爭。隸屬於這一個「渾然一體」的「天下之內」的人民，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她生息於這一個「天下」的角落，可以「走遍天下」無人問，既不知怨讟的「民族國家」爲何物，自無所謂愛國和國家觀念，更無所謂愛國和不愛國了。同時，由於新海洋之新的誘惑，由於香料黃金之熱切的企求，由於地理之意外發現，由於殖民地之可能任意榨取，由於海外貿易之迅速擴大，由於財富之驚人積累，構成了種種重要的因素，直接間接地給予西洋世界的工業以巨大的刺激和有力的助力，自然是會促使使工業革命之能提前的高適時的出現於西洋世界。反之，由於生活資料之自足自給，由於生存空間之自由安閒，由於農夫之安土重遷，由於商人和商業之久被賤視，由於對外貿易之尙未展開，由於資金之未會積累，由於工業之尙缺乏巨大刺激，工業革命也就自然地要略遲一點地出現於中國天下，或可說「中國之國」或「中國天下國」自要略遲一刻的踏進於銅、鐵、煤、電、油、的新時代。

假設這兩種不同類型不同範疇的政治組織政治生活水遠的不相遇於一處，永遠的各不相干各不相犯地各自獨立存在於各自的世界，能有機會讓一位客觀的第三者站在「歷史的變動向與人類的總歸宿是應向而且要向

「渾然一體」的「合」處和「平」處走」的立場上或觀點上，來觀察這兩類不同性質不同功用的政治組織與政治生活的話，很可能，這位客觀的第三者會同情「中國之屬」的政治組織政治生活，謳歌「中國之國」的政治組織政治生活，敬重中國人的政治天才，驚嘆中國人的組織能力，並羨慕中國人的幸運。再假設，中國和西洋相遇的時候，西洋國家是一種和「中國之國」同類型同範疇的國家，同是奉行世界主義或「王道主義」的「天下國」，而彼此之間，互相地講「王道」，說「太平」，「交以道，接以禮」，說不定這兩個世界就有混化而為一，成功為一個更大的「天下」或「天下國」。至少是彼此之間，可以互惠而互利，相得益彰，或和平共處，相安無事，如中國之與印度，造出來數千年和善為隣的記錄。或反之，中國和西洋相遇的時候，「中國之國」是一個和西洋國家同類型同範疇的國家，也是一個在國家主義或帝國主義支配下的「族國」（民族國家），而彼此之間互相談外交，講戰爭，交以利，背以害，則以中國之大，人民之衆，以及主客地位的懸殊，誰敢說中國一定不會把西洋列強中之某幾個或某一個叩關者擊破，使得西洋世界震悸於中國的國威之下，反噬中國的虧，如太平洋戰爭剛剛爆發之後，日本之對於英、美、法、荷，一樣。再再假設，當中國和西洋相遇的時候，西洋世界亦尚未開始工業化，那一些「族國」亦仍是一望帆船馬車的「族國」；或者是東方世界也已在紅業革命之頃，「中國天下國」已是一個開始了機械化的「天下國」，至少的至少，「中國天下國」不會適逢其會地降彼朝代末的末世之「天下將亂」或「已亂」之時。則我們敢斷言，不但是中國不會在鴉片戰爭中戰敗，很可能就不會有鴉片戰爭。而近百年來的中國史，東方史，西洋史，長好說整個的人類世界史，自必要另呈一幅欣欣昌茂的景色。

然而不幸（是中國的不幸，是東方的不幸，亦是世界的不幸），事實的現實卻恰和我們的假設相違。這事實的現實卻恰和我們的假設相違，也就是問題的要害的所在：事殊不巧者，或可說事又太巧者，這兩種不同類型不同範疇的國家之邂逅的相遇。而且當她們邂逅相遇之時，一個是已迷醉於銅、鐵、煤、電、的新生活，另一個卻仍在逍遙於帆船馬車的舊時代；一個是新興的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正方興未艾，另一個卻適值她歷史波瀾

的低波，由於朝代末之末世的來臨，已瀕於「天下將亂」之際。

一向慣於過那爲外交和戰爭所交織之國際生活的西洋國家，一旦和一個偉大的東方大漢相遇了，自然也是不無有點震撼和驚訝，然她們在國際交接的舞廳上，卻還有慣常的軌道和積疊的常識可循。而一個早已忘掉了外交，忘掉了戰爭，向未過過國際生活，不知國際政治爲何物的「中國之國」，一旦偶步國門，和一羣驕悍的狡黠的新隣人突然相值，自然是要失之一切皆茫然。或可說當中國一本其恬淡知足的心境和態度，無求於國外，亦無知於國外，全無準備地身穿錦袍，足踏絲履，手執羽扇，或手提烏籠，坐着帆船馬車，或者是邁着方步在家園散步，或偶步國門的時候，卻兀突的，意外的，和一羣身著全副武裝，手執洋槍大砲，或手持國書通牒，坐着輪船火車以代步之老於國際生活之碧眼黃髮人相見了，自然是要失之於一切皆茫然。而王朝未治的昏曠，自更加重了這種茫然和混亂。不和人家接觸還好，一接觸，就顯得笨手笨腳；不同人家爭吵還好，一爭吵，就露出不是行家。「中國之國」，或「中國天下國」，本不是爲適應國族對立之國際生活而組織，而成立，一旦毫末修正，毫末補充地就拿出來以應付那爲熱辣外交和激烈戰爭所構成之國際生活，其在國際間之運動不靈，肆應失當，以致一時的吃虧受辱，吃敗仗，遭打擊，自是一個無可避免之不幸的結果，或應有的結果。

這個不幸的結果，或應有的結果，雖是一個極可惋惜的結果，但卻不是一個應該悲觀的結果。

站在自我批判的立場上來批判我們自己，不妨嚴苛一點，中國人爲適應由「其大無外」和「渾然一體」之和平而安閒的「天下」所生之「無爲而治」和「與民休息」的政治要求，而組織了一個寬鬆而放任的「天下政治」，「天下體系」，「天下帶機」，或「天下圖」，或不無失之於太寬鬆，太放任，不足以適應猝臨之變，或猝變的環境。這或者不能不說是中國人在政治建設上或國家建設上之一大疏忽？放大眼光或放遠視線來探討「中國之國」，在人類社會上，能有一個如此偉大之和平而統一的政治組織和政治生活的創造和保持，固未始不是一件極可珍貴的東西，也實是歐美的西洋民族國家之所望莫及的地方。但這是「中國之國」的長處和特

色，恐亦就是「中國之國」的頹廢弱點和危機。這一個偉大之和平而統一的政治組織和政治生活，雖然是在「中國天下」長期的和廣泛的和平與安閒，但曾經使得「中國天下」太保守，太安靜，不緊張，不生動，也曾經使得「中國天下」頹頹受到「一治一亂」的波動。然惟其如此，我們卻可藉以知悉，當東西兩世界相碰之時，陷中國於極大之不利者，不是因為中國人在人類之政治活動領域內走得太近，而不是因為離走得太遠；不是因為「中國還不是一个國家」，而是因為「中國之國」是一個是「族國」反「帝國」的「天下」或「天下國」。然亦惟其如此，則我們自不能武斷的斷定：環境變了，或說變之後，中國人是不會修正她自己之國家組織和國家生活，或改造她自己之國家組織和國家生活，以適應新的環境或新的需要。而同樣，我們自然是更不能輕妄的妄言：「中國還不是一个國家」，「中國人的政治才具是低能」，「中國的文化是一種非政治的文化」。

第七講 中國之國之現代化與三民主義新中國

第一節 「中國之國」之改革運動

經由本書前六講的研討和闡述，我們知道了我們這一個中國國家或「中國之國」是一個「國家」，又是一個「天下」，是一個超「族國」反「帝國」的「天下國」；我們知道了「帝國」、「族國」和「天下國」乃是古今來人類所營之政治組織和政治生活之三大類型；我們知道了「中國之國」之所以為「中國之國」；我們知道了中國歷史走到了西洋歷史的前頭；我們知道了「中國之國」之急進性與緩進性；我們知道了近百年來中西的相遇，乃是人類世界兩種不同類型不同範疇的政治組織和政治生活的相遇。自然，我們不會再像民初以來的人們一樣看到中國既不是又不像西洋國家（西洋近代政治產物的族國或民族國家），並看到中西或東西相遇之際，中國會一再地戰敗於西洋國家，就不加深思地強不同以為同，根本否定了東西相遇之前東西兩大世界所分別佔領的「歷史時空」，並全面抹殺了「中國之國」之形成和存在所賦之「中國天下」之「天下意識」或東方世界之世界意義，只是簡單地站在西洋民族國家的國家觀點上來審判中國：大罵中國人根本沒有民族意識，國家觀念，不會愛民族，愛國家；並大罵中國人的政治才能是低劣，「中國還不是一個國家，還沒有有一個國家」。但這卻並不是說，東西世界既已相遇之後，「中國之國」既已廢敗於西洋國家之後的今日，我們這一個「中國之國」可以仍然退回東方世界去，再把我們的大門關上，重溫我們安閒而放任的日子。也不是說，我們這一個「中國之國」仍應一成不變地作她過去時代或獨虎時代之「中國之國」。更不是說，中國人仍應沒有民族意識國家觀念，不必愛民族愛國家。

剛剛相反的，我們認為我們這一個「中國之國」不但是不經且不能退回到東方世界去，再把我們的大門關

上，而且是非適應時代的要求，積極地參加更廣大之世界政治，世界經濟與世界文化的活動不可。「中國之國」不但是不應再營造過軌船馬車手工製造的舊生活，並應立即走上並迅速完成鋼、鐵、煤、電、油之工業化。中國人不但是不應仍然沒有民族意識國家觀念，不愛民族與國家，而極應喚起強烈的民族意識國家觀念，愛民族，愛國家。但還卻又萬萬不是說，「中國之國」之改革和改造，或「中國之國」之工業化，或中國人之一旦有了民族意識國家觀念，即將會使得她從此一反其悠久的歷史傳統，一反其根深蒂固的民族性，或可說一反其構成「中國天下」並來自「中國天下」之寬大和平的世界主義或「天下主義」，或「王道精神」，而轉向於狹隘的侵略的國家主義或帝國主義。「中國之國」之改革或改造的成功，或「中國之國」之工業化的成功，或可說「中國之「抗戰建國」的成功，「中國之國」即將是一個為某些國人所模糊希冀之英美的國家，或為某一些英美人士們所模糊疑懼之德意式的國家，甚至是一個中古時代蒙古式之世界帝國的重演。

惟其如此，「中國之國」之改革或改造，或可說「中國之國」之改革或改造政策之確立，或改革改造運動之推行，極不做其他國家的簡單，也極不像其他國家之易行。因而，亦不易為吾人所了解，所掌握。到了現在，固然是一般人漸次理解，「中國之國」之須要改革和改造，應當更正確地視之為「中國之國」之須要「現代化」；「中國之國」之改革改造運動，應當更正確的叫做為「中國之國」之「現代化運動」；而同時，他們也漸次覺察，華民族之確已覺醒，或全面覺醒。但是待我們一提到中國之改革改造運動，或中國之「現代化運動」，以及中國之民族覺醒等問題的時候，不但會使我們憶起許許多多之苦痛的回憶，而且是直至最近之最近仍可聽到各色各樣的誤認和誤解。

有人認為，今人在今日所提出之中國國家之應走向「現代化」的「現代化運動」，也就是清末人所主張之「新政」，「洋務」，「變法維新」，民初以來一般新士大夫所倡導之效法西洋，和近人所高呼之「全盤西化」，或「中國本位」。雖彼此有說法上的不同或程度上的差異，其為促使中國國家之改革或改造則一。中國歷史上可泣可歌之忠臣義士的故事多的很，雖敢說中國人是一向的沒有民族意識和國家觀念。也有人剛剛相反的說，今

人在今日所提出之中國國家之應走向『現代化』的『現代化運動』，和清末人所主張之『新政』，『洋務』，『變法維新』，民初以來一般新士大夫所倡導之効法西洋，以及近人所高呼之『全盤西化』或『中國本位』根本不同。直到最近之最近，或可說直到中國抗日大戰爆發的前夕，中國人才開始發現，開始理解『現代化』這一名詞，也才開始追求，開始促進中國國家之『現代化』。同時，中國人的民族意識國家觀念，也是到了最近之最近，在日本人之刺刀尖下，才開始萌芽而發長。

稍爲加以研究，就知道他們所說的話固不無各有所見，然亦實屬各有所蔽。我們應知道，代表嚴格意義的『現代化』三字之被中國人士所認識所把握，乃是極最近的事情，它和清末人所主張之『新政』，『洋務』，『變法維新』，民初人所倡導之効法西洋，以及近人所高呼之『全盤西化』，或『中國本位』，有着觀念上，認識上和意義上的不同，不能混爲一談。在中國的历史上，固然多的是可泣可歌之忠臣義士的故事，而此等故事也固然不是絕未含有民族意識和國家觀念的意味，只是這種意味卻向爲『忠君』（天子，皇帝和皇室）『愛國』（王朝，朝廷或政府）的習慣所淹沒，所代替。反過來講，我們也應知道，代表嚴格意義的『現代化』一辭之被中國人士所認識所把握，雖爲極最近的事情，且和清末人所主張之『新政』，『洋務』，『變法維新』，民初人所倡導之効法西洋，以及近人所高呼之『全盤西化』，或『中國本位』，有着認識上，觀念上和意義上的不同，但是這種認識，這種新的認識，之出現，卻不能不認爲仍係經由前人之，或前行之，『新政』，『洋務』，『變法維新』，効法西洋，以及『全盤西化』和『中國本位』等等的舊認識，舊觀念和舊意義之逐漸的發展和蛻變而來。中國人之知道中國國家之須要改革或改造，並追求中國國家之改革或改造，以及中國人之民族意識和國家觀念的興起，也決不是遲到最近之最近才開始萌芽。

鴉片戰爭之後，中國之先知先覺者即痛切地覺到，中國國家有迅速改革或澈底改造的必要。而且在當時首倡改革中國或改造中國的人們，爲數雖少，但多是已具有強烈的民族意識和國家觀念的人們。他們已敏銳的認識到，想使中國國家之能達到改革或改造，非把中國的社會和政制來一個痛澈的改革或改造不可。而改革中國

政制和改造中國社會的先決條件，自是非把反動的滿清政府或王朝推翻不可。因而就發動了一個震撼人心的太平天國大革命。自然，太平天國大革命的暴發，除政治的和社會的意義外，亦不無有着種族的和國際的意義。革命的太平天國所昭示之改造中國之路，是一條相當前進之路。假如太平天國成功了，辛亥革命時代的中國，或北伐時代的中國，決不會就是那個樣子。然近代歷史發展之於中華民族，卻不是那樣的幸運，中國改造運動或改造大業的成功，也不會那樣的輕易。在當時，革命的進步力量遠不及傳統的保守勢力之強大有力，清政府之腐敗和反動之尚未全部暴露，固都不失為太平天國之未能成功的原因之一，而太平天國之所以失敗的致命傷，恐仍在太平天國的領袖們之未能真澈地認識「中國之國」，並把握「中國之國」，已誤把「中國天下」或「中國天下國」當作是一個他們在廣東沿海一帶所粗略認識的西洋民族國家的「國家」看待。他如，他們之過分的忽視了，並且違背着「中國之國」的歷史傳統，以及執行改革政策或改造政策時節之操之過激，也都是太平天國之所以失敗的重要原因。結果，頭頂着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統」的會黨諸，終於打倒了自稱所謂「天父、天兄下凡」的洪秀全。以致如火如荼的太平天國的革命運動，或可說太平天國之改造中國的革命運動，雖曾鬪爭了十數年，佔地十數省，終歸失敗了。

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失敗，等於是一個主張從中國社會政治大改革或大改造之中促成「中國之國」之改造的運動的失敗。中國的改革或改造運動遭受了一個嚴重的打擊。但這卻並未使得「中國之國」的改革或改造運動全告停止。國際處境的繼續惡化，以及生存威脅的繼續加重，乃中國改革運動或改造運動之有力的鞭策。在當時，就是反動的清政府，最好說在反動的清政府之中或朝野之間之較開明的官吏或士大夫，雖不承認中國國家有全部的改革或改造的必要，但亦日益痛感中國處境的困難和時代的嚴重，大多認為中國國家有部分的或全部的改革或改造的必要。一人倡之，十人百人和之。就某一方面講，他們也認為，中國的舊辦法已到了一窮於應付」的境地；「急則變，變則通」，為要不受「外夷」的侮辱和欺凌，是非局部的「變一變」不可了。因而，有所謂「新政」或「洋務」的提倡。這般人的民族意識不如太平天國諸領袖之正確，以「忠君」思想代

替了忠民族，但他們的國家觀念和愛國心卻亦有相當的強烈。

『新政』派或『洋務』派之所謂『變』，或所謂改革，乃是以『中學』（所謂精神文明）為體，西學（所謂物質文明）為用，『之』『變』或改革，是僅僅『礮利船堅』之『變』或改革。對於中國政治社會的『變』或改革或改造，則他們既不敢談，亦或未曾想到。經過了三四十年的張羅，他們自以為他們的理想已經是相當的成功了，不妨一試了。但結果甲午一役，全軍覆沒，又是一場大敗。

這不但又是一場大敗，而且大敗於一個為中國素所卑視，在東方，在世界，都毫無地位之暴發戶，所謂『島夷倭國』之手。這一來，數千年來的『天朝』和『上國』也就立即的從雲空跌倒在塵埃。中國在東方世界所久居的領導地位喪失淨盡還不算，而且大大地刺激了西洋列強們侵吞中國的野心。在她們之所謂看穿和輕視之下，大有追步着她們瓜分非州的餘威和先例，把中國置諸於瓜分豆割之下之勢。緊隨着中日馬關條約與三國干涉遼遼的事件之後，西洋列強也就爭先恐後地各在中國國土之要害地區指定租借地，佔為據點，開始圍剿彼此的勢力範圍。一個瓜分的慘禍，已迫在眉睫。於是驚醒了不少的『新政』『洋務』派的追隨者，他們已不能不於所謂『新政』『洋務』之外再作進一步的追進了。

自然，這時候，中國人對於西洋世界已較前多知了不少的東西，已有可能再作進一步的追進。由於進一步追進的結果，他們已漸漸曉得，要想中國之能有効地抗禦列強的侵侮，於『新政』『洋務』之外，中國的政府和政制也必須來一個相當程度的改革或改造。就是僅僅的為使『新政』『洋務』之能真正有辦法，中國的政府和政制也非來一個相當程度的改革或改造不可。於是幾經醞釀，就產生了一個以康（有為），梁（啓超）為中心之『忠君愛國』式之政治的『變法維新』運動。

在當時，縱然康梁諸人的計劃和理想不受任何的阻力和打擊，所謂『變法維新』運動能夠順利的進行，『中國之國』能否走上或完成她的初步的改革或改造，仍是一個大的疑問。康梁諸人是和太平天國諸領袖犯着同樣的毛病，不了解『中國之國』是一個有其特性的『天下』，只把她當作是一個像英國或日本一類的民族王國看

待。一個在理論和事實上毫無爭議亦毫無準備之突如其來之「舊瓶新酒」式的「君主立憲」，是不能把「中國之國」立致富強，或引上富強之路的。爲了緩和當時一般士大夫們的頑固，康有爲曾力倡「孔子託古改制」之說，藉將西洋的政治思想和社會思想都置上中國的罩袍，並把西洋新興之聲、光、電、化之學同中國的先聖先賢們都拉上關係，固不無有他不得已的苦衷，值得原諒，但這種不惜把世界上所有的一切新事物都予以中國舊意義舊概念的附會，卻和其後 中山先生之能把中國之優良傳統予以新時代新意義的創造，有着根本的不同。康梁的「維新」，實不無含有潛在的，甚至濃厚的「復古」傾向，很可能由「維新」走向「復古」。然而，這時候，馮朝野除了康梁一派，另緒一人之外，反動的清政府和反動的士大夫已痛感他們之過於急進，走得太遠了。結果，所謂「戊戌政變」即伴隨着一個政治上的反動而來。不但政治上之一點開明的革新勢力全遭壓倒，而且更極力地向反動處倒退。於是內政反映到外交，爆發了義和團暴動之亂。

這一次的大反動招致到一個更嚴重的八國聯軍對華之役。八國聯軍對華之役的結果，是中國又一次的對外戰敗。這戰敗固然是使得中國在國際的處境更爲不利，然而「塞翁失馬，安知非福？」障阻「中國之國」走上改革或改造之途之反動的清政府或清王朝亦隨之而死亡了。

清帝死去了，共和成立了。隨着共和政體的成立，一般國民才正確地認識到，「王朝，朝廷或政府，」不是「國家」，「天子，皇帝，和皇室，」不是整個「民族」。正確的，而且熾熱的民族意識和國家觀念已全部地從「忠君（忠於天子，皇帝和皇室）愛國（愛王朝，朝廷或政府）」之習慣中解放出來。按理講，「中國之國」是很可能順利地走上改革或改造之路了，而事實卻仍不是如此的簡單。清政府之死去，舊秩序是千真萬確的已隨之解體，新秩序卻未能伴隨着共和國的新政體之出現而到來。「混水捉魚」，野心家乘機而出，一方面是用盡手段爲自己盜竊權位；另一方面得機會就拉着中國回頭走，阻止着她的前進。一誤再誤，整個的中國也就很快地陷入於嚴重的內亂之中了。自然帝國主義者對於中國內亂的操縱和支持，更加嚴重地的加重了中國內亂的嚴重。

這期間，「中國之國」已爲嚴重的內亂所苦。或可說這期間，「中國之國」已爲列強操縱下之「天下大亂」所苦。爲秩序，爲統一，已耗費了中國人大部的時間和精力。但同時，爲了危亡的威脅，愛國心的驅使，不少的人卻仍在不斷的作着改革中國國家或改造中國國家的嘗試；甚至是一種大膽的嘗試。然不幸，這些人所患害的幼稚病，正同他們的前輩先生們所慣犯的頑固病是一樣的沉重。前輩人不了解西洋，只知道死守中國，癡想着要以「西洋的文明」作爲「中國文明」的侍婢。此輩人卻只知道有西洋，而忘掉了中國的存在。不是認爲「中國還不是一個國家，還沒有有一個國家」，我們可以無中生有，或「另起爐竈」地另行製造出一個國家來；便是誤把「中國之國」當作是一個「百依百順的女孩子，任人擦油抹粉」。結果，把西洋近代的政治制度全盤地搬進了中國。什麼總統制啦，內閣制啦，什麼兩院制啦，一院制啦，又什麼中央集權制，地方分權制，聯省自治制啦，都搬來一試。試來試去，愈試愈不成話，鬧得一塌糊塗。及其極也，直鬧到政已非政，國已非國的境地。

到了這時，他們自然是仍未覺悟這一切政治改革或改造的失敗是由於文不對題，藥不對症，是由於他們根本不懂何爲「中國之國」，是由於他們不理解「中國之國」所患害之歷史的或時代的眞病之故。他們從不知道，「中國之國」不是一個同於，等於或仿於英、法、德、意、美、俄等國家之狹隘的民族國，而是一個超「旗國」反「帝國」的「天下」或「天下國」。反而誤認我們這個中國是一切皆不是，也不能是任何因而漸次對中國泛起了厭惡和鄙棄之心，甚至於生出極大的悲觀之念，認爲中國是沒救了，我們再也不能使中國成爲一個富強康樂的國家。

第二節 三民主義的出現與「中國之國」之現代化

清末民初數十年間的中國史，可以說是一部「中國之國」之改革運動或改造運動的失敗史。這失敗，我們所受的損失極大，但這失敗卻也不是全無代價的。數十年間的慘痛的失敗，固使得淺見者或意志薄弱者爲之失

神而喪志，但亦已使得大時代的有心人，大時代的先知先覺者，從大時代的歷史迷失中，或可說從大時代的『燈火闌珊處』，痛澈地發現了『中國之國』的祕密，或何爲『中國之國』，並痛澈地認識出了『中國之國』，或『中國天下』，或『中國天下國』所患害之歷史病或時代病。於是那針對『中國之國』，或『中國天下』，或『中國天下國』之歷史病或時代病的特效藥石，也就適時的產生了。

這種針對『中國之國』，或『中國天下』，或『中國天下國』的歷史病或時代病的特效藥石之適時的產生，就是三民主義的出現。

三民主義之出現，以及三民主義之不出現於西方世界，不出現於西方世界之任何國家，而出現於東方世界，而出現於東方世界之中國，決不是一樁偶然的事件，而是產生於，並反映着，那支配着『中國之國』或『中國天下』，或『中國天下國』的歷史活動之偉大的中國政治思想體系的必然的發展。

中山先生曾經鄭重地告訴我們說：『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在此處所用的這一個『國』字，自然不是英國之『國』，法國之『國』，美國之『國』，或德國之『國』，意國之『國』，而是『中國之國』，而是『中國天下』，或『中國天下國』。關於這句『經文』的正解，我們不妨代爲『傳疏』爲這樣的一句話：『三民主義就是救『中國之國』，或『中國天下』，或『中國天下國』的主義』；或這樣的一句話：『三民主義就是促成『中國之國』，或『中國天下』，或『中國天下國』之『現代化』的主義』。中山先生雖未曾明白地告訴我們說，『中國之國』就是一個『天下』或『天下國』，但他老人家卻諄諄告誡我們說，中國國家不同於西洋國家。三民主義的總內容，或可說三民主義之任一主義的內容，或任一主義之任一講的內容，都從未把我們中國作是一個狹隘的民族國家看待。剛剛相反的，始終是把她當作是一個有歷史，有傳統，有內容，有個性的既成『天下』或『天下國』着眼。凡是談到有關中國的問題，無論大小緩急，總是一開頭就以中國的『天下』作對象，中國的歷史作背景。拯救中國於水火也好，促成中國的改革或改造也好，無一不是意識着中國是一個『天下』；以『中國天下』作對象，來設計，來籌劃。所以促成『中國民族獨立』之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不

是西洋民族國家之損狹的或侵略的民族主義；促成『中國民權平等』之三民主義的民權主義，不是西洋民族國家之資產統治；而促成『中國民生自由』之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更是一個超國家超階級之社會主義或『大同主義』。三民主義實施的成功，才是『中國之國』，或『中國天下』，或『中國天下國』之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和文化的諸生活之真正達到『現代化』，也就是『中國之國』，或『中國天下』，或『中國天下國』的得救與復興。

所謂『現代化』，我們前已說過，不是清末人所主張之『中體西用』，『變法維新』，不是民初人所倡導之效法西洋，也不是近人所高呼之『全盤西化』，或『中國本位』，而是把『中國之國』，或『中國天下』，或『中國天下國』之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和文化的諸生活從一個舊時代過渡到一個新時代。或可說，因時制宜的把『中國之國』之國家生活，從孤居獨處與帆船馬車之舊時代過渡到國際共處與鋼、鐵、煤、電、油的新時代。三民主義之民族主義的實施，不但是可以消除中國人是『散沙』是『病夫』，沒有民族意識和國家觀念的歷史病或時代病，而且無傷於『中國之國』之傳統的『王道精神』，並賦予『中國之國』之傳統的『王道精神』一嶄新的歷史意義或時代意義。三民主義之民權主義的實施，不但可以消除『中國之國』政治上之『朝代循環』，皇帝專制，以及權閹為禍之『家天下』的歷史病，而且給予『天下為公』與『民為邦本』之『中國之國』之政治哲學與政治實踐一具體的或現世的新內容。至於三民主義之民生主義的實施，或民生主義的建設的成功，不但『中國之國』的經濟生活，可以迅速地離棄了手工生產，一體而入於工業化；可以迅速地離棄了鋤頭農業，一體而入於農業工業化；可以從單純之大陸的耕耘和開墾，漸次地轉入於『海洋世界』的兼耕與兼跨。這不但可以無言地消滅着或遞減着由單純的『農業天下』和單純的『農業天下』之農業豐歉週期所分別造成之『保守』，『迂緩』，以及『一治一亂』的歷史病，而且在『陸海兼耕』，『農工合婚』之健康協調的基礎上，和『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之有力的控制下，中國國家或中國社會自不會再蹈資本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社會的覆轍。而同時，由於民生史觀的發現和提出，且將給予中華民族與世界人類之生存與共存一新

的自覺，新的力量，與新的諒解和同情。

『中山先生之所以反對暴動政策，反對階級鬭爭，而以民生史觀來代替唯物史觀，以平均地權代替土地革命，以節制資本來代替沒收資本，這不僅從經濟問題的本身上看，是應如此，同時又是深切的認識了中國民族的傳統力量。他一方面使中國新社會的建設，能適合於傳統的王道精神，另一方面則將那種與王道精神相伴而生的保守性，予以合理的引導，使其不成爲社會進步的阻力，並逐漸的使之消滅。換言之，即以農業和工業的調和發展，一方面去發揮王道精神的優點，他方面消滅農業時代的保守性；而且只有使新社會的物質條件與傳統的「固有道德」相融合，社會的改革計劃才不致成爲空想。因爲社會改革，並不是要在地上造天國，而是要替一個有文化有歷史的社會求進步。』這一段文字，見傅樂夫先生論中國之王道精神一文。該文與拙著論中國之國一文同刊於三民主義週刊二卷五期。很有見地，也很可以作爲本講前一段的論旨的再說明，故摘錄於此，借以參證。』

三民主義就是促成「中國之國」，或「中國天下」，或「中國天下國」之「現代化」的主義，固如上述，但中山先生卻並未會明白地說出，三民主義就是促成「中國之國」，或「中國天下」，或「中國天下國」之「現代化」的主義，正同他未曾明白地說出「中國或「中國之國」就是「天下」一樣。惟其如此，這一基點，或這一真理之能爲國人所共同認識和共同把握，尙有待於時間和歷史來促成。

我們知道，三民主義出現於中國之後，甚而直到北伐告成，服膺三民主義的國民政府奠都於南京之後，由於國內外局勢的非常，以及國難之日趨於嚴重，中國的知識界，或可說大多之「英美派」，或「英美德派」的知識份子，仍未能全部接受三民主義可以救「中國之國」，或「現代化」之歷史啓示。反而相率地戰慄於愛國愛時的感傷生活中。因而，也都更極端地倡出既傷感亦悲壯的『全盤西化』論。由於『全盤西化』傾向的抬頭，自會招致一部份狹意的愛國主義者的疑慮和反抗。因而，也就出現了一個所謂『中國本位』的號召。『中國本位』論的內容，固已大有不同於清末人之『中體西用』論，然而它卻多多少少地，甚至相當

濃厚的，帶有國粹主義者的復古傾向，自不能折服『全盤西化』論者之心。於是就爆發了一個所謂『中國本位』論與『全盤西化』論的論戰。

論戰的結果，是『中國本位』論戰敗了。但『中國本位』論的戰敗，卻並未造成『全盤西化』論的勝利；可以說是兩敗而俱傷。由於『中國本位』論和『全盤西化』論之兩敗而俱傷，方始促進一般國人達到了一個新的認識。這個新認識的具體表現，就是『現代化』一辭之出現與確立。從此一般人不願再說『我們要西化』，卻都改說『我們要現代化』。正如馮芝生先生所說的，這並不是專是名詞上的改變；這表示一般人的見解的改變，也表示一般人已有了一個很大的覺悟。

馮芝生先生曾在他的名著之一之『新事論』的『別共殊』篇中，鄭重指出，『近代化或現代化』的說法，是通於『全盤西化』或『中國本位』的說法者多多。然他卻又認為，『我們說近代化或現代化，我們還是從特殊的觀點，以觀事物』。『因此所謂近代文化或現代文化者，亦是一個特殊的文化；他亦是一個五光十色底『全牛』』。在這些五光十色中，我們不知道何者是我們所必取，何者是我們所不必取。因而，他主張應從類的觀點，以觀事物。『若從類的觀點，以看西洋文化，則我們可知所謂西洋文化之所以是優越底，並不是因為他是西洋底，而是因為他是某種文化底。』同樣的，『若是從類的觀點，以看中國文化，則我們亦可知我們近百年來所以到處吃虧者，並不是因為他是中國底，而是因為他是某種文化底。』能如此，則在我們知道何者是我們所當去，何者是我們所當存，與何者是我們所必取，何者是我們所不必取的前提下，才能達到正確的『全盤西化』或『中國本位』，這等於『將我們的文化自一類轉入另一類』。

馮先生的見解不但是一個高人一籌的見解，而實是一個劃時代的見解。他這樣說法的提出，把一般國人對於這一問題的認識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開了一個新的境界，正同他的『貞元三誓』之出現把中國的學術思想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或新的境地一樣。然亦惟其如此，我們正可藉助或踏越這一新的階段，或這一新的境地，對此問題，或此真理作更進一步的追尋和窮索。

如果我們單純地站在純邏輯的立場上，來論事，來說話，並同意所謂「文化之類」，或所謂「種種不同的文化之類」是會超越民族，超地域，超時間不出現而存在的話，或可說先人類之出現和存在而出現而存在的話，則我們自不能不接受馮先生的見解，且深願接受或全面接受馮先生的見解。但可惜，形而上學的邏輯概念，每每爲他自身的形式所誤。我們知道，人類文化，或可說人類世界之各個不同的文化類型，最好說人類世界之各個不同人羣所具有之各個不同的文化情調，是後人類之出現和存在而出現或存在，且每每與民族，地理與歷史深結不解之緣。在人類世界文化之大的一般性中，而有其民族的和地理的三個別的特殊性。這種個別的特殊，不是「類」的不同，而是「情調」或「風格」的有異。惟其如此，各國只有特殊風格或情調的文化之前進發展的史的階段，仍然有其一般性。也惟其如此，我們與其說中西文化的差異，乃是「類」的差異，還不如仍說中西文化的差異，乃是「古今」之差異，乃是中古的和現代的差異之爲更接近於真理。

自然，當我們說中西文化的差異乃是古今的差異的時候，我們於中西文化的差異，乃是中古的和現代的差異的認識之外，卻仍須深深理解，前者曾帶着極濃厚之中國情調，或極顯著之中國色彩，而後者卻帶着極濃厚之西洋情調，或極顯著之西洋色彩。在最近之兩三年來，中國學術界或文藝界，曾有人大聲疾呼地提出了「民族形式」和「學術中國化」的口號，並含有不少的人熱烈地從事於此等口號之實踐運動。而共產黨人亦曾發出「學習中國歷史」或「馬克斯主義中國化」的呼聲。正可藉以說明，這正是針對着「我們中國所需要的是「現代化」不是「西洋化」，或「西洋之類化」，」這一真理而發。這正是證明着或象徵着中國學術思想之疾速的進步，和中國學術思想和水準之驚人的提高。

若是僅就表面着，中國學術思想之疾速的進步和中國學術思想水準之驚人的提高，對於三民主義之實施，及其理論的發展和播植，似亦無甚幫助。其實呢，此中的因果卻至爲顯然。中國學術思想之疾速的進步和中國學術思想水準之驚人的提高，已使得大部的知識份子迅速地理解並自發地接受三民主義的歷史使命，而同意它乃「現代化」中國國家或「中國之國」之唯一的指導原則。因而，也就大大地有助於三民主義的理論之發

展或學術化，和三民主義之能在新中國之政治建設，經濟建設，倫理建設，心理建設和文化建設中起着指導作用或決定作用。

但當三民主義之能為中國大部的知識份子或各派的知識份子所接受，而大有助於三民主義之在全中國流行的時候，中日之間的生死大戰，也就因日本之更進一步的侵略而爆發了。

隨着中日大戰的爆發，或可說隨着中日大戰的行進，一幕震撼世界，甚至使世人不敢置信的史劇卻公演於東方人和西方人的面前。這幕史劇之過分的驚人，不在日本之過分的殘暴與野蠻，而在中國之能意外地粉碎一般世人對她所懷之一貫的低估與輕蔑。「中國之國」不但是未曾隨日本軍閥的狂言而三月告亡，反而把一個久號一等強國的強敵拖入於長劫戰爭的泥潭，使日本進退維谷，前途茫茫。於是，就有人說這是一個「奇蹟」，也有人說這是一大「神祕」。其實呢，這不是什麼「奇蹟」，也不是什麼「神祕」；此中別無其他的奧妙，只是「中國之國」之「天下性」和三民主義之「民族主義」開始在中國之現代史上或現世之大難中發揮作用。

如果有人要問我們，爲什麼中國可以「以空閒為取時間」，可以以空閒的餘裕解救她「時間的災難」，而法、波、比、荷、南、希、丹、拿等國不能？我們將毫不遲疑地答道：因爲「中國之國」是一個「天下」，而法、波、比、荷、南、希、丹、拿等國不是一個「天下」。前此大家所疑惑，所輕視，甚至所厭惡之笨重的「中國天下」，隨着中日間生死戰爭之長期化，以及法、波、比、荷、丹、拿、南、希等國之閃電式的敗亡的悲劇的頻頻演做，已漸漸地爲國人和世人所共同認識，她不但不是是一種負擔，一種累贅，而且是一種偉大力量之源泉，是中華民族之雄厚的基業，是中華民族之生存與自衛的憑借。同時，如果有人再問我們，爲什麼國民政府誓師北伐之後，不十年間，就可以使得一個紛亂已極的「中國天下」重歸於一統，或一體，奠定下安內攘外之業？而重歸一統或一體的「中國天下」或「中國天下國」，不過是草略地作了幾年短短的準備，也就可以起而執行反帝，反侵略或反征服的對外大戰爭，剷暴日得出坐入席的大關爭，除了薄弱貧乏的步槍機槍和手

榴彈外，中華民族究竟是還具有什麼特種的祕密武器，可以和強敵週旋於疆場之上而不敗？我們也將毫不遲疑地答道：『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

自然，如無『中國之國』之『天下性』，則『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自無用武之地；反之，如無『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則『中國之國』之『天下性』亦將無從發揮她的威力。

第三節 三民主義新中國正在向世界宣告誕生

三民主義之民族主義不但支持着，武裝着，增援着，指導着中國今日之反帝，反侵略，反征服之對外大戰，並亦已躍為排山倒海般之洪流和浪潮，為中國擁出偉大賢明的領袖，並催迫着中華民族四萬五千萬的好兒女，共向促成『中國之國』或『中國天下』或『中國天下國』之『現代化』的途程上邁進。最好說共向改造舊中國為一個『民族獨立』，『民權平等』和『民生自由』之『三民主義新中國』之途程上邁進。

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已在中國的現代史上，尤其是在當前之國民革命和抗日戰爭之大業上，發揮着極大的作用，自是人所共觀，亦人所共認為事實，勿待辭費。（甚至，我們陣人中之不了解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的人們，看到中國民族氣之洶湧澎湃，已不無為之相顧而失色。）而伴隨中國國家之重回一統或一體，或一般人所說的『統一團結』之已達到了相當的穩定，三民主義的『民權主義』也在今日中國之戰時的政治生活中開始活躍。雖然只是為了過去之不平等條約的束縛和日本之繼續的阻撓與威脅，以及前此國內政治之未能早上軌道，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的建設，卻無容諱言，亦不必諱言，尙未嘗達到滿意的成效。甚至，在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之建設途次，還不無潛有着強固的障阻，嚴重的危機，和其他有力的誘惑。但『建設之首要在民生』，『民生主義建設』的成功，才是『三民主義時代』的到來。這一點，乃是中國未來之千年的或萬年的歷史光榮之所繫，亦世界和平之所關，自不容我們有絲毫的遲疑和徘徊。

自然，這一偉大而艱巨的目標的圓滿達成，不是一舉手即可獲得的易事，也不是一朝即可築成的簡功，有

待於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之更巨大和更堅定的努力。關於這一問題，或可說這一要素，我想我們最好是引用去年十一月十七日，蔣委員長在紐約前鋒論壇報的時事問題討論會中所發表的論文，來作一個更具體的說明。

在該文中，蔣委員長（一位最有資格，或可說一位居於最優異最適當的發言地位之巨人，可以向世界宣告：中國人民和政府對於完成中國國民革命與實現「中國之國」之三民主義化或現代化，曾抱着如何的決心；中國國民革命與「中國之國」之三民主義化或現代化之行進或實施現已到達何等程度，而在國民革命行進中或三民主義建設中的新中國的立場和動態又爲如何？）曾經極莊嚴地向世界宣告：

「國父中山先生對先生的信徒的遺囑，開始便以「革命尚未成功」相提示。我輩於一九二七年以後，雖國民革命已推倒軍閥，統一中國，仍自認爲革命政府。而不加以深思者輒曰：君等已建立全民的政府，爲何仍稱之爲革命？意者其將革自己之命乎？且革命何時終止乎？」

中山先生的國民革命，有三個根本主義：（一）民族主義，目的在達到完全的國家獨立。（二）民權主義，目的在推行澈底的民主政治。（三）民生主義，目的在改進羣衆生活，使人民普遍滿足其生活。我輩相信，經此次戰爭之後，我中國必已充分的達到國家獨立，民族自由。至其餘民權民生兩大目標，恐尚須經過長期的努力，方告成功。國民革命的目的，一日未完全達成，即吾人革命的責任一日未盡。我們所以自認爲革命政府，即表示吾人革命責任之所在。

先言國家獨立。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最終目的在求得全世界人類真正之平等。關於民族被壓迫之痛苦，我們中國所受的經驗爲最深。所以我們對於戰後，不僅要求得中國之完全獨立，也主張世界上再沒有被壓迫受痛苦的民族。爲看人類永久的福祉，大西洋憲章及羅總統所提倡的四種自由，要普遍的爲任何人類所共同享受。我們相信，在戰後決沒有變相的帝國主義思想殘留於世界。

再說民權主義。階級的劃分，雖先進的民治國家，亦不能避免，然而中國一貫的政治思想就是「民爲邦

本」。所謂民，是無分區域或貧富的。所以中國在其思想與生活方式上，本來是天然的民治化。中國社會上一向以來就沒有富人可壓迫貧人，而從政的權利亦不是那一個階級所能獨享。但表現民意的機構和制度，及現代民主政治的複雜工具，並不能於一朝造成，其經驗者自能知之。我們國父的民權主義，是要實現全民的普遍選舉權，而不採取以財產或職業為限制的選舉制度。這個理想的實行，當然需要較長期的準備，但我們必將不斷努力，以達此目標。

再言民生主義。中山先生於在世最後數年中，對於中國經濟的建設計劃撰述最勤，對於將來中國經濟建設所結的果實，堅持其應為全體人民所享有。余相信先生偉大的表現，當無逾於此點者。近數十年來，中國未有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以任指揮及推進之責；同時受不平等條約的束縛，而處於殖民地地位。最可痛恨者，又有日本的百方牽制。為此種種原因，經濟的建設幾於完全停滯。此次戰爭結束之後，中國既已脫離桎梏，中國政府必能完全自主的行使職權，不受牽制，自必專以開發國家為責任，中國的人民亦必充滿欲望於物質上精神上建設國家的志願。余深切感覺大時代即將到臨，且覺此大時代將消納中國人民數代的力量，造成使友邦人士對中國刮目相看的種種對社會的貢獻。中國完成他的經濟建設，不僅為本國的繁榮，也要對世界有裨助。民生主義的目的，決不僅為一個階級或一個國家謀利益，而要使全國人民和世界人類都能增進其生活。

上面所說種種未嘗光明的希望，曾經於對日本慘淡的抗戰上給予吾人以不少的鼓勵。但若此次世界的合作不能成為事實，則此種希望將變為灰燼。

余聞之，余之美國友人對於實行家的意見，較對於理想家者尤為尊重。余一生為革命而奮鬥，且半世戎馬，是以認清有着重實際之必要。除非我輩對世界一切不論大小的民族，忠實的願意待以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公道，我輩任何人將不能得有和平與前途。余深信我輩為剷除不公道及暴力壓迫而戰鬥的聯合國家，必能成就此世界改造的偉業，必能組織有效的國際團體，立刻實現和平與公道，並且同樣急迫的開始將原則適

用於我輩本身，雖使我輩各國有所犧牲而不惜。上次世界大戰卡伐爾被戰時，曾謂：「在此須臾臨終之前，余祇覺單知愛國，確尚未足。」我輩應勿忘此至理名言。對此新的國際秩序，我輩中國人雖非盲目輕信其能愛世界為桃源，然亦不信其只為幻夢而已。四海一家之義，乃中國大同的哲理所固有者。此種主義，於中山先生的思想上最為顯著，而中山先生所指示的途徑，至少已使我輩中國人知而非幻想家，而係最偉大的實際主義者。

最近有為中國將為亞洲領導者之論，一若不成器的日本的衣鉢，行將傳於我國。中國年來歷受壓迫，對亞洲沈淪的國家，自表無限的同情，但對此等國家的自由與平等，我輩只有責任，並無權利。我輩否認我輩將為領導者，蓋在歐洲，「富拉」(Fisher)的原則，不能離開控制與榨取，亦猶「東亞共榮圈」之於日本，只憑荒唐的神話，妄想以一個民族，統治其他受征服的民族。中國並不期望以東方式的帝國主義或任何種類的附屬主義代替舊方式的帝國主義。我輩應從同盟軍團及其他特殊作用的團體進而作有組織的全世界的結合。我輩以為在新的自由國家間，平等互賴的世界，非東方式的閉關主義，亦非歐美式的閉關主義，而係合世界整個的合作，乃得消弭任何方式的帝國主義而代之。

這一篇重要的歷史文獻，固在深切地說明着中國國民革命或「中國之國」之三民主義化或現代化的大業的艱巨，和其現已達成的階段，以新中國之立場與動向又應為如何，然亦在嚴正的說明着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在完成中國國民革命或實現「中國之國」之「三民主義化」或「現代化」的意志與決心。歷史的要求，生存的願望，以及「安全」，「繁榮」和「榮譽」的嚮往，正在鼓盪着，督責着，中國的人民和政府勇往直前，不達目的，決不休止。今天在東亞大陸上所瀰漫之滔天烽火和震地殺聲，正是象徵着「中國之國」，或「中國天下」，或「中國天下國」已屆臨大變之劇烈的陣痛中，一個「民族獨立」，「民權平等」，「民生自由」之「三民主義的新中國」正在向世界宣告誕生。本年正月十一號，在重慶和華府同僚簽訂之中英，中美之平等新約，也正是說明着世界列強已開始認識，並開始迎接，這一個新中國之偉大的誕生。

自然，這一個正在誕生中的三民主義新中國，一旦完成，自不會成爲一個像英國之國，美國之國，或德意之國之西方國家，而仍是一個「中國之國」，「中國天下」，或「中國天下國」。近人每喜將中國同英、美、德、意等國家並列齊比，站在現行之國際外交關係上說這話，自然是無可非議，但如果站人類之歷史的政治的和文化立場上說這話，我卻認爲是一個很錯誤的見解。若是就英、美、德、意等國家的「國」字之歷史的政治的文化的涵義講，「中國之國」的「國」字早已逸出英、美、德、意等國家的「國」字的範圍之外了。到了最近，由於三民主義新中國之即告完成，「中國之國」的「國」字所指的，自亦不是一個狹隘的排他的，小民族的「民族國」，而仍是一個寬大的，承納的，可以兼容並包的「天下」或「天下國」。至少的至少，在文化情調，政治意識，以及生活方式，思想形態上，仍是一個籠罩着東方世界或東亞陸海的「天下」或「天下國」。所以我們可以說，這一個正在誕生中之「三民主義化」或「現代化」的「中國之國」，不是一個狹義的中國小民族國家的新生，而是一個舊東方世界，舊「中國天下」。舊「中國天下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之適應歷史時代的改造或重建。在這一個「現代化」之「中國之國」或「中國天下」或「中國天下國」的面前，最好說這一個「三民主義新中國」的面前，橫陳着一個偉大的中國前途，一個偉大的東方前途，也橫陳着一個更偉大的世界使命。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初版

(35207渝手)

中國論

滄版手工紙

定價國幣壹元伍角

印購地點外另加運費

版權所
必究
翻印必
究

著者 羅夢冊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重慶市圖書館
叢書
安國字號六六七號

